# 三星堆文化探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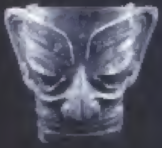
## 及《山海经》断想

刘少匆 著

昆仑出版社

# 三星堆文化探秘

## 及《山海经》断想



刘少匆／著

昆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星堆文化探秘及《山海经》断想/刘少匆著．－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2
ISBN 7-80040-563-X

Ⅰ．三… Ⅱ．刘… Ⅲ．文化遗址-研究-四川省 Ⅳ．K8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8235 号

**书　　名**:三星堆文化探秘及《山海经》断想

---

**作　　者**:刘少匆
**责任编辑**:卢嘉文
**装帧设计**:明度工作室—刘静
**责任校对**:吴　汇
**出版发行**:昆仑出版社
**社　　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62183683
http://5033.peoplespace.net
E-mail: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新华书店发行所
**印　　刷**:三河艺文印刷厂
**开　　本**:A5
**字　　数**:204 千字
**印　　张**:7.5
**插　　页**:2
**版　　次**:2001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1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40－563－X/G·78**
**定　　价**:18.00 元

2001.3.7
北京图书大厦
No.0350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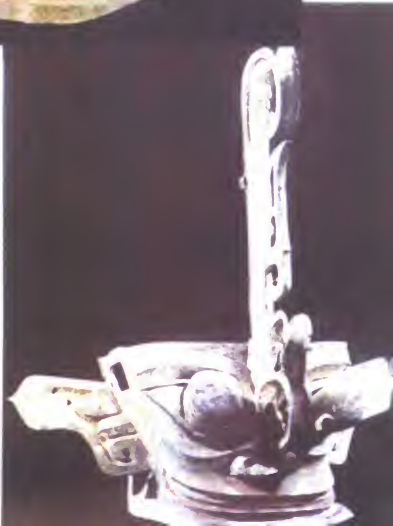
金面罩

祭器坑出土的青铜立人像

2000年12月17日中央电视台《直播中国》之三星堆直播现场▼

青铜神树

青铜面具像



一号坑图

青铜雕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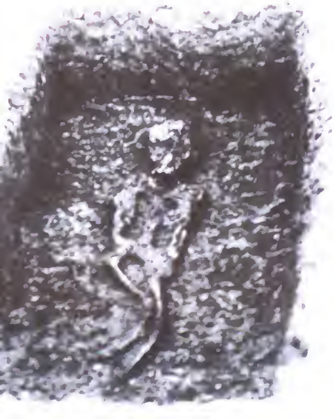
“神坛”残片

带纹饰的玉璋

高柄豆上的图符

三星堆出土之金杖及线描图

三星堆发现的墓葬



祭器坑中的象牙

# 三星堆文化探秘

## 及《山海经》断想

刘少匆 著

昆仑出版社

# 目　　录

## 上编　三星堆文化探秘


引　言 …………………………………………………………（3）
三星堆文化的确认来之不易 ……………………………………（6）
文化、文明与古蜀史………………………………………………（14）
三星堆文化的分期与断代 ………………………………………（18）
蜀人的由来 ………………………………………………………（22）
鱼凫国破说 ………………………………………………………（27）
杜宇的族属 ………………………………………………………（32）
古蜀的都邑 ………………………………………………………（37）
三星堆的“堆” ……………………………………………………（44）
“都城”三星堆 ……………………………………………………（49）
金杖之谜 …………………………………………………………（56）
青铜雕像与神树的由来 …………………………………………（63）
再说青铜树 ………………………………………………………（73）
古蜀社会的探讨 …………………………………………………（80）
“轮形器”到底是什么？ …………………………………………（84）
古蜀人的“竹崇拜” ………………………………………………（89）
关于“祭祀坑” ……………………………………………………（92）
三星堆墓葬说明什么？ …………………………………………（95）
食盐和大象 ………………………………………………………（97）
杜宇的疆域及其他………………………………………………（102）

玉垒山与金堂峡……………………………………………………（105）
隔行说玉……………………………………………………………（109）
说制陶………………………………………………………………（113）
海贝的由来…………………………………………………………（116）
刻画符号与古蜀文字………………………………………………（120）
第“三条路线”………………………………………………………（125）
妄说“神坛”…………………………………………………………（133）
附录:“三星堆文化”四说 …………………………………………（138）

## 下编　《山海经》断想

**引　言**……………………………………………………………（155）
《山海经》的成“书”年代……………………………………………（161）
《山海经》是一部什么书？ …………………………………………（168）
神的启示……………………………………………………………（170）
《山海经》中的动物…………………………………………………（176）
《山经》中的金属 …………………………………………………（184）
作者解疑……………………………………………………………（186）
《海经》释名…………………………………………………………（189）
海外诸事……………………………………………………………（191）
关于轩辕国…………………………………………………………（193）
重要神祇……………………………………………………………（195）
海东诸国的思考……………………………………………………（201）
《山海经》对海外其他三方的描述…………………………………（205）
炎帝与帝俊…………………………………………………………（207）
关于都广……………………………………………………………（213）
《山海经》与蜀………………………………………………………（220）
关于昆仑山…………………………………………………………（226）
**后　记**……………………………………………………………（2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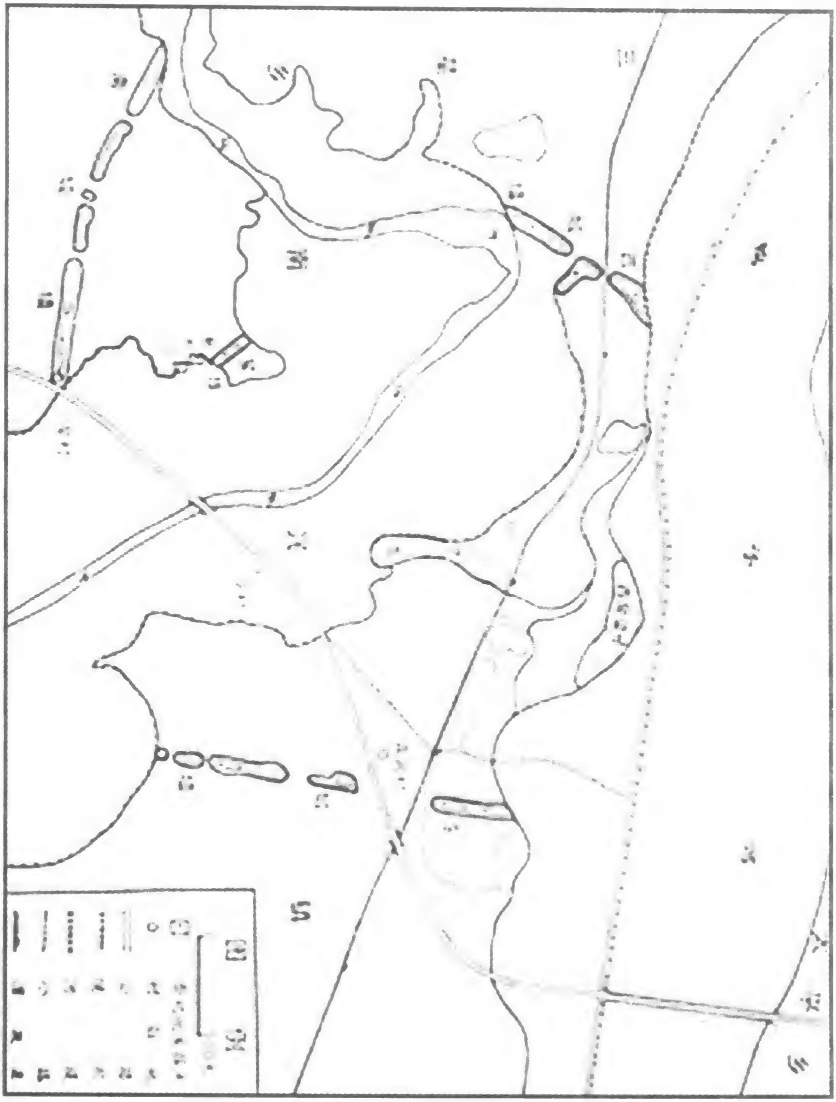
# 上　编

# 三星堆文化探秘

# 引　　言

也许是浓烈的乡情，使我对三星堆文化特别有兴趣。虽囊中羞涩，也尽力花钱买些如《三星堆文化》等出版物拜读。一方面，我对老一辈史学家如蒙文通、徐中舒、任乃强等先生治学的严谨精神深为敬仰。同时，也对当代研究巴蜀史的中青年学者们的博学敏思十分钦佩。特别对我这样虽也从文字中讨生活，却没有史学专业知识的人来说，更是受益匪浅。我到三星堆遗址参观访问不下二十次（多数是陪文艺界的朋友们），也曾下到第二号“祭祀坑”里，与工作人员一起，发掘过一只鱼形金箔。无论在现场或在别的场合，朋友们谈起三星堆时，总会向我这个广汉人“讨教”，希望我能如数家珍似的说个明白。但我却又常常言不及义，含糊其辞。在这种抱愧情绪的支配下，我决定从专家们的著作中讨点谈资。读了几本书，我不禁大为惊讶：三星堆文化中，竟包含着如此多的奥秘！

退休在家，心无杂念，常常读书自乐。在这种平静的心态下，反倒会想些问题。我甚至产生理查德·利基在《人类的起源》一书中所说的那种感觉：“我们今天拥有的古代图像，是一个古代故事的片断。虽然我们迫切想了解它们的含义是强烈的，但明智的做法是承认我们理解力可能会有的限制。”同时，也真切地感到学者不仅被理智，同样也被感情所引导。三星堆文化的确认，使古蜀王国从神话中走出。可一旦变成可信的古史，问题就变得更加多起来。新的发现，让我们解出一个谜



三星堆遗址示意图

底。可这新的谜底，又给我们带出更多的谜语。正是这种不断地解谜，我们才能一步步地接近历史的真实！

《三星堆文化》这本专著，应该说，是把它纳入历史科学的框架内，来解答三星堆文化的问题的。其中不少真知灼见，振聋发聩。而很多细致入微的观察与分析，更使人拍案叫绝。可以说，这部著作，对三星堆文化的研究，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功不可没。按照这个框架来深入地探讨三星堆文化，定会有更大的收获。但由于学识和精力的限制，我把自己的学习范围，规定以"三星堆"为限。只想来龙，不探去脉。学习中，不免产生新的疑惑和想法。要解除自己的困惑或证实自己的想法，家藏的几本残书和贫乏的史学知识，都使我感到为难。只有写出来，就教于众方家。许多看法，难免贻笑大方。但我想为三星堆文化研究尽点微薄之力而不怕耻笑的精神，大约会得到乡贤和专家们的赞同和理解。

# 三星堆文化的确认来之不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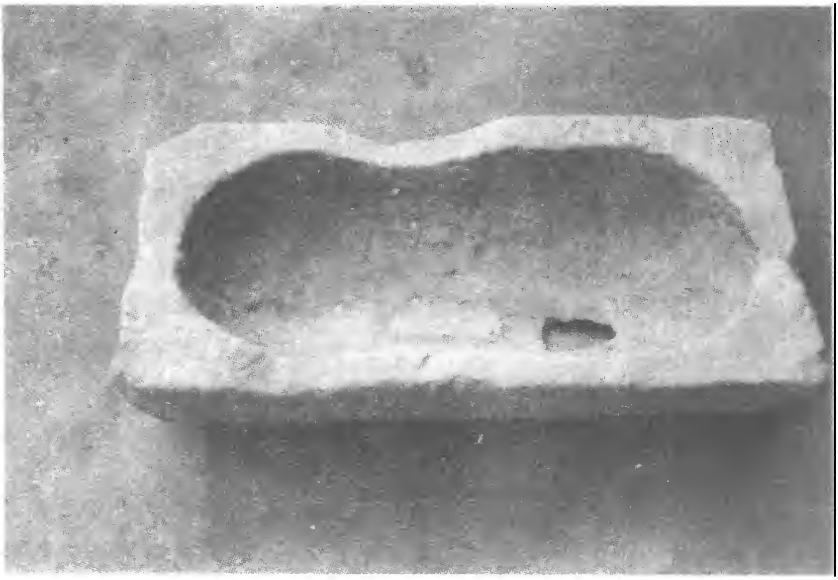
距广汉城西十余里的中兴场真武村一带，明清以来，一直有文物出土，但并无重大影响。只有燕道诚家一次偶然的劳作，第一次掀动了隐藏在历史舞台远端的古蜀王国的帷幕。

1929 年在燕家发现玉石器的窖藏地

生于清咸丰三年（公元 1853 年）的燕道诚，本是位有功名的读书人。37 岁时，还到外地出任了一任县知事。不知是什么原因，40 岁就

赋闲回家了。田里的农活，由长子燕青宝经管。自己则时常进城，与官吏乡绅交往应酬。

1929年早春的一个下午，燕青宝在住房旁的林盘里，挖"龙窝"，要车水淹菜田时，发现一坑玉石器。燕道诚从城里回来，燕青宝向父亲禀报了此事。第二天，燕道诚率领全家大小，把坑中的玉石器取出来，拿到房中清点。共有璧、璋、钏、珠、刀、斧及玉料共几百件。坑底，有一个用石板盖着的小石槽，里面装着五个玉琮（今天，陈列在故宫里的，就是其中之一），而这个石槽，至今还在燕家。



窖藏坑内装玉琮的石槽

燕道诚知道这是一批古物，但家里有吃有穿，也没有想到拿去变卖。倒是一些朋友，到乡下他家做客时，他会拿出来，让大家鉴赏清玩。若有至交索要，他也馈赠过几件。据他的子孙们所讲，他们家从没有卖过一件坑里的东西。而据有关资料记载，也仅有1935年成都金石家龚熙台曾从燕道诚手中购得四件玉器一事。目前那些小册上所写什么"偷宝"、"盗宝"、"抢宝"、"藏宝"的故事，全是瞎编乱造的。

但是，燕家发现很多“古董”的消息，仍然不胫而走。1931年春天，有人把从燕家得到的玉器，交给当地福音堂牧师董笃宜（V.H.Donnithorne）观赏。这位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的洋牧师认为很有科学价值，应及时保存下来，避免遗失。但他觉得自己是个外国人，去搜集这些东西，很不妥当。于是，就去找驻防本地的旅长陶凯。

事也凑巧，这位陶旅长，正是燕道诚的学生。一年前，当团长时，还兼过广汉的县知事。

陶凯对牧师的热心，十分赞许。决定亲自去找自己的老师，争取多带几件，请牧师再看看。

几天以后，陶凯带了五件玉石器，交给牧师。并对他说，燕老师不愿出卖，只是借出来供研究用。

董笃宜牧师拿着这五件玉石器，赶到成都，找到华西大学地质专家戴谦和教授请教。戴教授认为这是上古遗物，很有研究价值。

董牧师把华西大学的意见，告诉了陶凯。陶凯请来燕道诚，与牧师见面。当得知华西大学博物馆希望能收藏这些玉石器时，就把原来借出的几件送给了陶凯，由陶凯转赠给博物馆。自己又拿出一个大石璧和一把玉刀，交给牧师，请牧师一并送给华西大学。后来，燕道诚还给华西大学博物馆（即四川省博物馆的前身），赠送过玉石器。

为了弄清情况，陶凯还约请董牧师、戴谦和等，一起到现场考察、摄影。

1933年秋，这批古玉石器，引起了在华大博物馆工作的美籍教师葛维汉和林名均先生的注意。葛维汉就致函董笃宜，希望能找到更多的器物。经过几次的通信，葛维汉来到广汉，与当时的县长罗乃熔协商。罗县长十分支持。当即决定，禁止私人发掘（那时，当地农民在遗址上四处乱挖），并以县政府的名义，向四川省教育厅申办发掘执照，由罗县长亲自主持全部发掘事项。发掘方法，则聘请葛维汉负责。

1934年3月15日，葛维汉和林名均一行四人，来到广汉，受到了罗县长、董笃宜和燕道诚老先生的热情款待。为保证他们的安全，还通过陶旅长派来80名士兵作警卫。同时，县政府也派人参加发掘工作。

1934 年第一次发掘时的照片(左一为美国学者葛维汉，右二为洋牧师董笃宜)

第一次发掘，是在离燕家院子西北面不远的地方。他们挖了一条长 40 英尺，宽 5 英尺的小沟，先发现许多破碎的陶片及其他手工艺品。玉石器是在沟底发现的，有近百件石璧残块、石刀、玉刀、15 件绿松石、绿石和玉珠，以及 80 余件薄的方形或长方形的小玉片等等。

以后，又挖了三个坑，也发现了不少的玉石器和陶片。

这次总共发掘出有价值的文物 600 余件。经罗县长等地方政要过目后，罗县长表示："这些器物，很有科学价值，请把它们全部送给华西大学博物馆。"

从此，偶然的发现变成了有目的的寻觅。燕家也和此事结下了不解之缘。燕道诚于 1943 年冬月初三逝世，享年 90 岁。他的儿子燕青宝以及孙辈燕开凤、燕开正等，都成了考古界访问的对象。冯汉骥、童恩正、王家佑以及县上从事文物管理的，不仅常常出入他们的家中，有的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经过他们的劝说动员，1956 年，燕家把自己一直埋藏在田埂里的最有价值的玉琮、玉瑗、玉钏、玉磬等珍贵文物，全部献给国家。

1934 年的发掘现场

燕家三代，对三星堆文化的发现，应该说是有功的，但是，他们似乎又没有得到应有的敬重。据说，时至今日，他们一家几十口人，还没有

到三星堆博物馆去参观过。当我向他们询问原因时,燕道诚的孙子燕开正忿忿地说:"我们不是花不起几十元的门票钱,是因为想到要我们花钱去看我们自己捐献的东西时,心头就不痛快。"

我认为这真的是一个疏忽。无论是学者,还是目不识丁的农夫,只要有贡献,都应该得到尊重。当专家学者因研究这些器物得到荣誉时,当因这些器物的展览得到效益时,一定不要忘记这些最早的发现者和曾经支持过这一事业的人们。

从第一次正式发掘后60年来,学者、考古工作者,甚至一些古董商和盗宝贼,都在这里留下足迹。然而,1950年以前,虽有郭沫若先生在远洋彼岸的赞叹,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郑德坤把这里的出土文物命名为"广汉文化",但它到底是中原古文化的支系,还是独立的古蜀文明的显现,仍是一片模糊。建国以后,又有许多著名学者在这里考察,考古工作者也不断有新的发现。但是,直到1964年,冯汉骥教授才做出"这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的论断。此后,农民们也在掏粪坑,挖自留地,甚至拾柴摘菜时发现玉凿、古陶、铜虎等物。然而,这一切并没有让古蜀王国的面貌变得更加清晰。1980年5月,省、县联合在三星堆正式试掘。经过一年的发掘,大有收获。发现了房址遗迹及大量石器、陶器。1986年春,更大规模的发掘,在几个发掘区内,又一次动工。百余人参加的考古队伍,在三个多月内,发掘了5×5的探方53个,总面积达1325平方米,出土的各种器物也十分丰富,但却没有突破性的发现。

"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正在考古队的收获处于平淡无奇的境地时,意外的事却发生了。

7月18日上午,砖瓦厂挖方组的组长杨远洪及刘光才、袁招贵、彭均礼等几人,在取土时发现了象牙和玉璋等物。杨远洪马上向厂部作了报告。下午,考古队闻讯赶来,封闭了这个埋藏点,并报告了省文管会和广汉县委。

事情也十分凑巧。中午收工时,考古队的人还没有来到现场,挖方的彭均礼就利用这个短暂的"真空"时刻,趁人不注意,偷偷挖走了一颗

一号祭器坑出土器物全景

象牙。当考古队忙着开展发掘工作时，彭均礼则悄悄地设法兜售自己非法取得的那颗象牙，喊价几十万。结果，消息被公安局截获。公安人员化装成古董商，约他去某地交“货”。彭均礼信以为真，带着象牙去取钱，被公安人员扣押，关了一年多。出狱后，又因车祸死亡。这虽是一个小插曲，但人们应该引以为戒。

这个祭器坑中，发现了许多惊世之宝。然而，正如俗话所说：“运气来了，门枋都挡不住。”当人们还沉浸在狂喜之中，尚未真正清醒时，8月14日，砖厂的挖方工人杨永成、温烈元等，在离第一个祭器坑不远处挖土时，又发现了几个青铜头像。这次，因为现场就在附近，考古队立刻过来，将埋藏点封闭。于是，有了第二批宝藏出土。这真像芝麻开门的童话。但它不是童话，而是事实。

这些造型奇特、制作精美、品种繁多的金器、青铜器、玉石器、漆器、陶器等物，是第一次在川西平原被发现。它使古蜀王国，从浓浓的历史

密雾中渐渐显现出来，因而惊动了中国和世界的学术界。从此，“三星堆文化”正式出现在各种历史学和考古学的著作中。

然而，回想这60多年的历史，再看看博物馆中所陈列的那些在这块土地上因考古而用过的各种古老的、现代的发掘工具，完全可以想象得出现场工作的人们辛勤劳作的情景。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在“祭祀坑”发掘现场，考古队的朋友们餐风宿露时，那一双双疲惫而兴奋的眼神。“三星堆文化”是学者和考古工作者，以及参加这项工作所有的人，用双手刨出来的，用汗水浇出来的，用智慧认出来的。每当我在这些光辉夺目的展品前流连时，我就会为“三星堆文化”而劳作过的专家、学者、学生、官员及农民肃然起敬。一两件古董，只能引起古董商和收藏家的兴趣，不能成为考古学的科学资料。“考古学要研究的是整个社会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传统”(《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2页)。“三星堆文化”的确认，是近70年来，众多学者、专家和参与此项工作的所有人们用才智和心血取得的。它给人们展示的是古蜀王国的社会风貌。而任何偶然发现，不经千百倍的努力，无法达到这个目标。时光，让许多历史埋在地下，沉在水中。我们若想再看见它们，只有依靠勤劳，依靠科学！

# 文化、文明与古蜀史

文化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美国人菲利普·巴格比有一本广博而浅显的书，名曰《文化：历史的投影》，对"文化"作了比之《辞源》更为广泛的解释。近年来，"文化"一词，十分随意，有如一件可以在任何季节都能穿在任何人身上的时装。谈吃，有饮食文化（细分还有茶文化、酒文化、烟文化、食文化……）。谈穿，文化更深。名模、时装设计师，让人仰慕不已。谈住，各类建筑，当然是文化。谈行，高档汽车、万吨巨轮，航天飞机，更是当代文化的高峰。有朋友戏言，如今文化一词，有些像妓女，只要有钱，谁都可以陪伴。周洪先生在《南方周末》著文说："有了吃文化，文化就被吃掉了。有了赌文化，文化就被赌掉了。所以，真正的文化所剩无几了。"

幸亏，"三星堆文化"是一个属于考古学方面的概念，有比较固定的内容。"还有一种对象物，学者们时常称其为'文化'……有一些作为人类活动产物的物品，如工具、武器、罐子、建筑、工艺作品等等。"（《文化：历史的投影》）。我们平常所说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当属此意。与之相同，"三星堆文化"也应作如是观。

按照这个定义，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对象，应该主要是对三星堆出土的器物的研究。通过研究而引申出对当时当地社会的各个方面的确认、判断和推测。而《三星堆文化》这部专著，却是"从考古学的三星堆文化开始发覆，遍及三星堆文明或古蜀文明的各个方面。"（原书《绪

新津宝墩古城遗址

郫县古城遗址

论》)这种写法,值得商榷。

"文明"一词,最早见于《易·文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但这里的词义则是英文 **civilization**,指的是社会进步的状态。它与"野蛮"相对而言,并且是以摩尔根和恩格斯的三个划分期来规定其含义的。这个"文明",一般是指城市的建立,文字的发展和使用,有冶炼金属的技术等等。以此观察,"文化"是对器物的研究,"文明"是对社会的研究。而这种社会必须达到上述标准,才能叫"文明"。

三星堆遗址,真正"达标"了吗?就目前所公布的材料看,下结论还为时过早。首先,城和城市应该是有区别的。据报载,近期,成都平原陆续在新津、郫县、都江堰、温江、崇州发现五座古城,而出土的文物,都与三星堆第一期文化相似,只有陶石器。这种城,当无城市之义——至少在目前没有其他实物佐证的情况下。而三星堆作为一座文明城市,某些方面也尚未"达标"(详论于后,此处从略)。而仅有的几个"文字符号",就认定三星堆文化期已有文字和使用文字,证据也很不充分。真正让人津津乐道的,只有青铜器、玉器和金器。所以,作为三星堆文明的概念,尚须得到更多的实物和文献来证实。

至于说:"三星堆文明从本质上讲,乃是古蜀文明的同义语,"这就更模糊了部分与全局的关系。因为即使将来完全证实三星堆时已是文明社会,后期的古蜀也还有相当的发展。

因此,就我的看法,时至今日,三星堆文化比三星堆文明更让人信服。如果将来我们的史实史料,能确认"文明"的概念,当然是大好事。而那时,在众多的实物面前,我们一定能对这个文明社会有更为深刻的认识。这将比建筑在分析和推测上的东西,坚实得多。

当然,"文明"对历史的某些"限制",往往会因新的发现而改变。譬如,我们一直把黄帝至夏以前的"五帝",作为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但是,在 1999 年,约 40 平方公里,呈正方形的"九宫连城"的黄帝黄城已经在桥山发现。如果将来能证实仓颉造字,"帝以神金铸器,皆铭题"(王嘉《拾遗记》),而《世本》所说的"蚩尤作兵"真的就是戈矛、剑戟等等,那么,黄帝岂不就进入了"文明时代"?

总之,我们对上古时代的事,实在是知之甚少。三星堆的文物所呈现的,也仅仅是古蜀王国的“冰山一角”。要想接近真实,能依靠的,只能是不断地探索。

# 三星堆文化的分期与断代

三星堆文化共分四个大的文化期。但有人认为第一期为新石器文化，与第二、第三、第四期内涵不同，不应列入早蜀文化的范畴。其实，三星堆是一个地域概念。它既然是遗址的一个文化层，当然属于三星堆文化。其所以和第二期差异变化较大，正说明有新的内外因素产生。从世界历史观察，譬如原来的美洲，在欧洲人没有去探险和发现它以前，大陆上的土著人过着极其原始的生活，却也有自己的文化。它是这块土地上的文化之根。而欧洲文明的“侵入”，使它很快发生了质的变化，进入了新的时代。这是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碰撞的结果。三星堆文化，也有相似之处。今天，我们研究三星堆文化，千万不能忘记最早在这块土地上生产生活和创造的居民。

在成都平原这块土地上，最初的居民是什么民族？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至为复杂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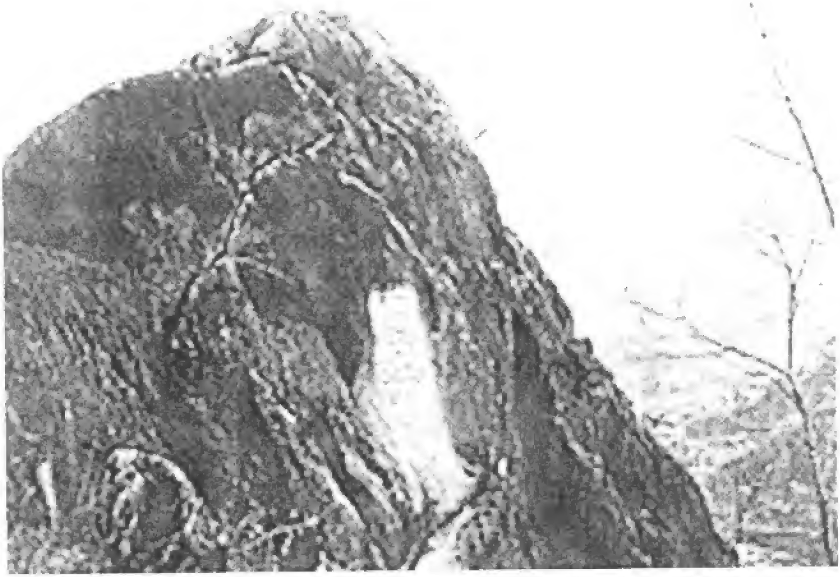
人类起源、地球起源、宇宙起源，是三个重大难题。而谁最先在四川这片土地上繁衍，至今也怕并不十分明白。

从各种传说看，蜀山氏的名称，始于因提纪。而庖牺氏已是禅通纪，黄帝则到了疏仡纪，晚了两纪。从九头纪开始至获麟，共276万年(引自《太古帝王表》)。考古学上的“巫山人”，其生存年代距今200万年，是迄今为止在我国，乃至亚洲发现的最早的人类祖先。然则蜀人的祖先蜀山氏，正是四川最古老的土著？

又有传说，伏羲的母亲华胥姑娘游华阳而生伏羲。那么，中国人类的“再生始祖”，也生活在四川。因为华阳者，秦岭以南的广大地区也。而《山海经》说，伏羲上下天地，正是经过都广之野建木。还有“女娲之肠”，也是四川。

成都平原的人，是伏羲的子孙？

以后的黄帝、颛顼、大禹，与四川的关系就更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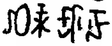
大禹诞生地——四川石纽山

不过，仔细想来，蜀山氏既然以“蜀”和“山”为氏，恐怕还是与高山有密切关系。

有许多学者都指出，蜀人是羌人的一支，其理由就不在这里多加转述了。我访问过叠溪——古之蚕陵重镇，竟遇到了蚕丛羌的后裔梁跃华。他给我们讲了许多他们祖先的故事。如果时至今日，还有一支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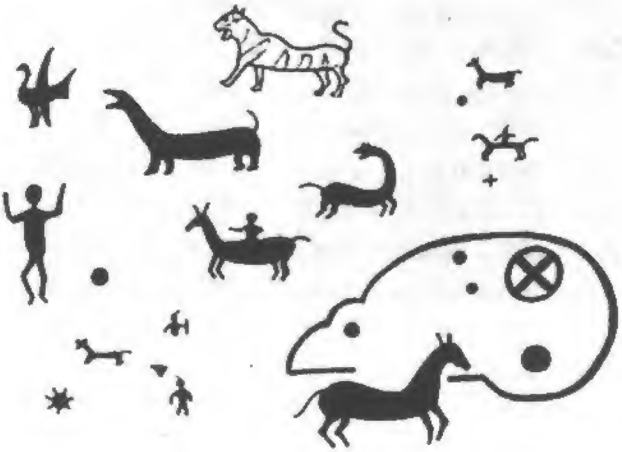
人叫蚕丛羌。那么蜀人是羌人的支系，是可以成立的。

然而，也有学者认为蜀人是古彝人的。他们说，是古彝人在四川建立了蜀国（见陇贤君主编的《中国彝族史纲要》）。因此，蜀人应是古彝人的一支。而古彝人长期就与濮人杂居四川盆地。但是，从大凉山的一些古彝文来解读，蜀人不仅不是彝族，而且还与之长期不合，现举例如下：

| 彝　语 | 直　译 | 意　译 |
| --- | --- | --- |
| | 濮徘蜀徊 | 言行错乱 |
|  | 头蜀尾氐 | 怪模怪样 |
| | 濮蜀濮蜀 | 吝啬小气 |
| | 尼语（即彝语）蜀语混 | 胡说蛮缠 |

从以上可以看出，古彝人从来看不起蜀人、濮人、氐人、巴人等，说他们是同源似乎不可靠。

蜀人是从蜀山（即岷山）上下来的，那四川的土著，应该还有哪些民族呢？



僰人岩画

古彝人在四川境内占有相当的地域，专家们早有述说，不用再唠叨。除了彝人，还有其他民族吗？

我面对一本四川详图发呆，脑海里搜索着是否有哪篇古文献提及此事。遗憾的是孤陋的我，读的东西太少了。然而，我从四川的古地名中，似乎发现了一点什么。在四川以蒲、郫、彭、僰等命名的地方，着实不少，这些读音都与濮人有关，那么，当时的土著，是否是濮族呢？

据吕思勉先生《中国民族史》有关濮族的论述，《牧誓》所指的唐、微、卢、彭，"尽皆为濮"（详见《微卢彭濮考》）。"濮族占地，实跨豫、鄂、湘、川、滇、黔六省也，"濮人支系繁多，故称百濮。多伴水而居。古时的川西平原河沟沼泽不少，正宜其居住。濮人以夜郎及滇为大宗，但散居四川的不少。在犍为，《说文》有载，但其活动地不只川南，"北有初襄五姓，居邛部"（《唐书》）"属威州者，有唐保、霸二州，因称保霸蛮"（见吕思勉著《中国民族史》）。50 年代初，我曾到凉山金阳一带。当地的老彝胞，听说我们来自成都时曾说，成都原是他们的住地，后来被汉人赶走了，才从低处搬上高山。这传说，也可能反映某些史实。而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头像中，有当属南蒙古利亚小种族之形象者，应是土著濮族系统的人士。

据蒙文通先生考证，古时巴蜀，有许多小国和诸侯存在，其中不少乃是濮人。而巴蜀所谓国君，实盟主而已。据此可知，古蜀国的发生和发展，也是多民族融合的结果。

段渝先生有论："先秦四川境内的濮人，多为商周时代已在当地定居的民族，……以川东、川南和川西南及成都平原最多，也最为集中"（《四川通史》第一卷）。而罗二虎先生对三星堆居民的族属也有详论（见《三星堆文化居民的族属》）。

那么，上古和远古，四川的文化，就是彝濮等土著创造的吗？其图景仍然是扑朔迷离。因为，天堂般的都广之野，它所透露出的信息，着实比我们已知的彝、濮文化要高明得多。如果有机会，让我们再专题讨论。

# 蜀人的由来

我曾想，今日之中国人，以汉族论，纯种的汉人恐怕是很少。我们都是“杂交”的后代。民族间的杂居和融合，使我们无论在躯体和环境方面，都有许多共同之处。正因为这样，许多古民族看起来也许是消失了，殊不知在我们今人的身上，同样可以反映出其某些特征。

蜀族得名于蜀山氏。这个氏族由来已久。《华阳国志·蜀志》的第一句话就是：“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也就是说，在考古学分期的旧石器时代，民族学分期的蒙昧时代，传说中的伏羲氏时代，蜀人的部落，就已经形成了。他们活动的地域，是在蜀山一带，所以名曰蜀山氏。而蜀山就是岷山。

至于这蜀山氏最早又是从何处来的，也是众说纷纭。一说是古彝人从滇池一带出发，来到昭通，沿岷江而上，到岷山聚居的，这主要是陇贤君等学者的意见。另一说则认为蜀人是古羌人的一支，是从青海的西北方向南下而到达岷山的，其代表是四川的任乃强先生。他在《四川上古史新探》中，有详细而精辟的论述。这些问题，还是让专家们去争论为妙。我们知道蜀人很早就在岷山繁衍生息就对了。

古羌人是游牧民族，他们到了岷江河谷，怎么变成了用野蚕抽丝的蜀氏呢？

羌人来到岷江河谷，并非一帆风顺。他们受到先在那里定居的戈基人的反抗。这段史实，反映在羌族最早的史诗《羌戈大战》和《嘎尔

茂汶羌寨

都》中。

《羌族释比经词》说，羌、戈基人摆阵比武，比劈柴，比用石头和雪坨拼打，比用木棍和麻秆打斗。三次交战，戈基人都失败了，羌人终于战胜了戈基人，在岷江河谷站稳脚跟。从这首史诗双方使用的工具看（石斧、石头、木棍），这场战争大约发生在石器时代。

戈基人，羌人称为“窑人”，说他们居住在半山腰的石洞中。再看氐字，甲骨文未见，而金文作[illegible]，像地上之洞。而戈基人其语音中的基，与氐音近。因此，疑羌人称为“戈基”的人，实则就是氐人。羌人的史诗《嘎尔都》说“羌人战胜窑人（戈基人）之后，双方便歃血为盟，保证今后互不侵犯。”（手抄本《羌族民间故事资料集》引自《羌族文学史》）这样，两民族渐渐融合，于是，才有蜀人来自氐羌的说法。

也有学者，以《后汉书·西羌传》为据，认为四川有羌人是在公元前5世纪末，也就是战国时期。其时，无弋爰剑的曾孙的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是为牦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

狼种武都羌是也，"因而认为《羌戈大战》是写此次南迁之役。这样，蜀人和羌人就毫无瓜葛了。

但是，《西羌传》所定的羌人南迁，并非第一次。因为，《竹书纪年》有"成汤十九年氐羌来贡"的记载。《诗·商颂》有"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王。"古羌人在青海、甘肃及四川西北部聚居，年代十分遥远。《羌戈大战》双方使用的是最为原始的武器，也恐怕不是战国时的战事。因此，认为羌人是公元前5世纪以后才到四川的说法，是不可取的。

羌人和氐人融合后，共同开发岷江河谷。发现野蚕的一支，才有了蜀的称谓。因为，我们知道，草原，特别是高寒草原，是没有野蚕的。野蚕多生长在山上的阔叶林中。1959年，我曾在北大荒放养柞蚕。每天在山林中用铜锣火枪哄赶鸟兽，其状与饲养野蚕差不多，可谓当代的"蜀山氏"。因此，我有这种切身体验。这是介乎狩猎与饲养的中间阶段。

当然，这些看法，又和"蜀之为国，肇于人皇"有矛盾。而且，蜀山氏到底是因蜀山而得名，还是蜀山因蜀山氏而得名，也不清楚。所以，这一切仍旧是一串串谜。留给人们继续探索。

放养野蚕，无从聚之便，产量也很低。真正要到"蚕丛"阶段，一定是经过许多年才完成的。如果黄帝之子娶女，还是蜀山氏，而"蚕丛国破"又在商初（此论见拙作《三星堆文化四说》），那么，可以说是经过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帝禹五代才完成的。这时的蜀人，要把野蚕家养，需要容器，需要贮藏桑叶，需要细致管理，不容它东游西逛。所以，《古文苑》章樵注引《先蜀记》才有"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之说。

家蚕的饲养，大大提高了蜀人的生产力。从此以后，蜀人这一支——蚕丛氏才开始富庶、强盛，并以丝绸及其制品，创造出几十个世纪的辉煌。

但是，蚕丛氏并没有永久地在汶川一带生活。他们在殷王朝的侵略和压迫下，又一次背井离乡。

《史记·正义》引《谱记》有"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嶲等处"一语。蒙文通先生说："可惜未说明蚕丛为谁所破，但可见各代之间还是有战争

的。"蒙先生所言极是。徐中舒先生在《先秦史论稿》中《夏代的历史与夏商之际夏民族迁徙》一文，对蒙先生的看法做了最好的注释。他详细地论述了"殷革夏命"以后，夏民族由于受到殷人血腥镇压向四处迁徙的情形。夏民族的失败，必然要波及他们的"亲戚"与"同盟"的羌人和蜀人。武丁以前，因无文字可考，具体情况，不得而知。即使200年后，盘庚东迁于殷了，对羌、蜀仍残酷地迫害。祀祖乙"伐羌十有五"，"今夕用三白(百)羌"，"断十牛，羌十人"，"多羌只鹿"，"多羌贵田"。对蜀人也有"王供人正蜀"，"五章佔于蜀"，"蜀射三百"的记载。在这种情况下，蚕丛焉能不破国!

蚕丛国破，当然引起了蜀族的迁徙。他们沿岷江南下，一支从乐山往西，沿大渡河至今汉源金口，往南到嶲等处(今西昌)。有的则顺赤水(雅砻江，上古时为纵向河流)而下，一直到达姚(即今楚雄之姚安)这就是"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嶲等处"的注脚。

而"等处"又如何理解呢？我的解释是一支沿岷江而下的，没有西去，而是直往南走，抵岷江尽头之长江即今宜宾，然后渡江至朱提，即今之昭通。这里是个海迹平原，很适合人类居住，而且农业、冶炼都很发达(这一片应是古彝人的住地)。于是，一支蜀人留了下来，发展成后来的杜宇部落。

还有一支，也许是势力最大的，他们不愿远逃，而想伺机复国。于就近翻过与岷山相接的玉垒山脉，进入四川盆地的边沿，建立了柏灌和鱼凫两代王朝。

据任乃强先生考证，蜀族的这一部分，是从雁门关东岸的安山乡，沿着小溪，翻越高达四千多米的九顶山，进入今彭县北部的。

今彭州最北端的大宝乡，正与汶川接壤。其间的白水河，从北向南，流入湔江。80年代末，我曾被组织安排到那里去深入生活。白水河两岸，层峦叠嶂，而河谷间却有许多的宜于种植和放牧的小台地。如连甲坪、大坪、国舅坪、团山坪、牛圈沟等。这些小台地，比起他们过去的茂汶盆地，当然狭窄许多。但气候比较温暖，作为暂时的根据地，还是可以的。于是，他们就在这里定居下来。那里山高林密，雀鸟很多

至今，在银厂沟一带旅游的人，有时还能看见羽毛鲜艳奇特的大鸟。《山海经·南山经》说青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其音若呵，名曰灌灌，佩之不惑，”也许当时的河谷上，也有许多这样的祥鸟，其地域又在白水河上流。所以，他们就以百(白)灌为名。

当这支蜀族经过几代生息繁衍，人丁兴旺后，这些台地就显得太狭小了。暂时不能回到茂汶，就只能顺着地势向南前进，一直走到湔江中游，今名小鱼洞一带。

这个地区海拔1000至1500米，有河谷丘陵。湔江横流，灌溉方便，气温较暖，雨量充沛，适宜农牧。这里不仅有一片冲积平原，水面也十分宽阔。其间的小鱼洞是产“嘉鱼”的地方。《蜀都赋》说：“嘉鱼出于丙穴”，正是指这里。前年1月，为录制《雾中的王国》，我们钻进了如今已是岸边的小鱼洞。下到洞口，但见洞里全是水雾，摄像机每拍几个镜头，就得擦拭。洞里的水，清澈见底，哗哗流淌。陪我们进洞的老乡说，这里的鲤鱼，过去多得很，而且还很特别，全是一尺多长的青尾鲤，肉又肥又嫩又细，而对岸的大鱼洞则是较小的红尾鲤。走出洞外，他指着几里宽的干河坝说，过去，湔江的水很大，春秋两季，河面上有好多成群结队的野鸭子啊！多得你数都数不清。而今，水小了，不知它们飞到哪里去了。从他的神情中，我知道他正在回忆过去这里的美丽景色。他的心情也感染了我。也许，正是那些色彩斑斓、体态优美的野鸭，让蜀人把自己的部落，命名为鱼凫氏。《华阳国志·蜀志》也才有“鱼凫王田于湔山”之说。

蜀人在小鱼洞一带，一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很快又有鱼凫国破之说，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 鱼凫国破说

关于鱼凫国破，古文献的记载都寥寥数语。“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之于湔。”(《蜀王本纪》)“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华阳国志》)还有一个版本的《蜀王本纪》则说：“(鱼凫)王猎至湔山，便仙去，今庙祀之于湔。”(引《御览》卷八八八)这就给后来的学者和作家留下了极大的想象空间。于是，有学者说三星堆就是鱼凫王的都城，鱼凫王是被杜宇所灭的。也有的学者在著作中引用了邓廷良先生的《丛林战舞》，勾画了鱼凫王灭国时的悲壮。他们说：“来自蜀国以南朱提的年轻的杜宇王，趁鱼凫王朝倾精锐北上参与伐商之际挥师入蜀，一路势如破竹，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打到了三星堆蜀都城下……城内，鱼凫族将士在三个巨大的黄土圆丘上，也点燃了祭天地祖先的燔燎，从西南商道入贡国都的数十头珍贵大象，被全部宰杀慰劳与社稷共存亡的将士们。象牙连及国之重器青铜纵目大面具、青铜神树以及巨大的玉石璧璋与贝货珍宝，被依次投入几座火坑……终于，鱼凫王和他的将士们淹没在翌日的清旦的血泊中。”

这悲怆壮烈的一幕，如果作为文艺作品来读，无关紧要。相声中，张飞还可以战岳飞呢！但若作为描述一段历史，就有必要进一步探讨了。

我在前文中已经述及，有些学者把湔山定在灌县境内沿白沙河一带，如果“王猎至湔山，便仙去，”就根本没有到过三星堆。那么，这决死

一战，就子虚乌有了。我认为三星堆是杜宇的都城(后面将详细论及)，当然也不可能有这么一场战争

鱼凫王是因为“倾精锐北上伐商”而被杜宇乘虚而入吗？也有疑问。《尚书·牧誓》是提到蜀的。整段话是这样说的：“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翻译成白话，应该是：“啊，我敬爱的友邦君王和各级军事官员，以及参与伐商的庸、蜀等族的朋友们：请举起戈，列好队，竖起矛，听我宣誓。”从以上可以看出，参加伐纣的一个国名都没有具体提及，提及“蜀”的，是在“人”的范围内。所以，“蜀”、“羌”参加伐纣，很明显不是以国家的名义出现的，又怎么能叫“倾精锐”呢？

也有说“周师伐鱼凫氏之国，克蜀”的(见《四川通史》第一册附录大事年表)。与前者不同，三星堆一战的主角当然不是鱼凫王与杜宇。《逸周书》有新荒命伐蜀的记载。说五天之内，伐蜀的将帅就班师凯旋。不说西周镐京、东周洛阳，就是从周朝的边境出发，五天也走不到蜀国的三星堆或今彭县的湔山，更不说还要打仗，还要班师了。这显然不是成都平原的“蜀”。

再说，杜宇能不到一个月，就来到“三星堆城”下吗？杜宇从朱提渡长江，沿岷江而上，一路要遇各濮族小国的狙击，在江原还有“完婚”的大事。征服了这些濮族小国，还要教他们务农，取得信任才能联军伐鱼凫……一个月不行，五个月也不成。即使是“艺术虚构”，也还有不少漏洞。

鱼凫氏的“仙去”，与杜宇无关，是被土著人赶走的，我们可以从《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中，找到一些线索。

从岷山而下的蜀族，为了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与当地的土著(主要是濮人)是会不断地发生战争的。其情况就与十六七世纪欧洲人征服南北美洲差不多。他们来了又被赶走，赶走后又来。所以，从蚕丛国破开始以至柏灌、鱼凫，“此三代……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鱼凫氏在湔江立住脚，一定会侵略周围的土著，也必然遇到土著人的坚

决反抗。他们虽然比土著人先进，但是正如《蜀王本纪》所指出的“时蜀民稀少”，他们人数不多，在成都平原上，多数是土著人。于是，他们又一次被赶走，也就是“仙去”。

但是，这次“仙去”，不是躲回彭州北端的深山再伺机复出，而是被彻底破国。让其子民顺着岷江河谷往南流浪，必定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宝鸡強国墓中的象尊和铜虎

我认为，鱼凫国破，与参与伐纣有直接关系。

公元前1026年冬，即周文五十二年，太公姜尚，派使节入蜀。联络蜀王鱼凫氏，会同西南巴濮各部，相约次年春天，会师孟津，进军朝歌，共建新的王朝。蜀与周人，本是姻族。加之长期受到殷人的镇压和残

害，早对"瘟商"恨之入骨。所以欣然加盟，倾其精锐北上伐纣。而蜀中彝濮等小国，对蜀人来到川西平原屡屡吞食他们的领土十分不满。但蜀人武器精良，又抵抗不过。然而，驱蜀之心，早已有之。因此，趁蜀军挥师北伐，国内空虚之际，一举摧毁了鱼凫王朝。于是，蜀人又一次亡国。

亡了国的蜀人，沿着岷江南下。温江、犍为、泸州，以至川东等地，都有他们的足迹。也有北上想回茂汶故地的。所以古灌县也有蜀人的身影。

按说，蜀国既加盟伐纣，《牧誓》中，蜀就应该在"我友邦家君、御事……"以内，但誓词中讲的都是"蜀人"。那么，鱼凫王朝的覆灭，当在牧野誓师之前。

鱼凫王朝在蜀中失国了，参战的武士，继续参加伐商的战斗，他们在战争中立了功，其首领封为伯。因为他们都是战士。所以，在鱼凫氏的鱼字旁，特别加了一个"弓"字。并在渭水之南，清姜河西岸的地方，为他们建立了一个国家—强国。

1999年4月1日，我们到宝鸡参观青铜器博物馆。馆中有大量文物出土于茹家庄、竹园沟、蒙峪沟口和纸坊头等处。其中鼎器的制作和格式，已完全是殷商的中原特色，但其武器如戈、剑、矛等却明显地与古蜀文化如彭县、新繁和广汉出土的器物相似。使我更相信这强国的主要成分，是留在中原的原蜀国将士。他们没有从龙门山南下回到川西平原，正说明蜀中的鱼凫王朝，已暂时不存在了。而在其他的一些青铜器物中，如鸟、象、鱼、龙、貘、猪等，可以看到三星堆青铜器的因素。特别是三只足的青鸟，与三星堆的一些神禽神兽，异曲同工。但多数已有实用价值，

宝鸡出土之车上的铜人

成为尊、匜等容器了。周人用车已经很普遍，车上有各种青铜饰物，其中人的手形，与三星堆青铜大立人的“手印”十分相似。说明两者之间有某种渊源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強伯的正妻叫井姬。可以看出，周武王为了留下这批蜀中将士，特别把自己族中的女子嫁给他，以表彰他的功绩，巩固他和西周王朝的关系。据说，強国最强盛时，南界曾越过秦岭，达到嘉陵江上游。但他们始终未能进入四川盆地，恢复鱼凫王朝。历史的重任，落在了杜宇部落的身上。

在宝鸡期间，我们在宾馆会见了宝鸡青铜器博物馆馆长张文祥和张亚炜先生，我把那“弓”旁所透露出的信息和我的看法，告诉了他们。他们感到很有趣。因为，他们都参观过三星堆博物馆，也发现三星堆文化与強国有很密切的联系，并且，也正在认真探讨。

《蜀王本记》说：“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之于湔。”据光绪《彭县志》记载：“古蜀王祠，盖即阳本观，祠蜀王鱼凫也。”它在今彭州市新兴镇的老君山。

# 杜宇的族属

关于杜宇的族属，有三段文字，值得注意。

一、《蜀王本纪》："后有男子名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宇妻。乃自立为王，号曰望帝。"

二、《本蜀论》："望帝者，杜宇也，从天下。女子梁利自江源出，为宇妻。遂王于蜀，号曰望帝。"

三、《四川通志·纪闻》引《蜀王本纪》则为："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出天堕山。朱提有一女名利，从江源井中出。"

《四川通史》(1993年版)，将《蜀王本纪》的"从天堕"解为"蜀国以外"，并以"止朱提"释为"来源于朱提"，于是，定杜宇为濮人或彝人。

"止朱提"，可以理解到朱提，停留于朱提，却很难说成就是朱提人。《诗经》"邦畿千里，维民所止"确实有居住、栖息之意，但《本纪》前有"从天堕"之句，就不能说成土著人了。说杜宇的妻子出自江源，当为土著无疑。

"从天堕"、"从天下"，天在什么地方？"出天堕山"，天堕山又在哪里？古人对天上山上，有同义之意。神仙们生活在天上，实则生活在山上。希腊神话中的天上诸神，就住在奥林波斯山上。中国的神仙，也该住在天上，但在《山海经》中，却又都住在山上。所以，从天堕，当做从山上下解。具体以成都平原来说，最高的山，当为龙门山脉的岷山。

杜宇一族，为什么要下山？这就要追溯到夏商之际的民族大迁徙。

拙作《三星堆文化四说》中，已有述及。应该补充的是，当时的那种“民族大逃亡”，并不把所有的目标都瞄准未知的成都平原，而是以“鸟兽散”的形式，四处逃窜。所以，才有“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巂等处”的话。这个“等”字，应该包括“从天下止朱提”的蜀族杜宇部落。

朱提与岷江的尽头，只一江之隔，是一个大山丛中的小平原，地貌略似茂汶盆地。它附近的铜矿、银矿，古时就已开采。加之云南是中国最早的产稻区，杜宇部落，流落到此后，不仅学到先进的铸造技术，也学到了先进的农耕技术，成为一支有实力的部落。

朱提，即今云南昭通。这里是万山丛中的一块海迹平原。矿藏十分丰富，其中，出产铜、银的名声远播。自周秦起，就为中华知名人士称道，见于历代《食货志》。蜀人早就懂得炼铜，流落到此，学到了更为先进的铸造技术。云南滇池一带，是中国最早的稻作区之一，移居到此的蜀人，又学到了更为先进的农耕技术。于是，这支蜀人的杜宇部落实力渐渐强大起来。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沿江重返呢？我估计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朱提这块海迹平原，实在太小，有碍进一步发展。二是鱼凫氏战败“仙去”，部分蜀人沿江而下，来投靠自己远在朱提的亲族，希望他们去“报仇雪恨”。同时，也讲了成都平原的富饶。为了发展和开拓，使他们折回川西，重振蜀族雄威。正因为这样，他们沿江返回时，没有再回岷江河谷，而是过新津，经江源，直奔汶山下之郫邑的。

鱼凫南迁之说，并非毫无根据。因为，沿岷江而下，犍为郡之南溪，有鱼凫津。泸州纳溪河下游，有鱼凫关，再往东，至今奉节一带，则有鱼复国。明代大学者杨升庵曾有一诗：“鱼凫今日是阳关，九度长征九度还。”看来，他往返于川滇之间，是多次经过这个关口的。今日有学者以为杨氏记忆有误。但经过九次，才写《鱼凫关》这首诗，决不可能是笔误。杨氏在《永宁杂言》中说：“《蜀本纪》鱼凫氏治江阳，即今永宁鱼凫关也。”必有所本。而杨氏回川之路，也多是经过昭通、筠连、永宁，到今泸州的（明时，昭通属四川乌蒙府）。

如果按杨氏所说，鱼凫氏曾治江阳（即今泸州），那么，这支残部依

附邻近的同族杜宇氏，回师北上，“收复失地”——成都平原之湔山一带，并逐渐发展壮大，则在情理之中。

而川东之鱼复国，也可能是鱼凫氏国破后，沿岷江、长江，在川东立足之后裔，并非鱼凫氏为争夺盐利派出的士兵。

祭器坑出土的青铜立人像

古江源在岷江旁，离今崇州城址不远。不知今日发现之“双河古城”是否是一个地方？总之，这里河流纵横，是居住的好地方。

“双河古城”是古平原上土著聚居点。古文献说，有女子名利（或为

杜宇与梁利(民间藏品)

梁利),“从江源井中出”。这“井中”又为何意,论者很少。人是不能从“井”中钻出来的。这“井”字很值得研究。“井”如果不指实物,那么,就

只能指星象和卦象。

《华阳国志·蜀志》引《河图括地象》:“岷山之(地),(上)为井络,”意思是说,岷山之地,都在井星的笼罩之下。指地理位置。如我们的《汉州志》(乾隆版)关于《星野》说:“汉州应在井鬼之次,八参三度”即是。《易经》之井卦:上卦(坎)为水,下卦(巽)为人,郑康成《解》曰:“井之象也,井以汲人,水无空竭,犹君子以政教养天下,惠泽无穷也”。梁利对古蜀发展的贡献,也可作如是解。

可以作以下的猜测:鱼凫氏被土著的濮人赶走“仙去”以后,成都平原,仍是土著的势力范围。因此,要再度进入平原地区,决非易事。其间,必有许多战事。蜀人过去,一直与土著处于敌对状态。所以,虽有反复,始终不能在川西平原站稳脚跟。直到杜宇与土著女子梁利联姻,蜀人才真正成为成都平原的一分子。而三星堆文化,正是蜀人和土著人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结果。

一个有趣的例子:1604 年,英国人约翰·史密斯带着新移民去北美的弗吉尼亚,开辟殖民地。结果,被 400 多个伯哈坦族的印第安人袭击,最后落入印第安人的手中。史密斯被绑在树上,当射手们准备射出死亡之箭时,大酋长伯哈坦最疼爱的女儿波卡荷塔丝却爱上了他。悲剧没有发生,几经波折,终于结成夫妇。印第安人与英国移民之间化干戈为玉帛。

我不知道 17 世纪在北美洲的这一幕,是否在 3000 年前的成都平原也曾发生过。但蜀人与土著的通婚和联姻,最终创造出灿烂的古蜀文明,则是无疑的。

杜宇族与土著联姻,使他们在川西平原立住了足。他们带来的稻作文明和金属冶炼技术,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的生活,得到当地土著的拥护。那些“隐去”的蜀人也纷纷复出。这时,杜宇才能“自立为王”,“都汶山下,邑曰郫”,开始建立真正具有联盟性质的国家。

至于《四川通志》所引《蜀王本纪》称杜宇“出天堕山”不知所出何种版本,暂不议论。

# 古蜀的都邑

古蜀的都邑，是一个大有争论的问题。由于文献资料太少，因此，专家们各持一说，使我们这些普通的读者往往摸不着头脑。我在这众说纷纭的迷宫里徘徊多时，仍不得要领。不过，也有些想法。

除开明氏的都邑，比较清楚外，从实物看，三星堆最具有都邑的特色。但谁都知道，三星堆这个地名原于三个人工土堆，古书是找不到的。文献所指的地名则有“瞿上”、“郫”和“樊乡”等处。

“瞿上”到底在哪里？

“蜀山氏，其始祖蚕丛，纵目，王瞿上。”（《路史》）

“柏灌都于瞿上，至鱼凫而后徙。”（《成都记》）

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蜀王本纪》）

“后有王曰杜宇——移至郫邑，或治瞿上。”（《华阳国志》）

“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蜀王本纪》）

从以上引文，可以分为三个问题：一、蜀族从蚕丛以后，是否都“王瞿上”？二、“瞿上”又到底在哪里？三、樊乡与“瞿上”是否是指同一地方？

首先，蚕丛国破时，尚在岷山河谷。而“瞿上”的地理位置，可以肯定在成都平原，所以《路史》之说，有明显的错误。

蜀王柏灌，据任乃强先生考证，是“蚕丛支族的领袖，并且亦自成立为一个独立的氏族，还可能就是进入川北盆地的一个氏族首领。”因此，

亦不可能都于成都平原的“瞿上”。《成都记》的说法,也不可靠。

《成都记》又说,“瞿上”,“至鱼凫而后徙。”这就是说,鱼凫原来也都瞿上的,后来迁到别的地方去了。这句话也值得研究。

《华阳国志》说,“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

这里,首先得弄清湔山的位置。有人根据《水经注》,说湔水在灌县之上游,“绵虒之西”。蒙文通先生详细考证后,认为“道元泥于县在山西,遂疑水亦在西,则固矣。遂移湔水于都安上游入江,斯为误矣。”(详见《成都二江考》)他指出,“湔水出玉垒,在今之彭县,然则大江(岷江)以东,岷源以南,止于灌口之山系,胥曰湔山,入后曰玉垒。”因此,可以肯定,湔山是指彭县小鱼洞至海窝子一带,即任乃强先生所指,湔江上游与白水河之间的地区。“田于湔山”实为在这个地区耕种开发之意若释为“畋”,很可能出于要将三星堆定为鱼凫之都城,为圆此说而引申的。令人感到有些牵强。

小鱼洞至海窝子一带,为成都平原的边缘地区,这瞿上无论在广汉、双流、温江(温江古埂,有鱼凫城之名)都与之相距甚远。温江鱼凫村,经发掘为史前遗址的可能性较大,非鱼凫遗迹。而称双流为瞿上,其主要根据为《路史·前记》的罗苹注:“瞿上城在今双流县南18里,县北有瞿上乡。”值得注意的是,时至今日,双流县还没有发现前期蜀国的遗物,能证实上述地区为古蜀都邑的。我也与有的专家有同感:罗注把传说孔子的弟子之一的商瞿上故里在双流,误为蜀王都城。果真如此,则可谓张冠李戴。

把双流称为瞿上,还有一说,则是商代器皿中有“瞿父鼎”。经考释,商代有大夫曾受封于瞿,故地在今四川双流县之瞿上城。这个解释,是先根据瞿上在双流,而指瞿父的封地在蜀的。因此,不可为据。

但是,“鱼凫氏田于湔山,”却也并不排斥曾到过瞿上。因为,开发成都平原,是与对土著人战争联系在一起的。胜利了,就能前进,甚至到达平原的腹地。败了,就只有退回自己的根据地湔山一带。鱼凫是在湔山“成仙”的,所以《蜀王本纪》只有“祠”而无“都”的记载。因此,鱼凫氏是否有都城,这都城究竟在哪里,还是个谜。

古蜀人真正强大,应是在杜宇时期。《华阳国志》称他"移至郫邑,或治瞿上"。很明确,他是从江源,到达过去鱼凫氏的根据地的。因为,这个"郫",乃是湔江平原的南端,今日之磁峰一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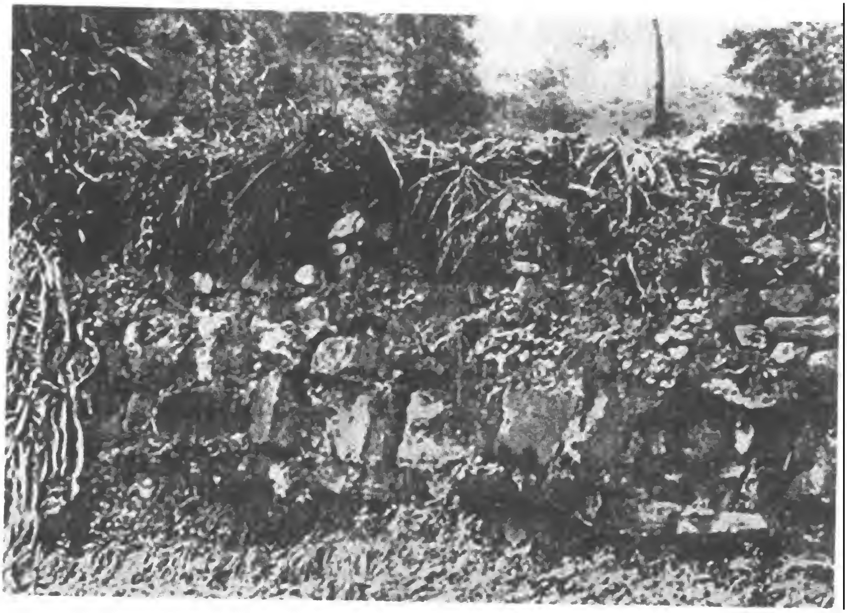
我觉得,郫与濮是同音字。古人完全有可能把濮人念为"郫人"。而濮之地,濮人聚居点是很多的,就有如今日四川县县都有张家院子、李家院子一样。但都是张家院子,却有不同的地理位置。"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就不会是成都平原中心的"郫"。所以,为了区别,开明八代建都的郫城曰郫,而把磁峰乡汶山下的郫称之为小郫。《彭州志》(嘉庆版)序里说,小郫这地方"产多嘉种",与杜宇教民务农,也很吻合。可以说,这里才是成都平原稻作文明的发祥地。希望不远的将来,能为考古发现所证实。

所以,我认为有的人把两个"郫家院子"弄混了。

我想,磁峰这里所以叫"小郫",是后来开明氏都郫以后,为区别两者而改的。前年 1 月,我们专程去皇城山,准备拍些镜头,谁知天公不作美,下了蒙蒙冬雨。汽车无法上山,我们就在山脚下与老乡们闲聊。当地的村民说,皇城山是这里的最高点,向东,可以看见湔江。天气晴朗时,甚至可以瞧见彭州城。向西灌县的白沙河,也在视野之内。山腰有石围墙,还有石门,山顶有平坝。我们向他们打听:"为什么这座山叫皇城山?"老乡们说:"过去,有一位叫杜威虎的皇帝,曾经在这里建了一座都城,所以叫皇城山。只不过没有住多久,就迁走了。"我们故意说:"我们怎么没有听说过四川这里出过姓杜名叫威虎的皇帝?"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其他地方的人,咋晓得?我们也是听老人们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

老乡们讲的杜威虎,难道就是杜宇?因为不能上山,我们打算另找时间专门去考察。但它也提供了一点印证古史的线索。我们建议有关方面能认真做些调查。可以相信,彭州境内,一定还隐藏着许多古蜀的历史。

从城皇山往下走,有一座"郫县水泥厂"和一座"郫县煤矿"。煤矿已经关闭,水泥厂也处于半停产状态。郫县人选取这里办厂,真是一种



皇城山山腰的石围墙遗迹

巧合！

《蜀王本纪》说杜宇在郫积百余岁，因之，可以看出，杜宇“或治瞿上”，已经是治郫一百年以后的事了。治瞿上的时期，当为从自称为王，到巴蜀的小诸侯们都拥戴的时候。也就是说，瞿上是杜宇鼎盛时期的都城。

杜宇氏从江源进入成都平原，由于与土著采取和睦的联姻政策，取得土著的信任，又“教民务农”，势力得到发展。经过 100 多年的惨淡经营，终于建成蜀国，并定都瞿上。

瞿上又在哪里？我赞成庄巨川、林法仁先生在《“瞿上”新探》的意见，瞿上即樊乡，在今三星堆一带。关于这一点，拙作《三星堆文化四说》已作表述。有人认为三星堆是鱼凫氏的都城，其惟一的根据是出土的陶、铜、金器中有鸟头的图式。然而，以此作为定论是不可靠的。因为，不仅“柏灌”、“鱼凫”是以鸟为名，就连“杜宇”也“化鹃”了。所以，鸟

头非鱼凫专有。广而言之，氐羌部落，以鸟为号的不少，他们都将鸟作为神来崇拜，“氐羌以鸾鸟”(《逸周书》)、“氐羌献鸾鸟”(《说文》)早有记载。杜宇是蜀人，他们就不会忘记祖宗的训示。真正起变化的，是荆人鳖灵统治蜀国以后，开明后期鸟头状的物品渐渐消失，正是历史的反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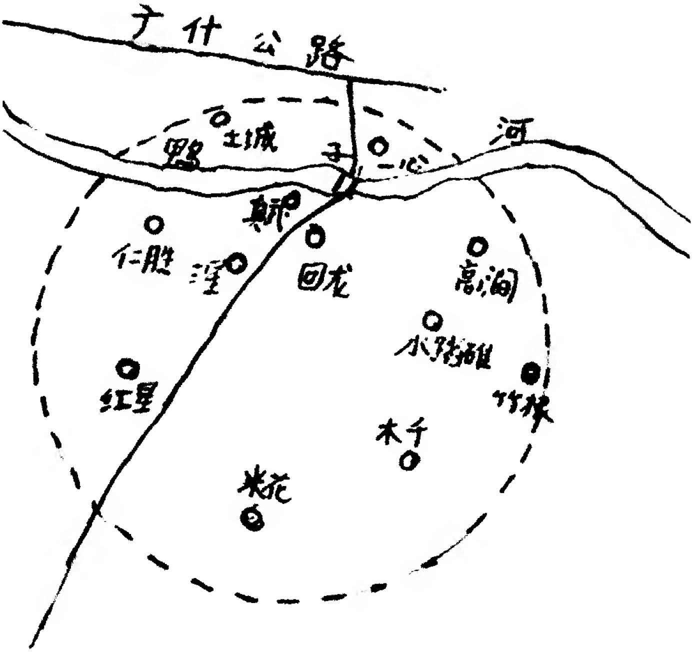
还有一点，鱼凫氏的势力范围，就在其强盛时，也只在灌县、彭县一带。那时，它只是成都平原周边的一个小的“诸侯”，人数也不多。(《蜀王本纪》中，特别有“时蜀民稀少”一句，指杜宇之前蜀人与土著的比例)。更重要的是，鱼凫氏时，田耕文明，既没有“上规模”，也没有“上档次”，要创造三星堆那样辉煌的文化，实在是难以想象的。

瞿上之名，源于上古。瞿上者，瞿上城之谓也。“仰而四顾，所谓瞿也。”(《埤雅·释鸟》)意思是看起来让人惊诧的样子。上者，高大也。《诗·周颂》：“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因此，瞿上城，应是让人惊叹的高大城邑之意。它和都广音近而意同，该是指同一地方。

我在《〈山海经〉断想》一文中，认定都广即大都，帝俊即大帝，都广就是帝俊(炎帝)的都城。后来，虽遭洪水毁灭，地名仍旧的存在。蜀人正是在这座伟大的废墟上，修建了自己的都城，向世界展现出自己独特的文化。从考古发掘看，今三星堆很可能是都广的中心城邑，而温、郫、崇、新(津)、灌，以及其他尚未发现的古城遗址，是其卫星城。而从地貌看，三星堆居北，也该是最高点。

关于古蜀都邑的位置，现在划定的遗址范围是否准确，我也有些疑点。

我是在鸭子河边长大的。几十年来，鸭子河的河道，一直是往南移的。为了保住广汉这座城池，在它的西北面，解放前就修有一条五六里的长堤。我家住在金雁桥的下端，不仅修了条支水笼，还修了分流的堰渠。但是“几十年河东、几十年河西。”过去，我家的大院外，有一条通往和兴场的大路。大路之北，有几十亩旱地，旱地以北，才是河堤。河堤下面，是一大片长着芭茅的河滩地。面积之大，那些躲避军警捉拿的大烟鬼，可以在芭茅丛中摆起灯烧烟，就可想而知。再往北，才是鸭子河




三星堆古都邑之示意图

的河水。应该说，从我家院子门口，走到水边，至少也有半里之遥。

60年代中期，我从外地返回故里，想到儿时的住地看看景色。已是中年的乡友，指着河水对我说："你们家的院子，早被大水冲光了。看，河中间，就是你们家院子背后的水井位置。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就是你家的竹林盘……"当时，我心里充满着一种沧桑之感。就因为此行，在"文革"中还受到"深刻的批判"。但仔细想来，河北面的古遗址，何其多也！严君平的卜卦台，长长的五里巷，都证明由于广汉的地势是北高南低，鸭子河一直往南改道。广汉县城，一直被迫南迁。所以，清乾隆《汉州志·古迹》说："废雒城县在今治北一里许"。而嘉庆《汉州志·

雒县砖考》载，北门外之金坪街五里巷是古雒城的遗址。现地的城池，是隋代兴建的。鸭子河的南移，与三星古城也有很大关系，我曾几次与朋友一起，站在月亮湾的高处极目眺望。一个龟形的高坎，从三星的仁胜村东面，沿着石林、米花、直到西林的水千、水踏碓、高涧，越过鸭子河到新平（即太平场）的一心村，一直到武村的西面，形成一个椭圆形。而听一些农民说，近两年太平的一心村范围内，就发现有窖藏的玉石器。为此，有理由认为，现在发现的东、西、南墙城，很可能是这座古都的内城，而这个内城，似乎应在整个都城的中心。所以，遗址的范围，不能以鸭子河为界。建议文物部门，多多关注鸭子河北面的情况。

# 三星堆的"堆"

将古蜀文化以三星堆命名,源于这个遗址上有三个特别引人注目的土堆(至今实际上只存半个土堆)。有关情形《三星堆文化》一书,曾有较详描述,现摘要如下:

"所谓三星堆,实际上是三个起伏相连的黄土堆。隆起部分呈椭圆形,南北长,东西窄,最高处高出旁边田地约十米。因历年挖土烧砖,现仅存半个土堆。……为人工堆积起来的。

"土堆内包含物只见一、二期陶片,……说明该土堆早于一、二号坑的时代。对于该土堆的性质,……我们认为该土堆或者和祭坛有联系,或者本身就是'封土为社'的祭祀对象。这一现象,在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中,也得到证实。……与此相应,三星堆一、二号坑的位置,紧靠土台的西南外侧,其方向也恰好对着被称为'三星堆'的三个土堆——祭台……"

三个土堆,已被挖掉两个半,从出土的器物看,既无骨骸,也无陪葬物。所以,肯定不是陵墓。但真的是祭台吗?

作者以三星堆为祭台,主要的文献根据是《礼祀·祭法》所云:"燔柴于泰坛,祭天也。"以及《风俗通义·祀典》所述"封土以为社而祭之,报功也。"且不说土堆堆成的时间早于一、二号坑,不能用一、二号坑的祭法来推断土堆的功能,即使是上面的文献,似乎也不能证明土堆的性质。

《礼祀·祭法》云:"燔柴于泰坛,祭天也;埋于泰折,祭地也,用骍犊;

残堆近影

埋少牢于泰昭，祭时也。”这里很明白指的是周人祭礼之法，并不能等同于古蜀人。还有，泰坛泰折，一指圆丘，一指方丘，绝不会是同一地方。另外，残存的三星堆土堆的地貌，既非方丘，也非圆丘，看来此说不确。

至于土堆用于社祭，更加缺乏依据。《礼记·郊特祭》说：“社祭土而主阴气也，君南向于北墉下，荅阴之义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若把三星堆之土堆当做坛，却找不到围坛之墙的痕迹。而且，当时蜀人计时之法，也无文献可考。社祭是祭土地的演变、发展和神化。社祭必有其主（神农、后稷）和象征物（松、柏、栗、石），这些象征物全是大地所生长。若把青铜树作为象征物，也不合理（因为它是神树）。

所以，以三个土堆作为祭坛解，尚难圆其说。

那么，它当为何物？

在上古时代，有“灵台”一说，《诗经·大雅》有《灵台》篇。《孟子》也有“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

沼。"但"灵台"却不是周族才兴起的。

《山海经》中，提到台的地方就更多了。有轩辕之台、帝尧台、帝喾台、帝丹朱台、帝舜台，还有共工之台等等。它主要是用来纪念先王，同时还有驱魔镇邪的作用。且看《大荒北经》"禹堙洪水，杀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堙之，三仞三沮，乃以为地，群帝因是以为台。"也就是《海内北经》所说的"帝尧台、帝喾台、帝丹朱台、帝舜台。"

人们说蜀夏同源，夏人的许多礼仪与蜀人相同或相近。而杜宇之前，先蜀本有三王，因此，这三座土堆，该是蚕从台、柏灌台、鱼凫台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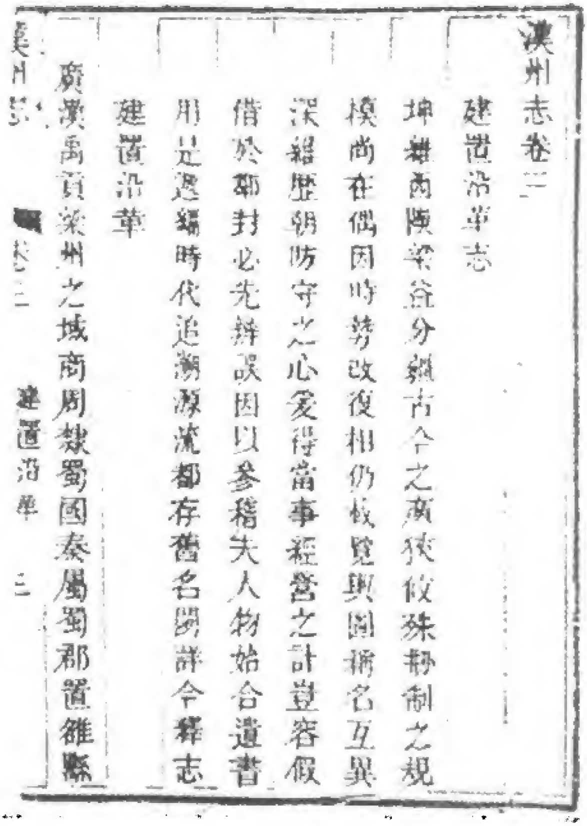
古代的台到底是什么样子，今日已难窥其全貌。《释台·释宫室》说："台，持也，筑土坚高，能自持也。"实乃高大的土堆。这是对山岳的模仿，是对神灵居所的崇拜。统治者高居其上，与庶民同乐，也就是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上。所以，台不仅是祭天之用，也是去上天的通路，立国的象征。

三星堆的土堆，既不高大，又不成形，更无装饰之遗痕。因此，不可能是上古帝王举行登位仪式的高台。若是后人为纪念先王而修的祭台，那么，将三代贤王，不分先后，不分世系，横向排列，也不合礼仪。因此，它既非礼仪用，也非祭祀用。

关于三个土堆，又有灵台、时台、囿台之说。但三台各有各的功能，很难紧紧靠在一起。如灵台，按《诗经·大雅·灵台》的提示："虡业维枞，贲鼓维镛"，"於论鼓钟，於乐辟廱"，台上要有放许多乐器和乐师们的活动空间的。当然还得有观天的仪器璿玑玉衡。据传说，在月亮湾西边的青龙包，有农民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墨绿色的璇玑。那么，古蜀王国的灵台，该在青龙包。此事是否属实，文物部门不妨加以调查。时台，是观四时之施化的。其位置应该在开阔地的中央。三星堆遗址内，有一个叫"螺蛳坟"的大土堆，就高耸在马牧河畔。据当地的农民讲，过去，这个土堆很大，解放以后，因被蚕食已小了许多。在"开荒种地"时，也发现有古器物。如果把它当做时台，倒是很适中的位置。囿台，是观鸟兽鱼鳖的，它应该有山有水。我看月亮湾倒也符合条件。但这也全是

推测。还须进一步考察和论证。如今的“三星堆”，聚集在一起，很难实现三台的功能。

应该着重说明的是，那曾经有过的三座人工土堆，原来是不是堆，值得怀疑。因为，从地貌上看，“在南城墙以北的城内，也有一条土埂（与南城墙平行），长约200米。其上有两个缺口，将土埂割为三段，当地称之为‘三星堆’。”（《三星堆祭祀坑》，第12页，文物出版社）因此，它原来并不成堆状。而且，据我实地观察，在紧靠剩下半个堆的南面，就是房屋遗址（现为水塘）。祭坛若与民居如此连在一起，绝对不合古制。


漢州志卷二

建置沿革志

坤維內陝梁益分疆古今之廣狹攸殊郡制之規模尚在偶因時勢改復相仍披覽輿圖稱名互異深維歷朝防守之心爰得當事經營之計豈容假借於鄰封必先辨誤因以參稽失人物始合遺書用是選編時代追溯源流都存舊名開詳今釋志

建置沿革

廣漢禹貢梁州之域商周隸蜀國秦屬蜀郡置雒縣

漢州志 卷二 建置沿革 三

第一次提及三星伴月堆的嘉庆《汉州志》

古制。再查汉州旧志，乾隆版（公元1745年）的汉州志，在《封域》卷中，山川一节，治西十五里，只有宽山的记载。乾、嘉之际，举人张邦伸纂辑《绳乡纪略》，虽对沿革古事，详于官修州乘，但也无三星堆的记载。直到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所修汉州志，才出现“三星伴月堆”的名

字，但同时还有宽山的记载（见卷五《山川志》）。后来，洋牧师英人汉明灯于 1921 年纂《广汉县志略》，其山脉一节，对三星伴月堆作了如下解释："地形若三星与月相伴"。以此看来，这三个堆状物，最早也是乾隆以后，才惹眼地显露出来。所以，它是不是真正的堆，即古之祭坛，还须详考。我怀疑，在上古时代，它其实是一座巨大的祭台。

# “都城”三星堆

三星堆遗址所出土的文物，已证实此地是古蜀国的一座都城，当无疑问。但是否是文明意义上的“城市”，有些问题还弄不清楚。

《史记·五帝纪》说：“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邑，也有村舍之意。“居邑屋不见敬”(《汉书·郭解传》)。《华阳国志》有注云：“古蜀人之邑，多名都。如成都、新都、广都、武都，盖亦邑名也。”(巴蜀出版社版189页注)。如果三星堆这里就是瞿上，当然也应是“都”。

三星堆这处遗址，决非普通的邑，可以肯定。因为金、铜、玉、贝等大量出土，以及“灵台”的建筑，都表明这里曾是古蜀王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但是，如果仔细观察，从已有的文物分析，作为真正的城市，似乎还没有“达标”。当然，对中国的城市，我们也不能拿外国的标准，生搬硬套。

我曾在《华西都市报》上看见了一篇《三星堆之谜破译在即》的文章，文章说：“这是一座无论规模、布局，还是建筑工艺都令人吃惊的古城。整个城址，呈北窄南宽布局，东西宽2000米，南北宽2000米，面积约3.5万平方公里，估计当时城内居住人口，应在3至5万之间。”文章说，这是听“三星堆考古专家陈德安先生的娓娓讲述的”。然而，这段话却引起了我的怀疑。

首先，这座城既然东西和南北宽度都一样，就该是方城，怎么又会北窄而南宽？再者，其总面积怎样也不会有3.5万平方公里。因为，整

个广汉市才538平方公里呢，而我们四川包括重庆市也才57万平方公里。难道这座古城有浙江（总面积为10万平方公里）三分之一大？这是明显的失误。

关于这座古城的规模和布局，以及其建筑特色等等，除了已知的一处很原始的民居遗址外，我们还没有获得其他的考古资料。因此，它与古希腊的迈锡尼文明，没有什么可比性。迈锡尼城堡的各种遗迹，历历在目。三星堆都城的许多方面，还在我们的想象之中。文章说迈锡尼古城比三星堆古城晚建1500年，而面积只有三星古城的百分之一，也不知此说法的根据何在。要知道，遗址的保护范围，并不等于古城的范围。

黄金之城迈锡尼，源于公元前2000年的早期青铜时代，大约公元前17世纪，希腊人的一支阿卡亚人在迈锡尼兴建了第一座城堡和王宫。现存迈锡尼城堡，位于查拉山和埃里阿斯山之间的山顶上。城墙环山修建。其中，就有最著名的“狮子门”，“独眼巨大墙”等等，而大量的金银制品主要是在墓葬中发现。这些墓葬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至1500年左右。三星堆的古城，虽然时间很早（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但其主要文物，均不会早于殷代。即公元前16世纪至11世纪。《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说：“迈锡尼文明……年代约在公元前1600至前1100年，”岂不是与三星堆文化同期吗？早于1500年，从何说起？

还要提及的是迈锡尼城，不仅有残存的城堡，王宫的遗存也很丰富。有大厅、后厅、走廊、侧室、浴室等。大厅有高墙和走廊围成的庭院，及门廊所立的大圆柱。方形的后厅内有四根圆柱、宝座及壁画。考古学家还在离王宫不远的山巅上，发现了瞭望塔的遗址。此外，还发现了线形文字。我们不知道最近三星堆遗址又有什么惊奇的发现。

迈锡尼首先出现在荷马的史诗《伊里亚特》中，它和其他许多古城堡一样，是为战争而建造的，它和和平生活的城市也不一样，不能用大小来对比其文明程度。

文章说：“估计当时城内居住的人口，当在3至5万之间”。这个数

三星堆内的屋基遗址

字，也让人生疑。以现有的材料，三星堆古城范围为 2.6 平方公里，与 1985 年广汉雒城镇的 2.63 平方公里相近。当时，镇内人口共 55195 人，也与文章的估计相同，即每平方公里 20986 人。但这么密集的人口，在 3000 多年前怎么可能？要知道解放前夕的广汉城关镇，总人口还不足 3 万。这已是公元 1949 年！

总之，我感觉到：三星堆之谜，应该破解，但必须有正确的思路。否则，将会陷入新的迷阵。

好，还是回到对都城的研究吧。

甘肃秦安大地湾房址

中国较早的城邑即中心聚落，已经发现的有甘肃天水北面的秦安大地湾遗址，是仰韶文化晚期遗存，其时间大约在公元 4000 年前。遗址面积 100 多万平方米，有数百座房屋遗址。它的中心建筑是一座大型宫殿，面积达 290 平方米。其中又分前堂、后室和东西厢，这种格局，开启了后世殿堂的传统。这座房屋是用巨大的木柱组成柱网，地面和墙壁均抹了一种用礓石末和细沙等调制而成的泥浆，效果很像水泥。房前还有一个广场，有一排青石板和两排柱子洞。大约是立旗杆或图腾柱的，这样大的殿堂建筑，以前还不曾见过（严文明《中国王墓的出

现》，载《考古与文物》1996 年第一期)。

三星堆城墙之墙基

其实，在新石器晚期，即铜石并用的时代，中国已出现了许多古城。川西新津宝墩、温江鱼凫村、郫县古城、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和紫竹及三星堆古城址，都当属于这一时期。这种古城遗址，全国已发现不少，

它们都是城邑,即中心聚落,但其中也应该有是都邑的。可是,都不是历史科学所界定的“城市”。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应是夏代的一座都城。因为这里先后发现两座宫殿,一号宫殿的基址的夯土台基面积达1万平方米,周围环绕回廊。南面有门,门后是一个大广场。北部中央是主殿,主殿门阔八间,进深三间,外面有檐廊。遗址北部为居民区,从整体看,是以单体建筑沿南北纵轴线组合成的有主有从的建筑群。宫室不远,有多种形状的穴居,当为奴隶住所。说明宫室与奴隶之间,已有很大的差别。早期宫室周围多用城墙和壕沟防护,形成宫城(见《中国美术五千年·建筑艺术编》)。

再以有些学者认为与三星堆文化有关系的西亚的早期城市乌尔城相比:乌尔城周有围墙,北南端各有码头一座,东端为城堡。城中央西北部为塔庙区,塔庙区东南为王室行宫。附近有乌尔诸王陵墓。城西及城中央偏东南处,有两个居民区,北城墙附近,是巴比伦国王拿波尼为其女儿、祭司贝尔——莎尔蒂南娜所建的宫殿。

这座城市最宏伟的建筑当是称为“圣区”的塔庙区。周围有围墙,塔庙为砖坯砌成的多层的阶梯式金字塔。塔上层有小神庙。区内还有小庙及祭司住房等一组组建筑。塔庙已应用圆柱、拱廊、拱门、拱形圆顶等形式。艺术品有各种雕像、印章、青铜器、农具(包括扬水器)、农作物(包括椰枣与葡萄)和一部《乌尔纳木法典》的残篇。

遗憾的是,三星堆古城,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实在是太少了。也许已有重大发现,专家们由于某种原因,还不愿让我们分享这些发现。于是,我们这些“圈外”的人,只有靠旧材料分析,或者凭空猜想。

我们还是用已公布的材料来讨论。

早期城市的界定,国内外学者多有论述,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当具备:一、有大量的住宅;二、有祭祀场所;三、有宫殿和豪华的住宅群,并与平民区有明显的区别和间隔;四、有各种手工作坊和贸易场所;五、有文字遗物出现;六、有大量的生活用品和艺术品。我们不妨以此来观察一下三星堆遗址“城”内的情况。

一、住宅遗址：在今天的残堆下的水塘位置，曾有一片住宅，可认定的近20间。其中一间较大，约有60平方米。这是我亲自考察过的地方，可惜已全被水淹。据介绍，房屋为“木骨泥墙”，大间为“穿斗”的“厅堂”。这当为一般的居民住宅。“厅堂”释为作坊较为妥当。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大量住宅，没有听说。

二、祭祀场所：“城”外的两个“祭祀坑”可以认定。城内的“三座”“灵台”，有祭祀功能。其余则未见公布。

三、宫殿和豪华建筑，以及与之相间隔的壕沟或宫墙，也尚未出土。

四、陶器、玉器、铜器的作坊，有几处可以认定。（如有半成品及模具等）但贸易场所如街市，则没有发现。

五、文字遗物基本没有，只有陶器和一种玉璋上有些带争议的符号。

六、有大量的生活用品和作为祭祀用的艺术品。

所以，我们可以而且应该肯定三星堆遗址，是古蜀国的一座都城。但这座都城，对我们来说，还有许多空白，有待考古工作者拿出更多的文物来佐证，才能使人们能真正“看到”这座古城的风貌。从现有的资料看，三星堆的文化遗存分布得最多的，是沿鸭子河和马牧河两岸，而由于这两条河流多次向南改道，已经冲走了许多宝贵的遗物。农民在修堤、淘河、挖沙时常有所获，正是这个缘故。河流的改道，很可能让这个地段面目全非。因此，说不定许多问题，将成为不解之谜！

不过，无论怎么说，三星堆已是一个雏形的城市，当是不用怀疑的。

# 金　杖　之　谜

金杖与青铜雕像，也许是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稀世珍宝了。正因为这样，专家们意见最多，争议也最多。

四川剑阁之龙凤杖

金杖是权力的象征，这一结论，似乎已经形成共识。拙作《月光下的杜鹃》，也以金杖作为道具，多次使用，推动剧情和揭示人物的心态。然而，经过仔细思考，又觉得有些问题还值得探讨。

古代中国并非“无权杖之说”。古方在《天地之灵》一书中指出，在江浙一带的史前良渚文化的大墓中，有仪仗玉质附件出土。包括玉戚、玉冒、玉墩等。以“秘”相连，即成一件长68厘米，有柄首饰和柄尾的完整玉器。作者说：“这些特殊的玉器是墓主人生前用以显示自己地位的权杖。”这至少说明，中国之权杖，不一定是受西亚文化的影响。同时，墓葬中出土的玉“杖”，与“祭祀坑”出土的金杖，似乎也有区别。因为，前者是方国的国君，后者是一国的君王，认为它的王杖，恐怕更为确切。应该看到，中国人用杖，来由已久。良渚人以玉为权杖，三星堆人就可能以金为权杖。杖，既是一种生活用具，也是一种装饰品。《山海经·海外北经》，就有“夸父追日，弃其杖，化为邓林”之说。《山海经·海内经》说都广之野“灵寿实华”，这灵寿木就是做杖的好材料。《汉书·孔光传》“赐太师灵寿杖。”蜀山氏来自山区，用杖助力，更是一种必要的器具。至今，四川剑门藤杖，仍驰名中外。我国历代王朝，都有赐杖与老臣的惯例。《礼记·曲礼》：“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谋于长者，必操几杖以从之。”而不同身份的人，手杖的装饰和长度都各不相同。戏曲中，皇家使用的“龙头拐杖”，虽是道具，长度就和金杖差不多。至于包金拐杖，包银拐杖、木杖、藤杖、竹杖……品种甚为复杂。鄙人孤陋，也还见刀杖、枪杖呢！而杖首杖身装饰各种花纹，各种造型，更是珍贵手杖所必有。否则，怎么表示自己的身价？既然可以表示身份，当然可以代表权力。

如果“权杖”不是三星堆惟一的现象，外来之说，就更值得商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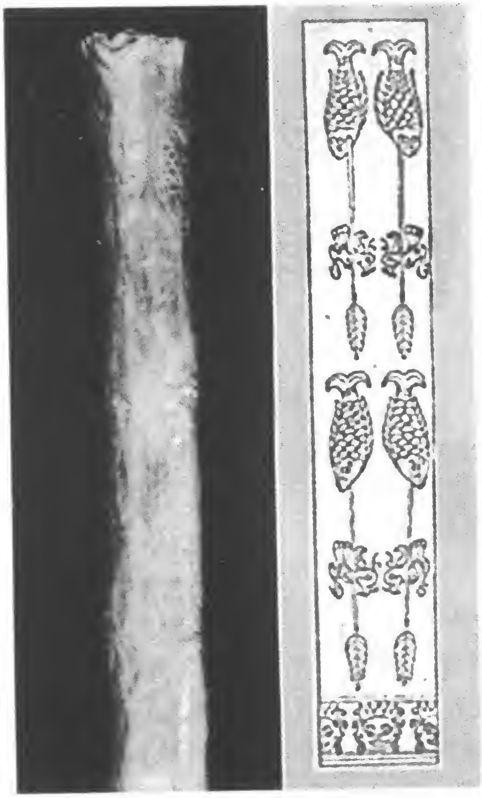
其实，“权杖”最早也不是出现于西亚。在旧石器晚期马格德林人的洞穴艺术中，就有用骨头或象牙雕刻的“权杖”（见理查德·得基《人类的起源》中译本第81页）。若说蜀人金杖是西亚金杖的“采借”，第一，无古文献可考。第二，蜀土无西亚古文物佐证。再以实物比较，三星堆的金杖，既不同于西亚古代国王须臾不离的短金杖，也不同于埃及法老

手执金杖的埃及图坦门国王

所执的那种细长齐肩却无杖首的权杖。

夏代开国，“禹铸九鼎”，从此，易鼎成为权力转移的同义语。古蜀人为什么不用鼎而用“权杖”，这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应该深入地进行研究。徐中舒先生在《古史传说与家族公有制的建立》中说：“经过长期发展，夏人分为两支，一支姜姓民族，这是周朝母系的祖先。一是羌族，

后来变成了留居于四川、青海、甘肃一带的少数民族。”羌族与氐族(戈基人)融合,其一支发展成蜀山氏。已知使用铜刀,则在蚕丛氏阶段(见任乃强《四川上古史初探》),又经柏灌、鱼凫,至杜宇一系从昭通返回,带回更为成熟的冶炼和铸造技术,在与土著濮彝等族的融合过程中,建立了真正的蜀国。因此,用金杖象征这种新的权力。


金杖及线描图

我们再细致地研究一下出自一号祭器坑的这支金杖。它全长 1.42 米,直径为 2.3 厘米,用捶打好的金箔,包卷在一根木杆上,净重约 500 克。木杆早已碳化,只剩完整的金箔。金杖的一端,刻有图案,共分三组。靠近端头的是两个前后对称,头戴五齿高冠,耳垂三角形耳坠,面带微笑的人头像。另两种图案相同,上方是两支两头相对的鸟,下方是两条两背相对的鱼。它们的颈部,都叠压着一根似箭翎的图案。有人认为,这支金杖的图案,有鱼有鸟,当印证是鱼凫王所执掌。但是,我却认为,鱼鸟象征吉祥,箭翎则表示威武,这正是金杖作为权力象征的应有之义。而现在,尚无任何实物能证明鱼凫氏的族徽是由鱼和鸟组成。金杖上的图案,第一组当然是王者之像,但第二、第三组,从顺序看,是先鸟而后鱼。也难解读成鱼凫。所以,肯

定为鱼凫氏所用，理由还欠充分。

纳西族大东巴使用的灵杖头

我有幸到云南丽江地区，对纳西族所特有的古老而神奇的东巴文化，作了些十分粗疏和表面的了解。从参观中，我得知：源于古氐、羌群的纳西族先民，就有使用“灵杖”的风俗。从先期的“卜杜”(相当于巫、祝或巫、史)到其后的东巴(相当于士或祝官)在祭祀活动中，都要用灵杖，而这种法器，只有大东巴才能使用。《东巴文化艺术》一书，印有五种灵杖头的照片，杖头分节刻有神像、佛像、神兽、花卉及图形符号等。我们知道，东巴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佛教、道教文化，但就其本源来说，仍是古老的巫文化为其主体。灵杖既然长期存在于纳西族人民的生活中，而纳西人又是氐、羌民的一支。那么，在神权和王权合一的上古时代，金杖是古蜀人所固有的法器，似乎可以算作又一旁证。

还有，西藏古格王朝，也有“权杖”的记载(见张建林《荒原古堡》)。

用杖象征权力，良渚文化和吐蕃文化中都有此先例。用杖象征神威，东巴文化今仍如此。金杖出现在三星堆，有其历史渊源。我们没有

三星堆出土之金面罩

必要把这种光荣送给洋人！

附带要说的是，关于上古时代，何时开始使用黄金制品，尚无明确记载。《山海经》中已有黄金、赤金的区别，说明夏代已懂得金的属性。《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说，金银器皿出现较晚，汉以前少见，到唐代才开始较多发现。但事实上，三星堆的金器就不少，除金杖外，还有金面罩、金虎饰、金璋形饰，金“竹叶”，四叉形器等等。它的特点是全用金

箔,说明对金的延伸性已经有很深的了解。我们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馆也参观了馆藏的金器,有金柄铁剑,各种形制金带钩等,其制作时间大约在春秋时代,并且都为铸造器皿。而金箔的使用,应该说比铸造更为先进。所以,研究三星堆的金器,还有很重要的历史价值。

# 青铜雕像与神树的由来

这也是一个热门话题。因为这类青铜器,在中国已出土的器物中,的确没有见过。这种文化形式,到底从何而来?

有的专家认为,这和金杖一样,也是受西亚和北非影响。因为,只有在那里,才有相近的东西。

时间掩盖了许多真正的历史。一些著名的理论,常常被一个简单的发现而推翻。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必须谨慎和虚心。地球村的说法,大约是近20年的事,没有高度发达的交通工具,地球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大了。当今,边远乡村里,还有没有见过火车的山民呢!“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我曾想,三星堆时的古蜀人,若要到西亚、北非,恐怕有如今人之登月球或遨游太空,不是不可能,机会实在是太少太少了。所以,现代人虽说20万年前就在非洲出现,经过了那么漫长的岁月,其足迹才遍布全球!人类文明的发展,确实是一种复合和采借的结果。但这种发展的基本形式,是一种波纹式的推动,有如一石击水,是从中心点往外扩散的。中心点不断外移,复合的文化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有人作过这样的研究:当今世界上各种语言千差万别,但如果往上推移,就可以发现越来越多的共同的东西。“妈妈”一语,全世界通用,就是这个道理。“很有可能10万余年以前,我们的祖先讲着同一种原始语言。”总之,无论复合还是采借,都得以交流为前提。交流当然应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不过,距离越远,间接交流应该是更多一些。

青铜雕像之一

我们以南方丝绸之路为荣。但杜宇时代，是否就已到达西亚、北非，实在值得讨论。丝绸之路，首先是一条商道，3000多年前的三星堆人，要到那里去买什么，卖什么？这条路即使在正常的情况下，一个商人要走多久才能达到目的地？他们为什么要付出如此重大的代价？

让我们以有些学者所描绘的路线为蓝图，沿着这条路，用自己的双脚或牛马的四蹄走下去。现在，从广汉到成都，不堵车要一个小时。但过去，行军一天，负重两日则是惯例。而这还是“官道”。古时蜀人，行程还要短得多。而且，一路上诸侯林立，到处要收“养路费”。高山、断涧、急流、野兽、瘴气等等，难以尽说，决不比唐僧取经容易。如果沿古牦牛道南下，过了双流，就有“神仙难过”的新津渡。以后还有飞仙关、泥巴山、大渡河、金沙江，这还是在四川境内。岷江水面广阔，羌江水流湍急，雅安多雨，清溪风大，泥巴山山高雪厚，大渡河险恶异常。越往南走，山岭纵横，地势崎岖。到了安

青铜雕像之二

宁河谷，道路稍稍平坦，但土著人十分慓悍。解放前，即为匪盗出没之所，何况下面还有闻名世界的险流金沙江等等……解放初，我随军从成都出发，还花了 7 天才到雅安呢！我也曾从雅安到过会理。坐乘一辆吉普车，时时险象环生，永远不会忘记大相岭上的风雪之夜。古时（秦以前）这条山间小道，既不会有铁索桥，不会有大渡船，也不会有什么驿站和固定的旅店。以我亲身体验，古时的三星堆人，要走到金沙江边恐怕得两个月。更不说地形更加复杂，野兽更加凶猛，民族更加陌生的云南了。

以上仅只是在中国境内。从缅甸到印度，再从印度进抵西亚，我没有算过有多少里程。就从最简略的地图上看，其间要经过许多大河、高山、沙漠……才能到达古时之西亚文明地区，即今伊拉克一带。我很难

想象，这些不是“圣徒”和“使节”的商人，经历数年，在艰险万分，陷阱无数的小路上跋涉，就是为了出卖自己背着的几捆“蜀布”和蜀锦？而他们九死一生，回到三星堆，除了几个海贝，竟什么特产也没有带回来?！同时，中国和西亚、北非诸国，都没有双边直接往来（秦以前）记载，更没有实物作证。

直接与西亚的交往可能性很少，间接贸易呢？其实，就贸易的发展而言，先开始的一般都是“转口贸易”，即间接贸易，当今亦然。只有对方的需要大为增加了，出产地或出产国才有可能开辟专门的商路。如果是这样，双边的文化因素，首先要在商路上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供求两边的地区。那么，各周边国家应都有表现。遗憾的是，西亚的这些青铜器的文化形式，并未找到痕迹。张骞问蜀布和邛杖的事已经是大汉王朝了。

而且，可以肯定，张骞在大夏，只见到了“中国货”，还没有看到“中国人”。所以，向当地人询问蜀布和邛杖的由来。当知道来自印度后，回到国内，才向皇帝正式提出打通“身毒”的建议。按《史记·西南夷列传》，时间是元狩元年，即公元前 122 年。当然，货物到印度的时间一定早于元狩元年。据近人研究，中印交通，有说开于前 4 世纪的，有说开于前 10 世纪的，都是以文献推测，缺乏实物佐证。只有长沙出土之战国时期之琉璃球，有专家确认来自印度，这就可以肯定中印交通，至少前 4 世纪就已开通。但近人又有琉璃球中国早就会制造之说，这个佐证又有些不可靠了。又有学者以印度史诗《大战书》有支那之名，《大宝积经》提到吴、蜀、秦等地名，说明交往早于前 5 世纪，即佛陀在世之时。但《山海经》中，已有白民、黑齿之国的记载，不等于远古之中国人，已到了非洲和欧美。恐怕还是先有“声闻”，而后才“相通”。

我认为南方丝绸之路的真正开通，当在秦灭蜀之后，即安阳王南迁越南，这 3000 里才完全打通。以后逐渐发展，始通印度，恐怕是汉代的事。所以被张骞在大夏时特别提及。印度是蜀布和邛杖的集散地，是没有问题的。总之，从成都到希腊，估算也有 2 万多里，来回共 5 万里。要三星堆时代的蜀人完成这样的“长征”，我觉得是“天方夜谭”。而经

长时间的波动式的运动，多以转口形式进入西亚、北非，以及欧洲市场，则是可信的。要知道，在鱼凫氏时，蜀人只是活动在灌县、彭州湔山周围的一个小“王国”，其地域范围最多不过几十平方公里。到了杜宇时代，北达汉中，南抵青神，西到芦山，东至嘉陵江，也才几千平方公里。其中还有不少诸侯小国，而岷山和岷江流域，也只是其附属之国。它们是无法完成横跨欧、亚的旅行的。

这里，顺便要提及的是，今日印度的那加兰邦，有1.7万名羌族人。据说这些人是远古时从中国西藏和缅甸来此居住的，以此证明商周之际，就有古蜀人在南方丝绸之路的中段定居，并证实这条商道始于殷周。这种推论，也经不住推敲。鄙人祖籍福建漳州。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先祖达川公偕妻入川，至今230年间，已有子孙九代，散居金堂、广汉。仅广汉一支不少于5000人。若古蜀人真的是商、周已达印度，决不会是10000多人。

絮叨这些，不是说南方丝绸之路不存在，而是说在杜宇时代，这条直接的商路不可能存在。蜀人的生存和发展并无西亚、北非的直接影响。雕像、神树是古蜀人自己的创造。它对中国的青铜艺术，增添了不少奇艳的花朵。我们可以从四川的人文因素中，找到根据。

直到今天，人们还说川人尚巫（见《人文中国》，第284页）。四川人对鬼神的崇拜，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四川是道教的发源地，佛教也很盛行。多少年来，一种充满神秘的气氛，始终熏陶着四川人。许多神话，不仅与帝王名臣联系在一起，甚至连白蛇、青蛇的修道地，也被定在峨眉山。丰都鬼城更是全国独一无二。科学发达的今天，街头巷尾，算命测字者随处可见。3000多年前的古蜀，则可想见一斑了。

在一个崇拜祖先和鬼神的世界里，人们一定要用某些最先进的物质形式，以表示对其崇拜，这是显而易见的常识。今天，玉石观音，就比泥塑木雕的更受善男信女们崇拜，就是这个道理。而古蜀人用青铜和金箔来对祖先、上帝、首领铸造其身首，以表敬意，也就不奇怪了。

中原人不用青铜铸造自己崇拜的祖先和神灵，应该是人文气氛不同之故。

我们研究商周的青铜器，就其形态，有工具、农具、兵器、礼器、乐器及其他生活用具等。而古代人最重要的事，除了生产，就是“祀与戎”。自从有了宗庙，人们祭祀祖先，用的就是礼器。这种器物，既是对祖先的崇拜，也是贵族世家的一种标志，还是上下尊卑的象征。它比单纯对祖先的崇拜，内容要复杂得多。《蜀王本纪》说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时限在开明前），三星堆出土的酒器，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礼器。而在无礼器的情况下，青铜雕像和神树等，就是对祖先和神灵的祭祀的重要形式了。

青铜人首鸟身神像

说青铜像中的“高鼻、深目，颌下留一周胡须等……此种人物面部形态造型，来源于中国以外的文化。”这里，也有两个问题：一、蜀人为什么要雕塑“洋神或洋祖先”，来表示是对自己的神灵和祖先的崇敬呢？二、高鼻、深目、颌下有须的，也不一定就是“洋人”。我偶然从电视上看

到浙江台的西藏纪行，藏北安多一带就有不少鼻如狮头，与三星堆出土的脸面上双眼相近的藏民。据朋友说，藏北羌塘，也有高鼻深目的。50年代初，在凉山金阳一山村，我也见过一群高鼻深目、皮肤乳白的彝家女子。藏、彝与氐、羌同属一族系，当不成问题。因此，青铜雕像上的眼耳口鼻，只是蜀人祖先相貌的写实和夸张，并非洋人、洋种。只是因为我们这些四川人全是多民族杂交后的后代，可以说是“变种”了，才把自己的祖先当洋人看待。想来真有点滑稽！

藏族老人的鼻子

写到这里，门外传来一阵收破烂的叫声，我把准备好的废书刊抱出去，打算换杯酒喝。突然眼睛一亮，在1989年一期《报告文学选刊》上，竟发现了一个“三星堆鼻子”！仔细一看，原来是1988年火把节的“皇后”的照片（何哲生摄）。我觉得她的鼻子，简直是三星堆青铜工匠用同一模子铸造出来的。有兴趣的朋友，不妨看看。

1988年火把节“皇后”

也许，在大凉山的深处，或羌塘草原的腹心，我们还能看见较为“纯正”的，蜀人的堂兄、堂弟，表姐、表妹！

这里，当然还有个“纵目”问题。无论如何，“其目纵”应该是氐、羌古蜀人的面貌特征。而强调此特征，在于区别其他氐、羌人。然而，难道古蜀人的眼睛，真像马眼一样，直竖竖地长在脸上吗？人的脸上，怎么会长这样的眼睛？

青铜神面具像之一

其实，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头像，已经对这一面部长相作了十分生动的描绘。特别是铜人脸上的眼眶、眉目、唇部还涂有蓝、黑、朱色，使我感到，这“纵目”，不是长的，而是一种化妆习俗，就像戏曲中的净角脸谱。我们的戏曲艺人，对一些威武的角色，常常要把他勾绘成竖眉竖眼。就很像三星堆铜人像的眉眼。其方法是先用手把眉眼竖起，再用一条布巾，从额上紧紧勒住，然后勾脸，这竖目的形象就出来了。古蜀人有缠头（如今之彝族）、戴冠的习俗，他们缠头戴冠，一定习惯紧竖自己的眉眼，使之“纵目”，这才变成“纵目”人的。

这当然是一种想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人的眼睛，决不会长成马眼模样！

青铜人面具像之一

至于神树，《山海经》曾多次提及，以青神树的造型看，我们完全可以用建木、扶桑等来解释，说它是土著文化的反映，当无异议。

我们还注意到另一种情况。一般来说，青铜器的形制，是从同一形制的玉石器因袭发展而来的。如果青铜突然出现某些器物，与当地的玉石器毫无渊源关系，我们可视为外来影响。如果没有，那“外来论”就值得怀疑。

我访问过燕道诚的孙子燕开正。据他回忆说，60年代，生产队搞的是“集体劳动”，有一天，他们这个小组在田里挖土时，发现了一个石头人脑壳，眉眼怪模怪样。他们知道是个古董，就交给了生产队，由生

产队上交县文化馆。此事一过，大家也就忘了。直到青铜头像的出现，他才想起，那头石像的眉眼五官，正与青铜头像一样。他说，看过这个石头脑壳的人还很多。我没有在市文管所打听到这件文物的下落。但既然多人能证实，应该是可信的。那么，三星堆青铜的各种形制，是古蜀文化自身发展所致，并非从遥远的国家采借而来。

总之，青铜器中的某些特征，与几万里之外的地区有些相似，完全可能是历史的巧合。

我决不忽视南方丝绸之路开通的重要与光荣。但这条商路，首先应是间接的，然后才可能发展成“直达”。这在上古时期，非经过成百上千年的岁月不可。

# 再说青铜树

前文中涉及这个题目，主要是对它是否来源于西亚和竹崇拜表示了了点置疑。祭器坑内的青铜树，用于祭祀是很明白的，但到底象征什么，功能为何，专家学者多有议论，使我常感不得要领。

有学者认为青铜树是古羌——蜀或巴蜀部落、部族集团的图腾树；是古羌——蜀或巴蜀部落、部族集团的通天树；是古羌——蜀或巴蜀部落、部族集团的擎天树。甚至认为是汉代摇钱树的前身，用它祭祀，可以“发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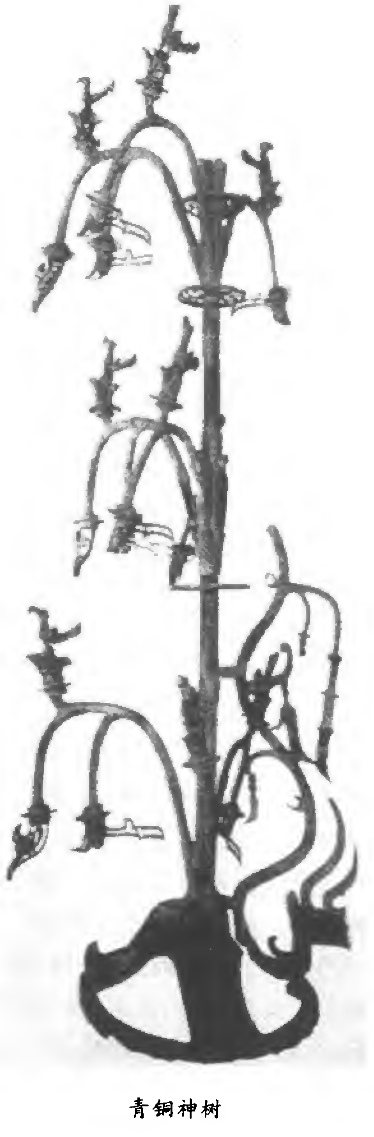
青铜树不是神竹的化身，我有几点理由。一、众所周知，图腾崇拜，是典型的“氏族宗教”。氏族以某种图腾为标志或徽号，把它视为本氏族的保护神，并因之形成相应的礼仪、制度和风俗。某氏族把某物作为图腾崇拜，在初级阶段，必与其生存环境大有关系。澳大利亚土著有袋鼠图腾、火鸡图腾。这种图腾就不会出现在四川。

古羌人以牧羊为生，他们那里，连竹子也没有，不可能构成对竹图腾的崇拜。后来到了岷江流域以至成都平原，到处都有竹子，才能构成对竹的崇拜，但当时已经是氏族社会的后期。也许，蚕丛氏之后，蜀人就进入了父系社会，甚至还可能更早一些。那时，图腾已变成氏族的一种标志，和母系社会大不同了。历代有许多文人墨客，喜欢翠竹，“宁可食无鱼，不可居无竹”，但这绝非当成图腾来崇拜。今日之羌人所崇拜者，也不是竹而是白石。所以，把古羌——蜀或巴蜀部落、部族的主图

腾总结为竹，理由是不充分的。

再就青铜树的实物看，它确实有“节”。但有节的植物，并非都是竹子。禾本科的植物稻、麦、黍、稷以至甘蔗等等都有节。就以木科言，《山海经》说都广之野特产灵寿木，也是有节的。而竹下数节无枝，与青铜树有异。

再看青铜树的饰物，更不像以竹为主图腾之子图腾。我不知三株铜树是否一样，仅就已公布的一株修复好的青铜树的图片看，树根部是一条龙，枝桠上是十只鸟，完全是龙凤的模样。“龙、凤不是现实世界的实有动物，但都是在若干动物图腾的基础上，经过图腾崇拜阶段，逐渐加工而成的。”（《中华文明史》第一卷）它们的形象，已将氏族图腾的意义深深隐藏，而成为吉祥的象征。据介绍，龙的支系很多，有鳄龙、蛇龙、豕龙、闪龙、马龙、夔龙、火龙、金龙……凤的支系也有鸡凤、鸷凤、燕凤、鸾凤、鹄凤、鸳鸯……等等。人们常说“氐羌以鸾凤”，而青铜树上的鸟，模样都差不多，很难看出区别。如果有图腾之意，又怎么区分不同的氏族和部落？



青铜神树

所以，它不像是图腾树。

那么，它该是擎天树了?!

擎天的传说很普通。因为，在上古人的眼里，天是一个盖子，如果没有支撑，岂不要垮下来吗？原始的神话，支撑天的，只有一根柱子。后来发展成四根，大约因为有了方形的房子。以后柱子越来越多，也许是能修大房子的缘故。在神话传说中，擎天的东西也不少，有神山、龟足、大树、虎、牛首、金、银、玉石等等（见陶阳、钟秀《中国创世神话》）。却还没有搜集到以竹子为擎天树的传说。

我家原来有一片竹林。每遇狂风，总会有许多被风吹折的竹子。它不如松柏高大粗壮，枝叶繁茂。加之“皮不厚，心又空”，根本承受不了多大的压力，又哪能把天擎起？我们四川人很喜欢竹子，但如果你要用它来做房屋的柱头，别人一定会叫你是瓜娃子。擎房都无能为力，岂能擎天？

与蜀人有亲缘关系的彝族，有桫罗树擎天的传说，也有用四根顶天

神树上的龙

柱把天托住的传说(见陈建宪选编《人神共舞·神话篇》)。但梭罗树绝不是竹子。神话传说月亮里就有一棵梭罗树,张果老砍了几十亿年,还没有砍下一枝呢!竹子怎能与它相比?在南方人的传说中,能擎天者,当是女娲所截的鳌足。

据蒙文通先生考证,《山海经》是流传于巴蜀地区,代表巴蜀文化的典籍。而《山海经》中,就记有女娲之事。《大荒西经》有"西北海之外,

神树上的花鸟

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负子，有两黄兽守之。”“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此两段虽没有详述女娲的故事，但提到不周山。可以想象，“她”的“事”在巴蜀古代是广为流传的。后来，《淮南子》在《览冥训》中，较为详细地转述了这个故事：“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枯芦灰以止淫水。”看来，原来擎天的不周山，因共工之怒触而倒了，女娲才“断鳌足以立四极。”

青铜树绝不像鳌足。所以，它不可能是擎天树。

那么，它该是通天树了？古书上所载能作为天梯的树很多。有建木、若木、扶桑、穷桑、寻木、马桑……青铜树到底是什么树的象征？

建木：“百仞无枝，上有九欘，下有九枸。”（《山海经·海内经》）青铜树共三节，节节有枝，顶端虽有饰，却非“九欘”（许多弯曲的枝桠）。因此，不是《淮南子·坠形篇》所说生长在都广的众帝上下的建木。

是若木吗？《山海经·大荒北经》：“灰野之山，上有赤树，青叶赤华，名曰若木，日所入处。”《离骚》有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青铜树上既无绿叶红花，代表太阳的鸡（或乌）还高站枝头，当然非若木了。

寻木也是大树。《山海经·海外北经》说它：“长千里，在枸缨南，生河上西北。”不知它的形状如何。但按郭璞注是生河边的，和青铜树的底座为高山就不相符了。

还有三桑。《山海经·海外北经》说：“其木百仞，无枝。”也与青铜树不一样。还有马桑树，也曾号称天梯，人们可以爬上去在天上玩耍。只因得罪了天帝，被念了咒语：“上天梯，不要高，长到三尺就勾腰”。从此，天梯的功能就消失了……（《中国创世神话》）

据我看，与青铜树相近的，只有扶桑。

请看“巴蜀文化之典籍”《山海经》：“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大荒东

经》)

这里，首先应确定一下黑齿国的方位。

按《山海经》原文："黑齿国在其北，为人黑，食稻啖蛇，一赤一青，在其旁。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后汉书·东夷传》说："倭国东四千(按郝懿行注)有裸国。裸国东南有黑齿国。船行一年可到。"以此推测，裸国当在今夏威夷群岛。那里的土人，长年赤裸着身体，又特别喜欢文身。东南行一年到达的地方，该是中美洲的墨西哥。我们知道，墨西哥的奥梅克文明中，不仅有许多巨大的石雕黑人头像，也特别崇拜蛇。

而《梁书·诸夷传》说到东方各国，其顺序是高句丽、百济、新罗、倭国、文身国、大汉国、扶桑国。这是我国正式提到以"扶桑"称国的惟一记载。高句丽、百济、新罗在今朝鲜，倭国在日本，文身即在今檀香山、夏威夷。大汉国不知所在，《梁书》说："风俗并与文身国同而言语异"，当不会相距太远。再往东二万余里则为扶桑国。关于这个国家的情况，按《梁书》记载，是在公元 499 年，一位法名慧深的和尚，云游归来后，在荆门讲的。"其土多扶桑故以为名。扶桑叶似桐而初生为笋。国人食之，实如梨而赤。绩其皮为布，以为衣，亦以为棉。作板屋。无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为纸……"

当然，扶桑到底是指日本，还是指墨西哥，几百年来，争论不休。但用《山海经》和《梁书》所指地位，及已有"倭国"的记载，我认为以扶桑即黑齿，即今之墨西哥要妥当些。

据说龙舌兰有两种，一为草本即我们平常观赏的植物。一为木本，原产墨西哥，树木高大，可用以覆盖屋顶，其皮和纤维，可以制绳造纸，实可饮食。中美洲在古代长着一种大型野牛，角长约六尺，与《梁书》记载一致。古代的墨西哥人，多住在用木料或干土砖造的小屋里，与《梁书》相符。古代墨西哥也确实有两种监狱，分别收容轻犯与重犯。并有"灰责"之刑。"其地无铁有铜，不贵金银"等等，都可以印证扶桑即古代之墨西哥。

扶桑，按《辞海》的说法，又名朱槿，"佛桑"，是锦葵科的植物。李时

珍谓扶桑乃木槿花的别名。木槿花就有很多种颜色，特别是"花生于上部叶腋"，与青铜树的花的位置很相当。蒴果成圆形，也极相似。小时候，我家门外的一条通城里去的乡村大道上，就有很长一排木槿花树，我家每年要为它整枝，也长有两三人高。我在亲戚家，还见过与柑桔树一般高的木槿花树。用木槿花煮汤，更是爽口。墨西哥的扶桑是什么样子，我不清楚。但与三星堆的青铜树，确实还有点"神似"。

还有一点应该引起注意的是：据《山海经》讲，扶桑生于汤谷之上虽然，在经文中，扶桑已成神树，但黑齿北却真的有汤谷，那就是今日之墨西哥暖流。

总之，这株青铜树，真可让人浮想联翩！

再以青铜树对照：座以山形，汤谷也。谷中有水供日沐浴，所以有龙焉。"上有扶桑"，即青铜树。枝上有十乌，即为载太阳之乌。树干有节，或为阶梯，或因需镶嵌树枝之铸造方面的原因使然。无论乌、鸡（凤）皆与太阳有关。乌载太阳，古书有记。丹凤朝阳，今日仍常见于刺绣与绘画。铸此青铜树，上敬天神，祈求吉祥。这该是已修复的这株青铜树的真正功能。

还有两株青铜树，一株只见一底座图片，有山有人，但因未能窥其全貌，不敢妄言。说铜树上还可以挂金竹叶，以至其他飞禽走兽，甚至铜贝等。因未见展品和图片，更不便随意揣测。可能另两株青铜树，别有所指。但有两点可以肯定：一座青铜树全是青铜制品，却独独要挂两片金竹叶，如果没有特定的意义，是难以解释的。另外，如果有一株青铜树全挂铜贝，它可能和汉代的"摇钱树"有某些渊源关系，否则就另当别论了。

# 古蜀社会的探讨

国内有的学者把金杖和青铜像，作为外来文化的一种“采借”，而这种采借又“适应了蜀王国在神权庇护下强化王权机制的需要。”因此，在探讨古蜀国的社会结构时，必然带来许多新的问题。

古蜀之王者像（民间藏品）

中国在上古时代，确实有一个“人神混沌”的时期。黄帝、炎帝且不说了，他们在传说中，本就融人神为一体。即至后来的颛顼，《大戴礼记·五帝德》也有如下评述：“履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民；浩诚以祭祀；乘龙而至四海。”是一位部落首领与大巫一身而二任的人物。所以，能治理民众，交接鬼神。在上古时期，未进入文明社会前，

人们对天象山川的崇拜、对图腾的崇拜、对鬼神的崇拜、对祖先的崇拜,是生活中的最大的事件。三星堆众多的祭祀用品的出现,都带有浓厚的原始宗教的性质,只能说明,在杜宇氏之前,蜀人还站在文明的门槛上!

对古人称谓中的"帝"、"王",我们尚不能完全套用奴隶社会以后,国家意义上的概念。譬如"帝",本指天上的祖宗。"黄帝"、"夏禹王"……是部落首领之义。蜀人的称谓,也当如此看。

在开明之前,古蜀到底处于什么社会发展时期,因无文字,难以考察。史学界的前辈们,曾根据甲骨文,对商代社会作了许多考证,最后都得到验证(见《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 57 页)。他们借殷代世系称号,研究殷人的社会性质与意识,对我们很有借鉴意义。

下级官员像(民间藏品)

蜀人无详细的世系,此一习俗,与"其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号"(《后汉书·西羌传》)有关,但就从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几代,也能得到某些信息。

首先,从这些代号,可以看出,杜宇以前,这种称号,带有明显的图腾意义。而且,在杜宇时代,后来的开明,还名鳖灵,这也是一种图腾的象征。但是,从杜宇娶妻一事,可以证实,它早已是父系私有制的社会。而开明一词,除了神兽之义,还具有明显的道德意义。这个事实,说明杜宇已处于文明的过渡期。

我们知道，杜宇已进入农业社会。所以，其名号只是一种图腾时代的孑遗。从三星堆出土的器物和图饰分析，杜宇开始，古蜀国已是奴隶制的国家，大立铜人是王者之像，金杖是王权象征。许多小型的无头武士铜像，是“职业军人”。那戴象冠的半身像，是一位高级官员。头戴平顶双角冠而跪生的铜人，该是小吏。头顶酒尊，赤膊而跪的，当为奴隶。

平民像(民间藏品)

庞永臣先生著文《早蜀的职官服饰与〈周礼〉》指出：大立人为春官之长大宗伯，三叉高冠为小宗伯。前者主祭祀，后者为太史。其根据有王者头戴冕旒而不着冠等。以我所知，王者最早的冕，是没有旒的。而我最大的怀疑是，如果大立人是大宗伯，三叉冠者是小宗伯，工匠们为什么不把最需要表明身份的“道具”铸造出来？要知道，拿什么东西，最能证明是什么人。以《周礼·大宗伯》为例：“王执镇圭，公执桓圭……”大宗伯的手势，“形同展册”却没有册。小宗伯“秉笔执简”而没有笔和简，这又是什么原因？以古蜀人的铸造工艺是完全能做到而不做，这是为啥？再者，三叉冠也绝非古文“史”( )字的上部形象，那是两只象耳和一只象鼻，也可取名为象头冠。此冠

戴象冠的官员

谁戴，似无明确记载。所以，我觉得蜀人的服饰礼仪，社会面貌尚须认真探讨，不能牵强附会。否则，古蜀与中原，就难以区分了。

杜宇后期，由于疆域与势力范围的扩大，与周边王国和民族的接触，迅速地影响着社会内部结构。若说三星堆成为一座“城市”，也当在这个时期。尚属人们揣测的“象形文字”，也许也是这时才出现。

顶尊的奴隶

开明以后，世系变得较前四代清楚了些。“从帝生卢帝，卢帝生保子帝。”从这两代看，卢，无论作为饭器，或作为兵器之一部（矛之柄），绝无图腾之遗意。保子即婴儿之谓，是年幼即位。五（或九）世为开明尚，这“尚”字，有上及尊重之义，离图腾就更远了。而九世“始立宗庙，以酒为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这已是完全的“文明社会”了。所以，作为象征原始宗教的神像、神树已经消失，代之的是真正具有“礼器”性质的青铜器（如成都十二桥之出土物）。

从以上看，古蜀国是到杜宇时代，才进入文明社会，到开明时才真正完成。而这种完成，既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也受着楚文化的影响。所以，这个文明，也正是一种复合的反映。

# “轮形器”到底是什么？

三星堆的“祭祀坑”，出土四件青铜“轮形物”。其器呈圆形，外圆为70厘米，中心大20厘米，有5条轮辐条，与外径相连，人们大致认为这是“太阳崇拜”的遗物。因为，当时的古蜀国，还没有青铜车的出现。而且，它是放置在“祭祀坑”内的。

中国各民族(岂止中国！)都曾有过自然崇拜的阶段，也流行祭日等礼仪。古蜀人崇拜过太阳、月亮、星星等天体，是毋庸置疑的。但这“轮形物”，是否就是太阳神，也值得研究。日月神话，有自生型、神造型、神生型、人变型几种。无论怎样，按当时人们的智力来看，太阳决不是一颗简单的星球，而是神或神人变的或生的。所以，从雕塑看，太阳是太阳神举着，月亮是月亮神抱着。在中国的神话中，属于日神的，首先是炎帝。《白虎通·五行篇》说：“炎帝者，太阳也。”炎帝是羌人先民崇拜之神。《左传·哀公九年》：“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传说中，大禹治水，还得到

轮形器

炎帝的女儿瑶姬的帮助(见《太平广记》卷五六)。再者就是羲和,一说他是黄帝的占日官。《山海经·大荒南经》则说她是个女子,嫁给帝俊后,生了10个太阳。

这中间还有一位重要的神祇祝融。《史记·楚世家》说他是高辛的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帝德,光照四海,故命曰‘祝融’,其功大矣!”(《国语·郑语》)天地间永存的火,就是太阳。所以,《史记·正义》说:“祝融,南方炎帝之佐也。”这祝融,不仅是楚人的祖先,也是蜀人的祖先。可以说,他是中国南方民族共同崇拜的祖先之一。许多学者都考证,“祭祀坑”中的那尊巨大的青铜头像,就是祝融。那么,那轮形物如果是太阳,就该是祝融的配祭品。因为,轮形物对太阳来说,只有形状上的相似,表现不出其神奇的功能。它必须附着于神,才能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

从中国神话看,关于日月,有盘古双眼化生,有天神铸造,还有羲和生日,常羲生月等等,而以神造最为广泛。它们都必须依靠神力才能显示出威力。直到汉代,象征日月的金乌和蟾蜍,仍在神鸟的体内(见成都出土的汉代画像砖)。所以,把轮形物单独作为神来崇拜,是难以解释的。如果坑内出土的神树是扶桑,把它挂在枝头,那是可以的,可惜它与神树的比例太不协调。因此,只能是祝融的配祭物。否则,当有另外的神话和传说加以解说。总之,这轮形物与太阳相似,缺少夸张的风格,也就失去了神秘的特色,不能单独地作为太阳神来祭祀和崇拜,只能是一种附属物。

崇拜太阳,是所有上古人的风俗,并非川人少见阳光而特有。见于各古籍之神话如后羿射日、夸父追日等,也应视为首先是南方人的神话。这不仅因为炎热对南方人来说比北方人更为头痛,而旱灾也更容易发生。同时“日晕”这种“多日”现象,南北各地都有发生。所以,祈日、护日与射日、赶日是相对的统一体,是太阳在不同的季节给古人留下的印象。这一点,对盆地的四川人,没有什么大的特殊之处。

上古时期,信仰的泛文化现象,带有规律性和普遍性。三星堆出土的器物表明,蜀人对日月山川、龙蛇鸟鸡……的崇拜,也是丰富多彩的

经过自然崇拜、鬼神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原始信仰逐渐萎缩，才被真正的宗教所替代。但是，四川的特殊的人文和地理因素，使这种泛文化信仰残存得特别多，是“四川多巫风”的原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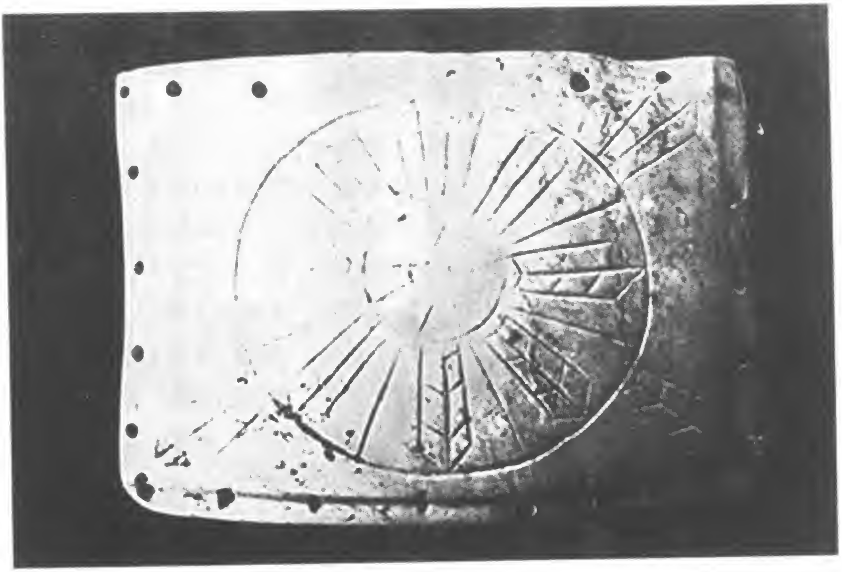
也有学者认为，这种轮状物是盾牌。所以，著《蜀盾考》。这个结论，我有些怀疑。一、两个祭器坑，青铜兵器甚少，除了铜戈，并无它类。二、轮形器未公布重量，按参观时目测，大的不会轻，小的又难以掩护身体，内圆背后，似无把手。真的作盾牌使用，一定很不方便。三、我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参观过一面强国之盾。那盾牌背后的支架已无踪影，只有正面大约 70 公分的圆状物。它中镶青铜泡，上有饰纹，下敷漆皮。可以想象，那支架应为木结构。因在土中掩埋过久而腐烂，这盾牌才不会很重而十分实用。如果三星堆出土的青铜轮状物，是用来跳干盾舞的道具，一是太重而难以挥动；二是无把手难以把握，因之置疑。

无论轮形器是否象征太阳，比起猜测，它透露出了许多很值得我们重视的信息。首先，这是两个同心圆。要画这种圆，一般得用圆规。其次，把内外圆分为五等分，得用量具，还须有准确的数字概念。做 5 个相等的空白，也很复杂，因为它有两个边，不是直线，而是弧线。它的内圆，要成浮雕式的凸状。轮辐也不是平面的。这使我们看到，古蜀人在数学方面，特别是几何学方面的知识，比我们想象要高明得多。

说到太阳，人们一定会联想到蜀人的天文与历法。三星堆出土的器物，还没有发现文字，也没有完整的观天测时之器，人们只能从器物和古文献中去寻找一些线索。

人们说：“蜀夏同源”。因此，可以作这样的假设：蜀人使用的是夏历。而《山海经》中已有 10 日，12 月和岁的记载，可以旁证当时是以干支纪年的。

如果那轮形器是太阳，以此推论，其轮辐应为六，中空也该是六，象征单月和双月。但轮辐却为五，这是怎么一回事？有人认为，这表示古蜀人曾使用过十月历。据传，古彝人曾使用过十月历，一月 36 天，一旬为 12 天，一年为 360 天。余下 5 至 6 天，是年节。应以轮形器，空白代表雌月，轮辐代表雄月。是否如是，仅备一说。



新石器时代的玉式

也有学者认为,三星堆的三个堆,是天子观察天地万物之"三台"。作者引《诗经·大雅》疏云:"天子三台,诸侯二。天子有灵台以观天文,有时台以观四时施化,有囿台以观鸟兽鱼鳖。"……诸侯当有时台、囿台。诸侯卑不得观天文,无灵台。然而,事实是,已挖掉的两个半堆,并未发现观天测时之器。

有学者说,二号坑出土的一大一小两枚"竹叶形"的金饰,是古蜀人"授时器具上的附件。"我有幸曾下到二号坑中,与工作人员一起,清理过一枚"金竹叶"。我的第一印象,觉得像个金质的小牙璋,是用来做配饰用的。我看见过不少的"金竹叶"。有的分杈的,有的不分杈的。不分杈的,略似光鱼头,没有觉得像指针的。金箔又薄又软,不适宜做旋转的指针用。而更为重要的是,就我所见,三星堆出土的器物中,还没有称得上是授时器的。

人类最早对天候的观察,一定是直观的。由于地球的转动,人们观察日出日落,才发现不同的时日,太阳出入的山头不一致。《山海经》正

是这样记载的。而据文献和专家推测，夏代可能已用立竿测影来计量时间，农书《夏小正》中，有“五月，时有养日，十月，时有养夜。”这就是夏至、冬至的概念。商代已使用阴阳历。一天的划分也渐明确。日指白天，夕指夜晚，日出曰旦，日落曰昏。天明曰朝，午后曰昃。昃与昏之间，还有郭兮。至于节气、天候包括日月食，卜辞都有记录。但是否已有测时之器。不见记载。《周礼·夏官》有挈壶氏“掌挈壶……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这是用器测时的最早记载。挈壶，是漏壶状而不可能是针形。而不管是水漏，沙漏，它的漏嘴部分，当是管状的。针形旋转，必须考虑均匀的动力问题，古人很难解决的。所以，最早的浑仪，直到西汉，才由落下闳造出来。漏壶是不管天晴下雨，白天黑夜都可使用的测天之器，这对川西多阴少晴的气候，是很适用的。可是，就是这种器物，我们好像也没有发现。

有作者根据《周礼》：“太史抱天时”，说天时是一种盘式的测时器。其理由是按郑玄所注：“太史主抱式，以知天时。”主抱式，可解为“管抱式”，但抱式是何等模样，郑玄并没有讲清楚。以“抱式”为“式盘”，并说三星堆出土的铜眼，就是安装在盘上标志十二辰和二十八宿的饰物，让人不得要领。而天时即是式盘，查《辞海》、《辞源》均无此解，不知又据何说。

总之，蜀人的天文知识，当出土的器物还不能明确反映时，始终是个谜团。

# 古蜀人的“竹崇拜”

蜀人崇竹，这是历史事实。把巴蜀剑器中的“柳叶剑”改称“竹叶剑”，可能更符合四川人造剑的实际。仔细观察，四川的“柳叶剑”与中原的“柳叶剑”，有着很明显的区别。再以实物验证，柳叶上端呈尖状，竹叶上端呈圆状，巴蜀剑多为后者。所以，实有正名的必要。

古蜀青铜兵器上的竹图符

但是，有些器物上的饰符，是否是竹的图符，就值得商榷了。

陶器、青铜器上不少个字形图符，可视为竹，这是对的。因为，初学图画，就有个字、介字的竹叶画法。但“丫”，“”等，就很难视为竹竿或竹枝，当做草木，更为贴切。因为，当时的四川，虽茂竹丛生，其他林木也不少。又如《巴蜀青铜顺》第一四六图铜矛上的图符 上，长了三株 状植物，也难肯定为竹。何况其上还有一个 状的图形。

青铜树是否是竹之神化，也很难说。铜树有节，早为人们注意。问题在于从修复品的图片上看，所有的枝桠均附于底部。而真正的竹子，最下面的数节，恰恰没有枝叶。以青铜树释

竹，依据不算充分。

在创世神话中，竹生人说，流传于四川及云、贵一带。但“竹生第一人的神话资料，尚未找到。”(《中国创世神话》，第214页)有说自己的祖先是竹变的，如夜郎人(《后汉书·夜郎传》)，有说一女子剖竹得子，是彝族传说。认为自己是竹的后裔的，主要是四川和广西隆陵等地的彝族。《华阳国志·南中志》也采此说。据记载，真正把竹作为图腾崇拜的，是滇桂边和云南澂江一带的彝族。他们以一丛金竹或兰竹作为种神，向它祈福、求子。这是以竹作为图腾崇拜的反映。川中古民，把自己视为竹的后代的传说，没有听到和看到。四川人崇竹，因为它是生活的必需品，需要有神灵保护，所以一些地方有竹王祠、竹王庙，其功能与药王庙、火神庙、山神庙、土地庙相当，非祖先神之谓。四川古人的崇拜物是大的白石，已为许多古遗址所证实。

我看见一本名叫《居都》的书(吴秋林、靖晓莉著，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讲到居都的仡佬 族与竹的关系，让人受到很大的启发。

书中说，在居都周围的山坳和山坡上，生长着一蓬蓬青翠欲滴的竹子。这不但使居都村的背景妩媚明丽，还在很大的程度上维护着居都人的生存。在居都，几乎每一个男女都会竹编手艺。据估计，每户居都人每年80%的现金收入都来源于竹的加工。他们有的人能从一条竹条上，硬剖出九片篾条来。居都人的祖先与竹的关系，有许多神奇的传说。但是，居都人对竹资源，却并没有开发一词的概念。他们与竹似乎是一种天然的和谐关系。在他们的头脑中，还没有打破这种关系的动因。他们用篾货卖钱，换取自己需要的其他物品，就满足了，却不指望它积累财富。他们像对待一口井一样对待他们的竹子和手艺。口干的时候喝上几口，解渴就满足了。只要需要它时，井里有水，平时若随时流走，也不可惜。居都四周全是竹林，但他们却十分珍惜。他们只砍发得过旺，必须间伐的竹子。如果不够用，宁可去外地购买，也不愿多砍伐家中的竹林。竹子，是他们生活的依靠，他们都不愿因为获得短暂快乐，过分开发而最后失去这个依靠！

这种纯朴的思维逻辑，又包含着多么深刻的哲理啊！因为在今天，

我们看到许多现象都是以摧残自然来获取文明和进步。为了懂得社会进步必须与自然和谐，现代人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啊！然而，愚蠢的行为，似乎还没有停止。以我们"大旱不旱，蜀有广汉"的家乡为例，全县共有大小河流12条。过去条条都是漫江碧透，渔歌不绝。只就三星堆前的鸭子河看，我家住在河边，泸州的货船，逆江而上，可以停靠在我的家门口。而金雁桥之所以成为广汉的八景之一，正是因为它建在鸭子河上。"翠羽丹震，睹点缀之维工；鹤汀凫渚，著妙趣之无穷。过而伫立，东岭朝霞，遥瞻不远；西湖夜月，望诸目前，而且沱水为之萦回，城堞为之掩映。……其水浩瀚奔腾，涟漪无尘。昼则商船环其旁，渔子钓于下。夜则市廛灯烛，光耀左右。"（张培澐《金雁桥记》）这是何等的景色啊。但现在如果不是修了一条拦河堤坝蓄水，鸭子河早已常年断流。而其余11条，除了汛期能看见波浪外，平时都是涓涓细流，有的干脆变成杂草丛生的干河坝。我们少年时代所见景色，已恍如隔世。考其缘由，除了上游乱伐树木外，与过分开发所谓水资源也不无关系。人们对自然崇拜，当然有些愚昧；人们对自然尊重，却是聪明智慧的表现。这题外之话，应该不会是多余的。

# 关于“祭祀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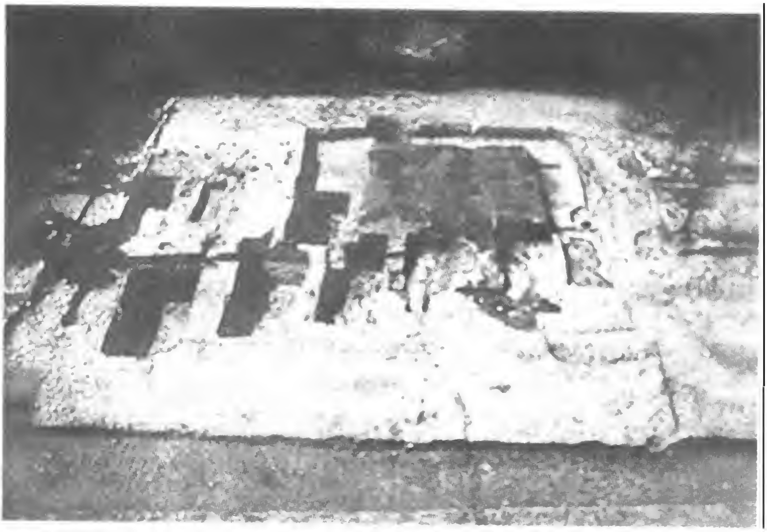
“祭祀坑”的命名，看来简单，细想起来，似乎也有些复杂。一、目前对坑的名称，尚有不同的意见；二、这种“坑”，仅在三星堆遗址，已发掘出来的，就不下五座。从 1929 年燕青宝挖第一个坑开始，1964 年、1988 年都有发现。三星堆附近的彭县竹瓦、广汉高骈等处也发现了成组的玉石器窖藏。其中，有些有半成品者，当然尚不成祭器。但多处的窖藏，都可以视为祭祀品。难道三星堆附近到处都是“祭祀坑”？

当然，这不是没有可能。上古时代，祭祀是生活中的头等大事，经常举行。每举行一次，就会有若干祭品埋在地下。所以，才会有这么多掩埋祭品的土坑。果真如此，这种土坑就只有收藏祭品的功能，并无祭祀的意义。那么，称它为“祭器坑”似乎更准确些。

为什么要将用过的祭品通通埋在地下？可以解释的原因很多，但有一条是肯定的，那就是当时还没有存放这种神器如宗庙之类的地方。神用的器物是十分神圣的，只有深藏于地，才能保持其圣洁和不可侵犯的威严。

不过，仅仅根据深埋地下这一点，就透析出古蜀人种种祭祀方法，恐怕也会产生不少问题。

有学者以出土物的状态，认定三星堆时的古蜀先民祭祀用的是燔、瘗、血、悬、尸诸法。细想起来，有些困惑。“燔柴于泰坛，加牲玉于柴上，乃燎之。使气达于天，此祭天之理也。”（《礼记·注》）这可以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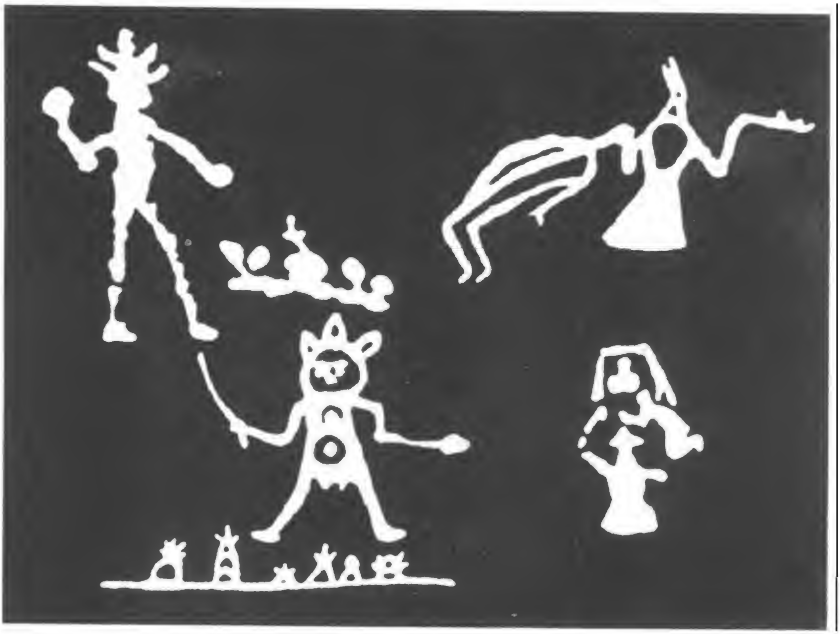


浙江余杭瑶山祭坛遗址

把自己的祖先神铜像，也放在火上烧烤，这是为什么，就令人费解了。而瘗埋作为一种祭礼，按《礼记·祭法》："瘗埋于泰折，祭地也，用骍犊。"这是祭地时专用，并规定犊为祭品。"埋少牢于泰昭，祭时也"也如此。这瘗与燔，并非同一祭法。更非遗物和牺牲经火燎后再葬才谓之"瘗埋"。而事实是，坑内不少器物，并无烧燎痕迹。这说明，这些器物，并非在同一场地使用，而是后来才搜集起来，按一定秩序掩埋的。

血祭是上古人流传颇广的祭礼。"血祭，盛气也。"陈澔注曰："周祭肺，殷祭肝，夏祭心。""有虞氏之祭也，当用气，血腥爓祭，用气也。""周祭用血，必配其他如祭黍稷加明水，取膟膋燔燎升首，以表其阴阳。"此时的古蜀人是否有阴阳概念，尚难证实。因此，沿有虞氏之法，更有可能些。

至于从器物能看出古蜀人有"悬祭"、"尸祭"之俗，更加缺乏说服力。认真地说，我们对古蜀人的祭祀活动，从内容、规则、形器等等，都知之甚少。以至坑内之物，是否全是祭祀之用，也难以肯定。举个小例，那一串小铜贝，数以千百计的海贝，用来祭祀神祇而不是用来做货



西藏岩画之祭祀场面

币用,就令人怀疑。而我们认为最有特色的鸟头勺,以为是舀汤的用具,考以《礼记》称为蒲勺的,却正是祭器(《礼纪·明堂位》"其勺,夏氏以龙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所以,祭器坑中的器物,虽能使我们对古蜀人的祭礼活动,有了一个概略的了解,但想深入考察,恐怕还需许多时日。

# 三星堆墓葬说明什么？

三星堆遗址发掘出的墓葬，资料十分有限。四座墓葬，“墓坑浅小，多为单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没有使用任何葬具，无随葬品。”“表现出较大的原始性。”这种原始性，不仅与三星堆出土的金、铜、玉器，不在一个水平线上，而且和成都、新都等处出土的古蜀墓葬，也迥然不同。据说，三星堆博物馆开馆以后，考古队又在遗址内，发掘出过几座墓葬，有的已有简单的陶质随葬品，并有曲肢、断肢者。但总体来看，仍是相当原始的。因此，有人怀疑，这不一定是蜀人的墓葬，而是原来的土著濮人的墓穴。

其实，早期蜀人实行火葬，并非妄言。《荀子·大略》曰：“氐、羌之虏也，不忧其系垒也，而忧其不焚也。”（注云：“氐、羌之俗，死则焚其尸。”）多少年来，羌族“坠崖而死者，将一只羊从坠处丢下去，作为‘替死鬼’，火化的时间也不能与家人生日时辰相同。”（《中华文明史》，第一卷，242页）与古蜀人有族源关系的纳西族、独龙族也实行火葬。藏族农牧区，火葬也很流行，还有专门的火葬场。其俗是：人死后，用牛把尸首驮到火葬场，架好柴堆，将尸体放置其上，浇上酥油，喇嘛念经点火。有的地方，连骨灰也不收，火灭后即告完毕。因为，藏民认为，死者用泥土盖压后，永无转生为人的机会。所以，只有麻风病人采用土葬，免其再转为人。火葬，是以火将死者送到天国去。联系火葬，我们看祭器坑中有些青铜头像有燔烧的痕迹，与古蜀人实施火葬实有渊源关系。否则，把自

己的祖先神像用火烧烤，就难以解释了。

杜宇以前的蜀人，大多实行火葬。所以，我们在三星堆范围内，没有发现多少真正有价值的蜀人墓穴。

《华阳国志》说："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椁为纵目人冢也。"任乃强先生以为"常璩此说，大成问题。"经他考证，"各族皆有石棺，不必纵目人。"（详见《四川上古史新探》，第 74 页）如果蜀人也有石棺墓，当不是多数。因为以石为棺，还要做石头套棺，一般的人是无能为力的，非王侯不敢也不能为之。就如藏人之塔葬，必须是活佛和大喇嘛才能使用。大多数人，仍实行火葬或天葬。但遗憾的是，至今我们还没有发现古蜀人首领和奴隶主的大石棺。

我希望有识之士，能到叠溪去会见那位羌族青年梁跃华，同他一起，到大山深处去考察现在还遗存的石棺。也许，它真的能让我们发现什么新的东西。

杜宇以后的蜀人，都实行土葬了。一是"入乡随俗"，土著的濮人，实行土葬。二是遵守中原之礼。于是，我们才能发现开明时代的许多有殉葬品的蜀人墓穴。

# 食盐和大象

任乃强先生认为:“人类文化总是从产盐地方首先发展起来的,并随着食盐的生产和运销,扩展其文化领域。”这当然是一种很有见地的看法。但以为蜀国的发展、昌盛及其延续,“一个重大的秘密,就是仰给予巫盐和巴盐。”则又让人产生了一些疑问。

从三星堆文化的第一期遗存,就可以看到,当久居岷江上游的蜀族,还没有来到成都平原时,早已有土著人住在这里。不久前,成都平原发现的五座史前遗址,各“城”之间,相距不过三四十里,证实土著人并不少。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过着比较原始的生活(遗址出土的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文物),如果他们没有食盐,又如何能生存下去?

当然,成都平原的水上交通,要到达川东出产巫盐和巴盐的地方,并不困难。但是,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情况下,他们能用什么和巫载国的食盐交换呢?成都平原真的是食盐匮乏吗?比起古代盐资丰富的川东和川南,成都平原的盐是少些,但不会没有,否则,土著人就不可能在这里定居。

《华阳国志》说:“广都县、郡(成都)东三十里,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置,有盐井、渔田之饶……县凡有小井十数所。”临邛县自古产盐,西汉曾设盐官。《华阳国志》还说什邡县“有盐井”,而今中江、三台、绵阳、射洪、简阳、乐山、犍为等地,也均有产盐的记载。这些地方,开采食盐的时间虽先后不同,有食盐资源是肯定的。

我土生土长在广汉，解放前吃的全是中江县的“锅巴盐”。自贡的产品都很少，更不用说巫盐、海盐了。古时的人口比近代少得多，食盐当不成大的问题。

再以《四川通志》所载为例，成都所属各县：成都、华阳：于简州、犍为、射洪等州县买盐运至本县行销；双流：于简州、乐山、犍为买盐；新繁、新都、郫县：于犍为、三台买盐；崇宁：于三台、射洪、中江买盐；灌县：于简州、犍为、三台、井研等县买盐；彭县：于犍为、三台买盐；崇庆、新津：于乐山、犍为、井研买盐；汉州：于射洪、三台、中江买盐；什邡：于三台、射洪等县买盐……（卷六十八）这虽是嘉庆年间的事，但也证明川西平原并非食盐匮乏之处。

成都平原的食盐资源，不是匮乏到蜀人难以生存的程度，却也不是要否认蜀人与巴人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我们是粮食生产大国，不是每年还要进口粮食吗？我们决不会因为进口了粮食，而说中国不产粮食。进出口是以利润大小为前提的。如果蜀人的食盐完全为巴人所垄断，两国的关系就将是另一番景况了。

由于把蜀国的经济视为“跛脚”，于是认为川东鱼国和渭水的強国，是鱼凫氏时为争夺盐利在川东建立军事大本营而留下的后裔。但事实是，鱼凫氏时代，它在蜀中只是一个小国，活动范围仅在湔山周围，哪有力量出师川东？而史料有鱼凫国破之说，其中一支顺江而下，流于今川东瞿塘之西定居，建立了鱼国。一支北上至渭水平原，是为強国。其建国原因，前已论及，不再赘述。

在三星堆的祭器坑中，发现许多象牙。在一号坑内，还发现了很多大型动物的骨灰，有人认为是大象遗骸。而从今日之文献看，川西平原无象群之记载，因而认为是“热带丛林文化的赠礼”，是印度来的，以此旁证南方丝绸之路存在的久远。古中国到处都有大象，恐怕是历史事实。不然，大舜耕田的传说，怎么会流传至今？河南称豫，又何以得名？中国的象牙制品品种繁多，做工精细，用途广泛，在世界享有盛誉。从象尊、象邸、象笏、象车、象管、象床，一直到象牙筷，可以说应有尽有如果没有原料，哪会产生这么多象牙产品？

祭器坑中的象牙

大象在北中国的消失，恐怕主要是生态环境的变化。大象的生存，需要有茂密的阔叶林和鲜嫩的草本植物。同时，气候也要暑热和潮湿。所以《大唐西域记》里说："地唯暑湿，偏宜象住。"中原地区森林的日渐稀少，影响气候变得干燥，丧失了大象生存条件。所以，它们就朝南方迁徙。《尔雅·释地》说："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象郡、象州，名副其实。

成都平原是否有象群存在，现有文献确实无明确记载。但是，在巴蜀及周边地区，大象的身影却随时出现。"巴蛇食象"见《山海经·海内南经》。"岷山其兽多犀、象，"见《山海经·中山经》，据《后汉书·西南夷传》："永初元年，夷陆类等三千几举种内附，献象牙、水牛、封牛"。说明汉代川、滇一带仍有象群。而《华阳国志》在《蜀志》首页就说："……其宝则有……犀、象……"这不该忽视.

《山海经·海内经》说："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这使我看到

的就是今日西双版纳的景色。西双版纳有象，焉知都广无象？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草木所聚，”“冬夏不死”是大象生存的必要条件。而“爰有百兽，相群爰处，”虽是一种泛指，但川西有虎、豹、犀等大兽，何以能没有生存条件的大象？要知道，这里正是“地唯暑湿，偏宜象住”的地方呀！

三星堆出土之象牙雕饰

从间接方面看，古人的祭祀活动，必定与自己的生存的环境有密切的联系。献给神祇和祖先的祭品，一般都是自己身边之物。雄鸡刀头如此，尊彝壶卣如此，陶俑陶马也是如此。非洲人以鳄鱼为长寿吉祥，是因为那里河流里的鳄鱼特别多。印尼以椰苗赐福，是因为印尼到处都遍布着高耸入云的椰树。如果象牙只是象征财富而埋入祭器坑的，那么第一坑的象骨又当何解？

有人会问，成都平原倘若真有大象，为何文献资料没有提及，地下也出土不多？其实，古文献资料对蜀地的叙述，从来都很简略。因为这里本“蛮夷之地”。出土不多不等于没有出土。两个祭器坑中不是有许多吗？真正的考古发掘，远远没有结束。再者，川西古象化石已多处发现，广汉就有两处。至于以后为何消失了，原因很简单，大面积的农业

开发，必然要毁坏林木茂草，这样就断了大象的生路。它们只得往南逃窜，最后到了滇南的热带和亚热带雨林，这才定居下来，这当发生在杜宇时代。所以，开明后，文献记录多了，却没有川西有大象记载的原因。

川西平原在上古时代，是一处森林密布，适合象群生存的好地方。其有力的佐证，是广汉的几条大河——鸭子河、绵远河、石亭江等，都是盛产石化了的木材，俗称乌木的地方。有的河床下和河岸边，这种贵重的木材，堆积达几米厚。这些石化了的树木，大者几围，小的也在50厘米以上，它们埋在地下，已有三四千年之久，经过石化，变得乌黑发亮，成了制作高级家具的首选材料。这也印证了《山海经》"都广之野"，有"汜林三百里"之说。四川本就潮湿，又有如此好的森林带，怎么能没有大象？

退一万步说，蜀地无象，祭祀祖先需以象为祭品，荆州、滇、桂都有象群，大可不必舍近求远，到万里之外的印度去购买。何况，即便已有南方丝绸之路，其交通工具也只能是人背马驮。遇高山险流，得过溜筒、竹索桥，几千斤重的大家伙，没有汽车、大船，它们又怎么"飞越天堑"？所以，三星堆的象来自印度之说，论据并不十分可靠。岷山多犀、象，应该是更符合古时川西地区的地理环境的。

# 杜宇的疆域及其他

任乃强先生明确指出："《华阳国志》叙述的疆域，实际是开明氏阶段的蜀国疆域。"(《四川上古史新探》，第84页)《华阳国志》说杜宇时，"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的确，开明时的疆域也大致如此。所以，任老先生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蒙文通先生曾说，古蜀国的范围内，诸侯林立，杜宇、开明实为联盟的领袖。这和中原的情形没有多大的区别。但从三星堆作为一座都城来看，成都平原是他们的直接属地，当是没有问题。这地方为《山海经》所说的"都广之野，"也就是"广都之野"，也就是"氾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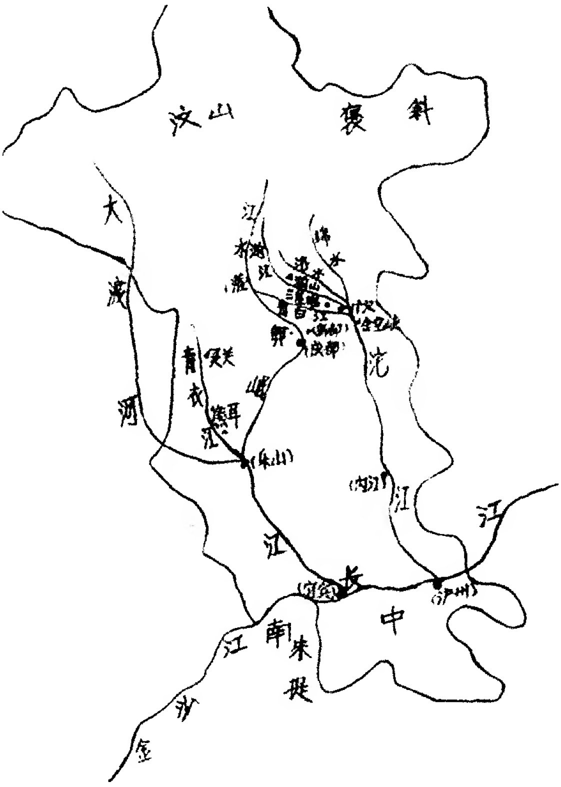
《山海经·海内经》说："西南黑水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有的学者认为，这"城"，就是指"三星堆古城"。说"三百里"乃"夸张之词"，犹如"白发三千丈"云云。这一定是误解。

许多学者早已指出："城"乃"域"字之误。蒙文通、吕子方两先生早已论证，都广即广都，广都之野就是氾林。而《山海经》有几处说"氾林三百里"。因此，也就是指广都之野有三百里。袁珂先生在译注《山海经》时，也译作"它的疆域有三百里。"

我在本书的第一版中，也认为"城"为"域"之误。因为，时至今日，方圆几百里的城市，实不多见。三星堆遗址的总范围不过12平方公里。汉代的长安城，周长才63里呢。

但是，经过川西宝墩等六座古城遗址的发现，特别是 1999 年在黄帝陵周围，发现了“九宫连城”式的“黄帝黄城”后，改变了我的看法。我以为，南方的都广，正与北方的黄城一样，是一个城邑建筑群。黄帝黄城，是九座城址共同构成以黄陵为中宫，约 40 平方公里的呈正方形的“九宫连城”。都广，也是以某座城邑（也许就是三星堆古城）为中心，由许多子城组成的一座大的连城。北面的顶端，应在古之小郫即今彭州磁峰之皇城山。广汉至都江堰是其东西两端。南端在新津彭山一带。其实，这也很像今日之成都市。成都市区是其中心，而温江、都江堰、彭县、新津、温江、郫县、崇庆、大邑、邛崃、蒲江、金堂、新都、双流都是成都市的范围。看来，都广比今日之“都成”还小得多呢！

我想，按照这个思路，也许我们还能发现许多古城遗址。也许，这些古城遗址相连起来的形状，与黄帝黄城的正方形不同，而是一个龟形。那么，传说成都是乌龟拱出来的，就更有某些道理了。




古蜀国疆域示意图

杜宇的主要功绩在于“教民务农”。也就是开发成都平原。而这种“开发”，是由北向南，即以小郫再至瞿上。新都、郫邑，以至成都的大发展，都是在开明时代。所以，杜宇时代的主要活动区域，应是岷江以东、沱江以西这一片沃土。岷江流域的广大地区，虽然是杜宇的属地，但还不是中心地区。

整个成都平原的开发，有赖于水利建设，就必须把岷江和沱江的水患变成水利。而这一历史重任，正落在了开明的肩上。经过数百年的努力，又经李冰、文翁、诸葛亮……以至清代的丁宝桢等官吏，率众治理，才使这块北起灌县，南至新津、眉山，东起龙泉山，西至大邑、邛崃，面积达6000平方公里的大平原，变成天府之国。

# 玉垒山与金堂峡

读《华阳国志》："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我曾百思而不得其解。因为，当代不少学者说："湔水即今的白沙河。白沙河发源于今都江堰市与汶川县交界处的茶坪山。茶坪山因四时积雪，故曰玉垒山；或因山多美玉而名。玉垒山被白沙河（即湔水……引者注）岷江拥挟迤逦向南，直趋都江堰市西北止。"果真这样，"决

玉垒山系

玉垒"又怎么能解决远在沱江水系范围以内的杜宇都城附近及周边地区的水害呢?

这里,首先应弄清两个问题:茶坪山是否就是玉垒山;白沙河是否是湔江?我在前文,已引过蒙文通先生的考证,纠正了郦道元老先生混淆湔山位置的错误。蒙先生说:"湔水出玉垒,在今之彭县,然则大江(岷江)以东,岷源以南,止于灌口之山系胥曰湔山,入后曰玉垒。"可以想象,如果湔山在白沙河一带,鱼凫氏与三星堆就更难"挂钩"了!

茶坪山不是玉垒山,白沙河也不是湔江,有《彭县地名录》为证。

《名录》在彭县山脉概况中说:"今考境内诸山,以北山为宗。""境内北山总称玉垒支脉,北起于彭茂界的太子城。'玉垒之名,早见于《汉书·地理志》:'玉垒山,湔水所出。'五峰之一的背光峰,亦早有玉垒山之名。此山一峰特起寰大而上锐,海拔 4027 米,距县 45 公里。其左臂龙神岗……有玉石岩产玉,与灌县西山同。"

这应该是很明白的。

《华阳国志》说:"江、潜、绵、洛为池泽",江即岷江,绵水即绵远河,洛水即石亭江,这都很清楚。只有潜水说法不一。刘琳校注说:"一为渠江,一为西汉水、一为潜溪河",其实都不正确。刘雨涛先生考证说:"江、潜、绵、洛四水并称,定是相距很近的河道。而渠江等三条河道离绵、洛有五六百里之遥,且在巴国境内。所以,定非真正的'潜'"(见《关于巴蜀古史的几个问题》)。

"潜水"就是"湔水",同音而异字。《彭县地名录》说:"玉垒山亦名湔山,即因湔水出于此而得名。"其主要支流银厂沟、白水河、白鹿河、鸭子河、小石河、土溪河、清白江都在古蜀国境内;并与绵、洛等河注入沱江。

而白沙河系岷江支流,发源于灌、汶交界之茶坪山,经连山坪、虹口、灵岩寺,流入岷江。《华阳国志》把"江"已列入,就不会把白沙河与之并称。这是《水经注》之误。后世人不详,就说东而道西了。

这里还要说几句的是:湔水支系的土溪河,下游注入蒲阳河,再汇入青白江。而蒲阳河又是从岷江流来的,这就把岷、沱两江联系起来

金　堂　峡

了。岷、沱两江各有源头、走向，怎么会相连，大有文章。

还是回到原来的话题吧。杜宇时的水患，应该是湔、绵、洛的洪水暴涨而引起。而三星堆正是其腹心地带，灾祸当最为严重。洪水难退的原因，是因为在今金堂的峡口处，江面太窄，泄洪不畅所致。这一点，邓少琴先生早有注意(见《巴蜀史迹探索》，第149页)。他引《读史方舆纪要》金堂县载："金堂县东二十里，高山拱峙，河流其中，相传鳖灵所凿"。《蜀中名胜记》："金堂峡口相传为鳖灵所凿。"《金堂县志》(嘉庆版)云："三皇庙在三皇滩上，神像中一，左右六，俱狰狞可畏，或云李二郎及七圣。然李二郎像，他处皆白面少年，而此则狞恶。""此盖鳖灵因凿峡有功，故建庙祀之，久而昧其源也。"邓少琴先生说："《县志》所载万安山人得俱免于洪水之危，反映了成都平原金堂峡未得疏通之前，水可淹至金堂。三皇庙在三皇滩之崖壁，造有狰狞三皇之神像而异于汉人容貌。显然乃相传鳖灵另为一族属，不同于原有之蜀人。"

我曾多次经过金堂峡口。至今，江面仍不宽阔。而只要广汉有水

患，金堂必受其害。因此，《华阳国志》所说，"会有水灾"，当是沱江水系洪水泛滥，祸及杜宇的都城今三星堆一带。其相鳖灵决"金堂峡"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此说就通了。那么，开明决玉垒没有？应当说决了，但这是开明当政，定都郫邑或成都以后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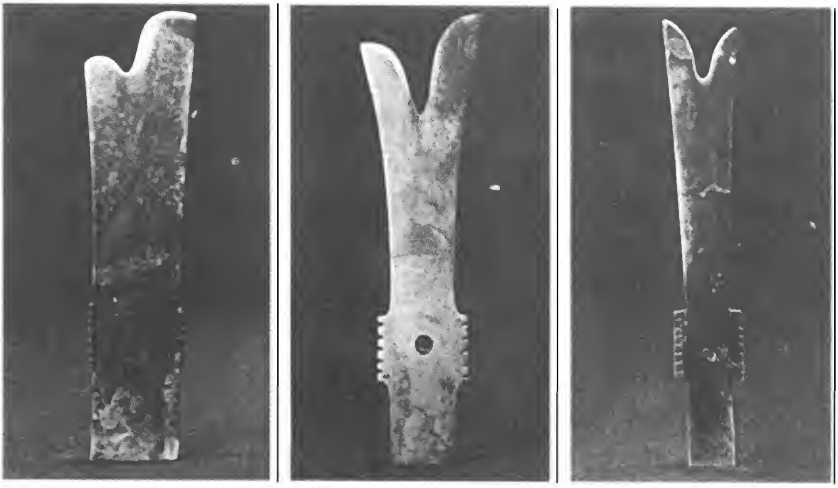
成都、郫县所有水系均属岷江支流，只有蒲阳河的一支，向东成为彭县与郫县、新都的界河，南流入清白江的。岷江洪水泛滥，殃及郫县、成都、温江及崇州。当时，金堂峡早已开凿。为减少水患，开明开蒲阳河，将岷江水与土溪河相汇而流入清白江。这种分流的办法，大大减轻了岷江的水害。而沱江因早疏通了金堂峡，也不会对广汉、金堂带来大的影响。蒲阳河至土溪河一带的山系，现在是光光山的南部，均为浅山、丘陵。从大范围来讲，都是玉垒山的余脉。所以，开蒲阳河引岷江水入青白江而注入沱江，叫它为决玉垒，也是讲得通的。

杜宇精于农业，开明精于水利，蜀国才有昔日的辉煌。

# 隔行说玉

从燕家院子第一次挖出三星堆文物开始，各种玉石器，就是除了陶器之外最多的物品。玉，从来就是个高尚的东西。中国人崇玉之风，至今不衰。就我这外行来看，三星堆的玉石器，虽不及中原精美，却有自己的特色。

专家们说，玉有广狭两义。从广义上讲，软玉、硬玉、碧石、蛇纹石、斜长石、汉白玉、松石都可以称为玉。而从狭义上讲，则只有软玉、硬



玉璋系列

玉、蛇纹石和独山玉可以称玉。

三星堆的玉器原料，大多来自玉垒山。因为今彭州市诸山，均为玉垒山系(详见《彭县地名录》)。玉垒山龙神岗有玉石岩产玉，与灌县西山相同。至今，白水河一带，仍有蛇纹石矿。我因缺乏专业知识，对三星堆的玉石料，说不出个究竟。听古玉收藏家张思勇先生介绍，三星堆出土的玉器，以蛇纹石玉为主，它有深黑、深绿和淡绿等几种。摆在博物馆内尚待加工的那两块大玉石，就是蛇纹石玉料。展出的玉璋中，这种玉料不少。第二类为蛇纹石化大理岩，也就是蛇纹石和大理岩的混合物。这是些颜色混杂，多现白色条纹，并有黄褐色或红色斑点的玉料。馆中的玉戈、玉刀，就有用这种玉材制作的。第三是透闪石玉。它的成分、硬度、密度基本上与新疆的和田石一致，是一种半透明、有光泽的软玉。从燕家院子出土的玉琮，就属此类。第四是硅质玉，这是一种硬玉，有白、黄、灰三种颜色。这种玉质不易受浸蚀，器物往往经过许多年仍色泽如新。第五为汉白玉，这是一种大理岩。三星堆有的大型玉边璋、大璧就是这类材料。据张先生说，这些玉料基本上都出自岷山和玉垒山。所以，蜀人制玉，是就地取材。如果发现是用翡翠、岫玉、蓝田玉、南阳玉制作的三星堆形制的玉器，可以肯定必是仿品，绝不要当文物买。

从博物馆展出的玉石器看，形制古朴奇特，气度非凡。但与出土的青铜器、陶器相比，又让人总觉得缺了些什么。按规律，许多青铜器的器形，应是以玉器、陶器为基础，发展变化而来。然而，以馆藏的器物看，青铜器，金器中的重器，如人头像、神树、金杖、金虎、铜蛇、人面鸟身铜像……玉石器中都没有它们的影子，这就很让人生疑。莫非这些重器，真是西亚或外星人偶然传授的？前面说过，60 年代，燕开正等挖到过玉石人头像，但实物难寻。我也从朋友处，看见过数以百计的玉石纵目人像、人面蛇身、人面马身等器物。据说都来自挖土淘沙的农民，却又难辨真伪。这一切，只好暂时存疑，以待来日。不过，也可以选几幅民间收藏的古蜀玉器照片，让读者们自己来欣赏和鉴别。

现在，我们可以先讨论已为考古界、文物界完全承认的石璧系列和

玉　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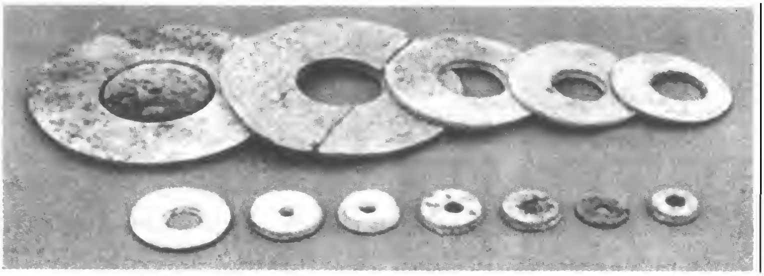
玉璋系列。

石璧最大的外径达70.5厘米,重百斤以上。小者外径为11厘米,厚仅1毫米。璋的规格也是从十几厘米到百多厘米都有 这种“系列产品”到底代表着什么意义?

关于石璧,有货币说,衡权说,显示财富身份说,祭祀礼器说等。论者全是专家,各有各的道理,但又觉道理都不够充分。仅以衡权说为例,中国的度量衡究竟源于何时,又源于何物,本身就是中国文化史中的疑案。《家语·五帝德》说“黄帝治五气、设五量”,《吕氏春秋》就认为“大不可信”,近人也颇有持疑者,而围绕选择什么作为量值的标准问题,也多有分歧。“以体为则”,“律身度量衡”、“黍生度量衡”……这些都是自然物。而石璧系列是经过加工制作的。它们之间的重量是否有准确的等级差异?它们的基本值又以什么为准?似乎还难以解说。若以石璧表示身份财富,在铜石并存时代,石璧的价值早已退居“二三线”,没有系列展示来炫耀的必要了。而在祭器坑中发现的玉璧与石璧

系列在质地和大小上均有所不同。因此，它的功能有待进一步探讨。

至于玉璋，大小长短不同，是由于玉料本身的大小使然，还是由于祭礼的需要造成大小不同的璋；其大小长短，有无规矩？因未见介绍，也无法详作考查，只好存疑。因为，璋为六瑞之一，其形制有明文记载《周礼·玉人》云：“大璋、中璋九寸，边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黄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缫。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马。”“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军旅，以沿兵守。”三星堆出土的玉璋，都与此规格不合。其实，璧也是一样，按规定，天子礼天之大璧，径长不过一尺二寸，哪能有直径两尺多长的？看来，蜀人使用玉璧、玉璋，一定另有一套规矩，我们千万不能用周代之礼生搬硬套。



石璧系列

值得一提的是，那柄青灰色的石边璋。其状顶端一为钝角，一为锐角，射部和柄部两面，均阴刻有两组图案。而每组又分为五幅，并以平形线相隔，图中有站立和跪状的人，有大山、太阳以及“[symbol]”形符号、“S”形勾连云雷纹、手纹和牙璋的形象等。这件珍品，通长达54.4厘米，其雕刻技术代表着三星堆所有玉器的最高水平。而这些图案的意义，专家们见仁见智，各有解说。就我看来，这些图案的整体意义，不仅一时难以猜透，只就那“[symbol]”符号，我们也不容易明白它的真实含义。这是一个谜语，还是让大家随意揣测吧。

# 说 制 陶

新石器时代，由于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提高，人们对烹饪、饮水、储藏等多种需要，产生了对各种容器的要求。于是木竹制品、骨角制品逐渐出现，最终引出制陶技术和陶器的产生。并以其原料充足，制作简单，经久耐用，成为生产和生活中的重要用品。至今，虽有塑料及金属容器和饮具，仍无法代替它的位置。看来，陶器从诞生之日开始，将永远陪伴人类。上古时期的各个遗址都有陶器出现，三星堆也不例外。那长长的台地周围及附近的田野里，到处都是破碎的陶片。有的成堆积状，数量之多，真可谓俯首可拾。在三星堆文物工作站里，几大间陈列室，全是修复的陶器。院里的库房和晒坝，还有不少陶器残部。几个人用尽毕生精力，恐怕也难把它们全部修复。

陶 盉

数量和种类多，说明了当时蜀人制陶业的发达。但对我们这些门外汉来说，除了那袋状三足陶盉与那些鸟头勺

外，还看不出与其他古遗址发掘出来的陶器有什么明显的差异。其陶色多是泥质灰陶和夹沙褐陶。而且，认真说，它们的纹饰并没有多大的特色。绳纹、弦纹、划纹、竹编式的网形纹、圆纹、波浪纹……仿佛在许多博物馆都见过似的。有少数器物上有"×"、"∧"等几何纹饰，但真正的动植物纹饰，我没有看到。至于彩陶，没有听过报道，当然就更没有什么彩陶绘饰可谈了。

三星堆的陶器主要是日常生活用品，如罐、盆、盘、碗、杯、壶、甑、鬲、勺等等。但是，却没有发现陶鼎（在考古出土的器物中，也没有玉石鼎和铜鼎）。这原因颇费揣测。也许，古蜀人傍水而居，取水方便，盛物又有箩筐等竹器，用不着烧制那种巨大的器皿。

陶　勺

三星堆的陶器，与中原的同类器物相比，形状大体一致。不同的是，中原人注意器物的整体装饰。如规范的造型，精美的纹饰与彩绘等等。而三星堆的陶器，却喜欢在细部上做文章。如展出的一些盖纽，有的像莲蓬，有的像宝顶，有的像凤冠，制作得很精美。这些小玩意儿，甚至透出了古蜀人某些兴致与爱好。如莲蓬的出现，说明池沼中的莲花，已是他们的观赏物。宝顶式的盖纽，表明圆顶宫室已经出现。而凤冠盖纽，联系到有冠的青铜鸟，凤的形象早已深入古蜀人的精神世界……

但是，三星堆陶器却也反映出古蜀制陶技术带有比较原始的性质。其所以如此，是蜀人在这方面比较封闭的缘故。

第一期的泥质灰陶，可以认为是居住在这里的土著人制造的。蜀人进入成都平原，除了栽桑养蚕，没有带来彩陶发展的信息。杜宇从朱提返回，那里也不是彩陶发达的地区。所以，蜀人制陶工艺，是在较原

始的形态下，独自发展的，这就大大影响了制陶业的进步。时至今日，广汉、彭县制陶的窑厂不少，特别是彭县的桂花镇、广汉的三水镇，土窑很多，但没有什么名牌产品。就是闻名全川的彭县瓷器，在全国来说，也排不上名次。

我们喜欢如数家珍地谈论我们的成就，纵向地看待我们随着岁月的成熟，却不习惯横向与别人别地区的先进处相比。三星堆的陶器虽然有少许特点，但看不出它的辉煌。我们应该从这里悟出一点东西！

# 海贝的由来

成都平原是内陆地区，却在三星堆的祭器坑里，发现了许多海贝。成都平原是不会生长海贝的。于是，它的出现，引起了许多议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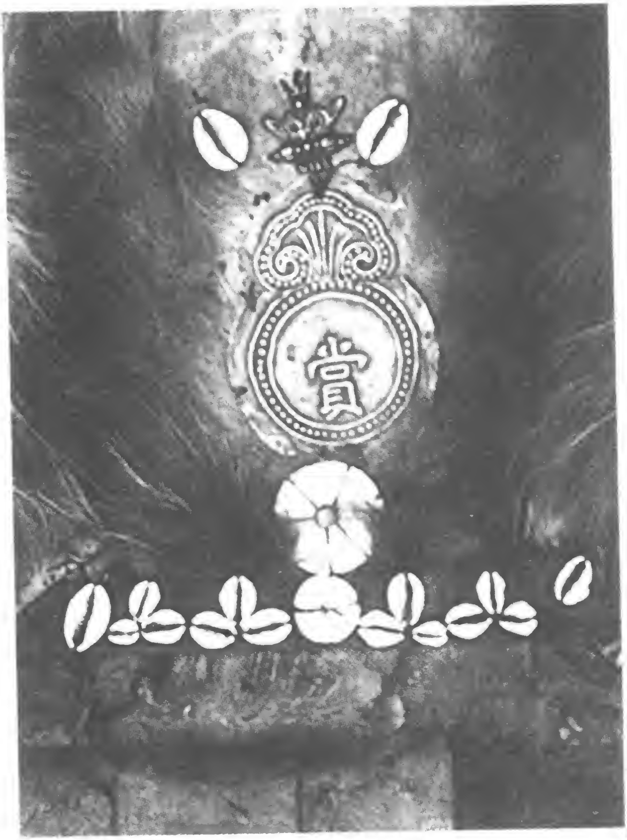
据报道，三星堆的两个祭器坑有大量海贝。其中以紫贝、环纹贝为最多，虎斑贝与拟枣贝较少。这些海贝，多数背部被磨穿，有的一端有孔。出土前是同玉器一起贮藏在尊、罍等青铜容器及青铜人像头部里的。

在古代，海贝的功能，除了装饰，主要是作流通之用。

中国最早的货币也是海贝。这大约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通例。为何会如此，专家们各有专论。三星堆出土的海贝，从贝端有孔和贮藏情况看，也当是货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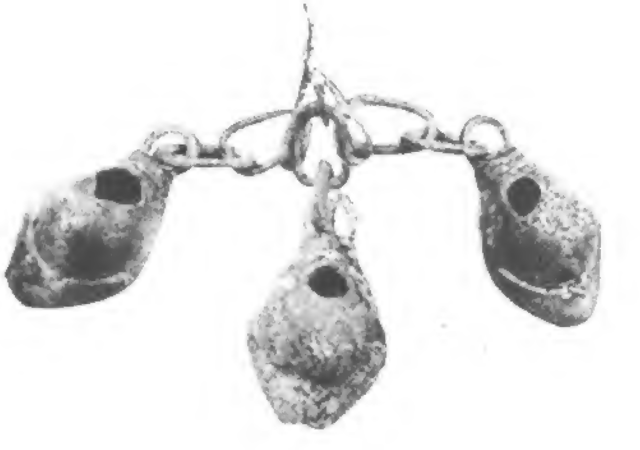
中国古代改以物易物而以贝玉等物为流通手段，大约在虞、夏之世。远古时，人们日中为市，依井而市，都是以以物易物的形式进行交换，很可能是在小范围内进行。夏禹治水以后，中原交通有了明显的发展。夏以帝都冀州为中心，建立了八州及其官道，这是入贡的路线，同时，也具有商道的性质。物品交换也因之发展到新的阶段。那时，甲从甲地把物品运到乙地，并不全是需要乙地的物品，也可能是要到丙地去购买其他物品的。到乙地的原因是甲地的物品，运到乙地比运到丙地能换更多的物品。于是，货币就应运而生。

最初的货币，当然是自然形态的，很可能是些贵重的装饰品。美




羌人祭祀用的海贝

玉、宝石、海贝都是对象。有些物品过于名贵、稀少，难以流通；有些易于损坏；有些过于笨重……渐渐退出流通领域。惟独海贝色泽美丽，坚牢耐磨，易于计数、易于收藏，易于携带，最后被选为通用的货币。所以，许多与财富有关的文字，都以“贝”为字根。盘庚把“贝玉”称为“货宝”。卜辞中常见“赐贝”、“取贝”、“囚贝”的记载。所以，商代的帝王和贵族贮藏海贝，已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不仅中原如此，边陲小国也是这样。它可以算作“国际硬通货”，与今日之美元有些相仿。正因为



铜　贝

这样，贵族们才纷纷把它贮藏起来备用，或传之子孙，或藏于陵墓。

三星堆的海贝不产于三星堆，而产于中国南部海域及印度洋。是否由此可以推论，海贝的原产地与三星堆的商路已经"打通"；也就是经南北"丝绸之路"直接从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阿拉伯海，及非洲的埃及和索马里……而来？这种推论值得怀疑。

三星堆的海贝，主要是与周边国家进行贸易交换得来。中原地区应是古蜀的最大贸易伙伴。这里有陇西和川陕之间的陆路可通。其次是巴、楚，它们既是邻邦，有陆路相通，更有长江水路之便。还有今云南、贵州及西藏诸邦。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就如今日以美元结算一样，是用海贝以朋为单位来结算的。我仍旧以为，当时的蜀国是泱泱大国中的一个小国，不大可能把自己的货物直接运到中亚或非洲，多是通过"转口贸易"来进行。多次"转口"就把沿海诸国本不很值价的海贝，变成了中国各邦国珍贵的"硬通货"，这应该更实际一些。华夏大国如夏、商、周王朝，他们所持的海贝，还可以通过近海诸邦国的进贡而获得，而古蜀国要想获得更多的海贝，除了贸易手段，就只有用战争来掠夺了。

总之，三星堆时代，古蜀国以海贝作为货币，与当时的"国际贸易"

有关,但是否就与海贝的出产地有直接交往,不可等同看待。在三星堆遗址出土海贝的同时,也出了些铜贝,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如果这些铜贝仅仅是装饰物还则罢了,如果与海贝同样是作为货币用的,这当是我国最早的铜币,其历史价值就非同小可了!

# 刻画符号与古蜀文字

我在《三星堆文化四说》中，对"不晓文字"，已表明过自己的看法。基本观点是：在杜宇之前，蜀人尚无文字，三星堆不是鱼凫氏的都城，是杜宇的都城。而杜宇时代，才可能是古蜀文字的草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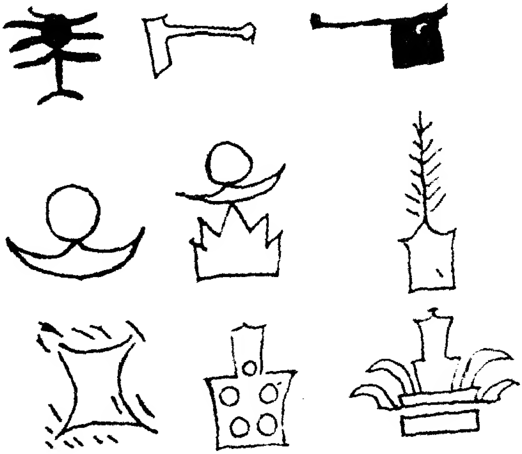
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我们还没有在三星堆的出土文物中，看见真正意义上的文字。

文字和原始记事符号是有原则区别的。文字是记录语言的。所以，一般来讲，它是按语言的自然顺序逐句来写话记言的。符号则不一定与语言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同一个符号，不仅各族语音不同，组成语句的主谓语也不同，意义也会不尽同。由符号发展成为文字，对汉字来说，基本上要具备"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条件（近人将汉字概括为象形、象意、象声更为合理）。

在汉字中，不少字与图形关系密切，如"牛"、"羊"、"刀"等等名词。它们的形、声、义是完全可以解读的。但是，单有名词是不能表达出一个完整的语句的。

因此，作为语言工具的文字，必须有了会意字的出现才有可能。这就得借助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符号，组成表现动作、变化、或性质、状态等等的词汇。这就是动词与形容词。如两人相随即为"从"字，两手相合即为"共"（拱）字，日出地上即为"旦"字，日入草丛即为"暮"字……文字的发展，不仅有名词、动词和形容词，以后还有代词、副词、连结词、语

气词、象声词。但最基本的，必须有实词(名词、动词和形容词)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句子，文字的语言功能才能落实。人们所以把在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符号定成最原始的文字，不仅因为它们的字形曾在不同的陶器上反复出现，最重要的是它们有些是会意字，如“旦”，“炅”(花朵)、“封”字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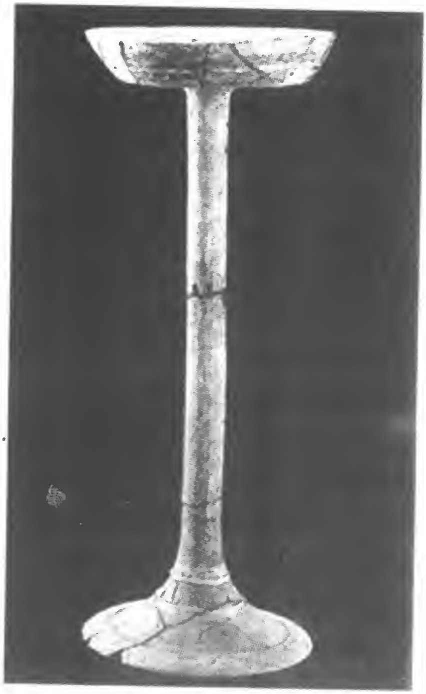


大汶口的陶文

我们再看看三星堆出土的陶符号。据几本书籍介绍，共有七个，分别为×、∧、 、 、 、 、 学者解读×、∧“可能具有计数意义”， 、 “意义不明”， “当释为贝”， 释为“朋”， 释为“目”。但有的专家指出，陶器的初期制品，上面的刻划符号随意性是比较大的。记事、区别主人、偶发的“灵感”都可能留下痕迹。李学勤先生在《古文字初阶》里说：“凡对简单的几何线条形符号用后世的文字去比附，总是危险的”。×、∧等符号，在各地古陶中多有发现，是否是文字，值得怀疑。贝字及朋字，据郭沫若《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一书，今殷文字中，有“姜商(赏)令贝十朋”一句，铭文贝作“ ”，朋作“ ”，与三星堆陶器上的符号大不相同。青铜器的铭文“目”字，多作 ，眼珠与眼睑相连，与 也不相同。再细看高柄豆上的符号，是 形，与眼睛的形象，相距甚远。

到底是不是"目"字，很成问题。退 步说，以上三"字"虽与古汉字不同，但确实是古蜀人"贝"、"朋"、"目"三义，可这三"字"全是名词而无一会意字。因此，就无法达到记录语言的功能。

我们在探索古文字时，可以发现，有些少数民族的象形文字，比已知的甲骨文或金文甚至大汶口的陶文更原始，更像一幅图画。但由于有会意字，所以就能记录语言。譬如"[Naxi glyphs]"任何一位认识纳西文的都可以解读是"打雷不下雨"。但陶器上这七个古蜀符号，皆因没有"不"、"打"、"下"这种词，就无法组成句子。



高柄豆上的图符

所以，我们说，从已发现的刻画符号来看，三星堆时代，可视为古蜀文字的草创时期，不能说已经有了记录语言的文字

至于学术界通称的巴蜀符号或巴蜀图语，多指刻绘于巴蜀青铜器、漆器及其他器物上的符号，时代基本上是在三星堆文化之后，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就不多唠叨了。

不过，稍细观察，巴蜀图语的许多符号，与纳西族的象形文字相近而三星堆陶器所发现的符号，却可归纳为直线和弧、圈三类，这又与古彝文的笔画相似。古彝文的直线、斜线笔画有：丨 一 フ 丿 丶 ↓ S Z ↩ / △ ◁ ×；弧圈和弧线变体有：U Ɛ ∩ ς ? ɔ ○ 0 O ⌓ 3 ϩ ɔ ʒ ɑ 等 我试着将陶器上的符号一用彝文笔画组字，结果都有组成了特别是[glyph]，与彝文的[glyph]敷药之意，十分相似。而玉璋上的[glyph]，也完全能

纳西族的形象文字

用彝文的笔画组成。甚至十二桥遗址出土的陶纺轮上的[illegible]和[illegible]，都可以用彝文写成。所以，段渝先生1991年发表的《巴蜀文字的两系及其起源》一文，值得重视。以我之见，杜宇之前，发育的是方块字。杜宇以后，特别是开明王朝，则是象形字。有专家说，夏代使用的是古彝文字。虽是一家之言，也不能忽视。因为，古文献上既有黄帝令仓颉造字之说，又有龙文、云文、虎文……各种文字之说。中国的文字起源，的确是一个还未真正弄清的问题。有人考证中国文字的起源，认为书契之作，实始伏羲。伏羲画卦，就是造字。如乾为天字，坤为地字，坎为水字，……近似古巴比伦之楔形文字。而阳爻则示奇数之一，阴爻则为偶数之二。易实为古时之“字典”，至仓颉始作六书（见张亮采《中国风俗史》）。这些见解，都值得认真审视。

还有一点应该提及，古蜀人来自古羌部落。夏人也是羌人东去的一支。所以古书上说古蜀人“言语颇与华同”。也正因为如此，才能相互通婚，互为君长。至今川语仍属北方语系就是明证。说蜀人“言语异

声”，是没有什么有力的根据的。“蜀左言”，指的是语法方面的不同。一般汉语讲“广都”，蜀人则称“都广”，“请你看这篇文章”，古蜀人会说：“这篇文章请你看。”羌族人时至今日，也有这样使用主谓语的，这就是“左言”的习惯。所以，在解读巴蜀图语时，不要忘了这个特点。但又有些遗憾的是，许多学者花了不少精力，已经发现了300多个单符和复合符号，但成句成章的语言记录，还没有被公布和介绍出来。

古蜀文字的真面貌，还有待于考古的新发现和专家们的新成果。

# 第“三条路线”

据《辞海》的《丝绸之路》条:长安到古罗马帝国的丝绸之路,从公元前2世纪就开始“开通”。这是一条商道,同时也促进了欧亚非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这条道路在中国的北方,所以叫北方丝绸之路。这条丝绸之路,还有几条支线,如取道新疆天山北面的通道及伊犁河西行,总会于今土库曼斯坦的马里,再进入伊朗,经达姆甘、哈马丹到伊拉克的巴格达,转地中海沿岸等。

对这条主干线,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了一条新的支线。据马丽华所著《走过西藏》说,常霞青《麝香之路上的西藏宗教文化》一书,在已成定论的三条东西方文化商贸交流的“丝绸之路”以外,又提出经由格尔木——那曲——拉萨——日喀则——日土——叶城,与主干线相连的第四条通道。这虽然没有成为定论,假说也是有不少根据的。

北方丝绸之路,与三星堆的联系,恐怕主要是经过北路的褒斜道。这条路商代就已开通。还有一条路是从彭县经茂汶盆地北上,过南坪进入今甘肃武山、天水,再从宝鸡到长安。据任乃强先生考证,这条路上古时,就是牧道。

当然,还有“南方丝绸”之路。据专家们说,鱼凫时代,即从瞿上出发,分两条路到楚雄,经大理、保山、瑞丽、八莫到缅甸的密支那,印度的利多,再从印度转往西亚及欧洲。对这条通路开通的时间,我的质疑,已见前文。

“条条道路通罗马”。对古蜀国来说，要把自己生产的丝绸布匹运往货价最高的外国，特别是遥远的古埃及、古地中海沿岸，是否还有其他捷径呢？

于是，我产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可否从古羌人来的路线，反其道而行，经松潘草地到与三星堆文化处于相同时代的第一次象雄文明的古象雄国，直接进入印度，经今巴基斯坦入伊朗，沿北路到伊拉克与北方丝绸之路会合，直达地中海沿岸各国呢？

大胆假设，必须“小心求证”。我的知识实在是太贫乏了，无法做到这一点。但是，我也可以提出几点“根据”。

由于羌塘产盐，上古时期，从羌塘往西一直有通道。这一点已经任乃强先生反复论证过。羌盐的南线，直通玉树以下。从三星堆到茂汶，自古也有通道。今天，银厂沟铁索桥头，还有一石碑。碑文说，此桥是茂汶通成都的古道之一，唐代即设绳桥守提。从茂县沿黑水河往西经马尔康可直抵壤塘。从壤塘再西行，即达石渠。这里虽是高原，几条河流多是支流（多柯河、尼柯河，及雅砻江的支系）水流湍急，但水面不宽，容易渡过。这是阿坝的高原区，“从古迄今都是羌族的牧场。……这个大渡河上游地区……不只以产金著名，又是森林茂密，野兽繁多和水草茂美，牛羊蕃息的羌族乐园……河原可种麦类、蔬果，盛产药材，故羌人入居甚早，并与华夏交通亦早。”（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第 146 页至 147 页）

据任乃强先生研究，吃哈姜盐的羌人，拥有这盐池之利，而最先进入氏族社会的可能叫“白兰”，主要根据地就在今天的石渠。他们销盐的东线可进入今松潘草地。南行则越金沙江沿扎曲河而至昌都。（当然也可西行玉树再南下昌都，这是行盐的“老路”）昌都在上古时就是部落的集聚地。其卡若地区，已发现不少新石器时代的遗物（见《西藏通史》，第 14 页）。从昌都沿藏北高原即羌塘的盐道，经丁青、巴青、安多、尼玛、改则，进入今阿里地区，这全是古象雄国的疆域。古代文献对古象雄的记载，就与过去汉文古书对古蜀国的记载一样语焉不详。“但有一点是大家深信不疑的，古象雄文明的发祥地和活动中心，就在阿里高

原的象泉河、狮泉河流域。它肯定产生过、生存过、辉煌过。”(张建林《荒原古堡》)据马丽华在《走过西藏》一书介绍:“距今两千多年前的社会里,象雄部落西起今阿里地区的岗仁波钦,是为上象雄;东至今昌都的丁青,是为下象雄;横贯藏北的文部一带是中象雄,也是整个象雄的中心所在。王宫就建在当惹雍湖边的穹宗。”从这样看,古蜀国和古象雄国的距离是很近的,只隔松潘草地和石渠到昌都的大草原。

按《西藏通史》“悉补野王统世系”所排,藏王聂墀赞普经过 31 代,才被吐蕃赞普王统所代替,时为公元 7 世纪。以此推算,悉补野王的第一代聂墀赞普,当在公元前一二世纪,据藏史记载。聂墀赞普生于西藏波沃地方,即今林芝地区的波密县。后来去了吐蕃中部,成了吐蕃王,创建了雍布拉康宫。聂墀赞普统治吐蕃前和以后许多年,西藏的各小邦国仍然存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说“各小邦地方,各有小城寨,小邦王及小邦大臣分别是:象雄阿尔巴之王布勒娘谢尔,家臣为琼波·热桑杰与东伦玛孜二氏……”(转引自《西藏通史》,第 16 页)。聂墀赞蕃之子为穆墀赞普。他为王时,“觉邬兰察担任本教神师,建本教城堡科玛乃邬琼宫。从象雄请来以大学者辛·南喀囊哇托坚为首的 108 名本教教师,在吐蕃创建了 45 座本教聚处,翻译了《经》、《般若》、《续》和《聚合》等多部本教经典。又将净天字改成大食堆状字,将大食堆状字改成象雄字体,将象雄字体变成马扎……这是以字母书写经典的开始。”(《西藏通史》,第 26 页)由此可见,早在公元前许多年前,古象雄就有高度的文明。

古象雄时代的疆域,从东到西,占据了西藏的上半部。羌塘正是它的领土。许多年来,藏族人一直从羌塘取盐,经阿里地区运往印度贩卖。所以,可以断言,从羌塘经日土,利用象泉河、狮泉河的水路之便,进入南亚诸国,是一条最为方便的捷径。藏名为森格藏布的狮泉河流经克什米尔,进入今巴基斯坦,最后汇入巴基斯坦最大的河流印度河。既可上岸由伊朗与北方丝绸之路相会,经巴格达到地中海沿岸;也可从卡拉奇经波斯湾直抵伊拉克。

当然,抵达阿里,也可以从日土北上于田与北方丝绸之路相会,但

应该说，经印度河的水路，不仅路线短，也方便得多。

在阿里地区还有三条河流：朗钦藏布的象泉河，穿过札达盆地，流入印度；当却藏布的马泉河，是雅鲁藏布江的上游，最终汇入印度的恒河；马甲藏布的孔雀河，是恒河支流哥格拉河的上游。从水路进入印度，实在是太近便了。

从以上种种，是否可以说从古蜀经西藏到印度的商道，若干世纪以前早就存在？我们还可把这条古道和“南方丝绸”之路作一比较。从成都至印度利多，要经过许多大川深谷，其中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全都险恶异常。到密支那，又是伊洛瓦底江，去印度的利多，也得翻越许多纵向的高山，如甘高山脉、明京山脉、那加山脉……而印度的利多隔我国的藏南地区只有一条普特拉的界河。古蜀人走这条路，不是太冤了吗？何况，从川、云到缅甸，山高林密，毒蛇猛兽、瘴气等等，对行人来说，简直是险象环生，步步陷阱。这些鸟道兽径，不只无舟楫之便，有些地段，即使人背马驮，行走也十分困难。而到了利多往西，穿过今日之孟加拉国、印度，再入今巴基斯坦，还有不少高山、河流、沙漠、戈壁等着呢！看来，这条路的“开通”，实在是费力费时。

而从成都经阿坝、石渠、昌都、丁青至阿里这一条路，虽全是高原，又处长江黄河的发源地，但多为大草原和大小湖泊，既无高山，也无巨川，更无戈壁沙漠。其平均高度虽在4000米左右，但对一直生活在高原上的古羌人来说，却正是他们最适合的生存环境。这些大片大片的草原，可以任他们驰骋。

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在高原的古盐路上，有独有的运输工具——牦牛。羌族人最早驯养成功的牲畜，便是牦牛。它吃苦耐劳，百依百顺，而且还只能生活在高寒的青藏高原上。上古时代，羌人就用它驮盐运物，至今仍缺不了它们。把四川的茶叶、布匹、丝绸用牦牛驮往西藏，近代也还是这样。因为有了它，高原之路就变得方便起来。这就是其他地域不可能具备的优越条件。

更有一点也该引起注意的是语言因素。羌人与藏人本属同一祖先，语言当大致相同。藏族中的康巴人，在吐蕃王朝建立前，多数就是

古羌人。藏、康均为羌之转音。康巴人的语言与其他藏区大同小异。商道上有了这个条件，比走南、北的道路，不知方便多少倍！

再者，从古至今，四川与西藏的关系特别密切，商贸活动十分频繁。四川需用的皮毛、药材等物，主要是西藏供应。而西藏所需之茶叶、布匹、丝绸及其他日用品，在青藏公路未通前，也靠蜀中供给。

蜀锦蜀缎，在中国享有盛誉。但是，从全国范围来说，江南、陕西、两湖都是丝绸的重要产地。中原地区，也有发达的纺织业和养蚕业。甲骨文中有桑、丝、帛、屯等字，说明在商代，中原的纺织业已初有规模。到了西周，更有大的发展。《诗经》中许多种桑养蚕的描写，反映了黄河流域纺织业的繁荣。"和中国文化有密切联系的蚕丝，现在虽然盛产于南方，但最初是在北方发展的。汉代以前的丝纺工业中心皆在北方，从南北朝时直到唐代，无论式样或数量，南方的丝织物，还不及北方。"（详见陈百祥《中国文化地理》，第 6 页）可以说，"丝绸之路"上的丝绸，主要还不是古蜀的产品。而使用蜀丝蜀绸蜀布的，除了中原，以周边地区而言，恐怕要算西藏。

西藏不出丝绸和棉布。藏民使用的衣物多为毛织品，但丝绸布料也有需要。哈达、丝绦不必说了。衣帽的装饰，妇女的围裙，以至王室的锦衣、锦帐、锦垫……用的都是丝绸之物。今天，邛崃、大邑一带仍有专门为藏族同胞生产日用品的厂家。所以，蜀人的丝绸、蜀布、邛杖等物，经过最会做生意的羌人，通过古盐道运往藏区，并经阿里等地转运到印度及欧洲、非洲是完全可能的。古印度无疑是古蜀人运往海外物品的集散地。所以，张骞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时，"见邛竹杖蜀布，问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印度）国'"（《前汉书·张骞李广利传》）。张骞曾说："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于大夏东南几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直径又无寇。"（同上）按张骞的意思，从蜀直接到大夏，这是一条没有敌寇的道路！

因此，张骞向汉武帝建议，从四川寻找通往西方的道路。汉武帝也认为如果有这条通路，既可夹击匈奴，又可获得西域各国的奇珍异宝，

更使大汉能“威德遍于四海”，于是任张骞为发间使，执行这一任务。公元前122年，张骞在犍为“数道并出。出駹、出莋、出徙、出邛、出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莋……”可以看出，张骞派出五路先行，有两条（出駹即走茂汶，出徙即走天全）是直往西去的。他们以汉使官方的名义没有走通，考其原由，不是没有道路，而是其间小国很多，不愿受汉族的大帝国统治。再者，商路全线贯通，中间小国的“关税”就必然减少，对本国不利。所以，设法阻止汉使通行。而这种情形，在北方丝绸之路上，也一再发生过。丝绸之路上的丝绸，是被隔成几段转运的。陆路从长安到伊拉克的巴格达，然后转到地中海各港口。到罗马的丝绸由奥斯底亚港上岸。中国人所得之利，仅限于把丝绸品交给最初的搬运者为止。沿路的国家要收税，转运的中间商要获利，由于重重加重利税，所以真正到达欧洲时，才会变成最昂贵的奢侈品。据记载，公元1世纪末，官居西域都护的班超，曾派甘英使大秦（罗马），安息商人为了垄断东西方的贸易，不愿中国与罗马直接接通。在波斯湾欲渡海时，安息西界的商人就吓唬甘英说：“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若遇迟风，亦有两岁者。故入海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甘英听了，不敢再走。张骞派出的先行们，除了路上的艰辛，可能也有类似的威吓。加之那些不听招呼的小国，“辄杀略汉使”。所以，张骞之行虽然失败，但这并不能证明没有商路。

商道上的商品来往，必然会引起文化方面的交流。有人说，敦煌壁画是中西合璧之物，它直接受到龟兹壁画的内容、形式和表现手法的影响。而龟兹壁画又直接传自于印度和阿富汗。石窟艺术在甘肃、陕西、四川……都大量存在。自敦煌上溯，则有高昌（今吐鲁番地区）石窟，再往西，则是龟兹克孜尔石窟群（见马丽华《走过西藏》）。商品开路，文化唱戏，古今皆然。那么，我们提出的成都阿坝之蜀国经古象雄西至印度河的商路，在这方面能看出什么端倪吗？

以宗教为例，藏传佛教之密宗，在四川佛教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佛教传入以前，西藏土著人信仰的是本教，这是主张万物有灵的多神教，与古蜀人也很相似。有人说青铜人像、神树等是受西亚的影响，但

从印度河的文明看，"金属加工以红铜和青铜为主要原料，采用煅、錾、焊、失蜡法等铸造技术，制造斧、锛……容器、人像和动物雕像等。也有……金饰物等"。"印度河文明有其自身的宗教体系，崇拜男神、女神以及牛神……树木神。那里还流行石刻印章等。"（见李连、霍魏、卢丁编著《世界考古学概念》，第 195 页）这与三星堆出土的人像、神树，及后来的古蜀铜、陶印玺，难道不能拉上一点关系?！当然，影响不能代替创造，蜀人的文化，不仅不同于印度河的文化，也不同于藏文化。我们也吃面包，却长不出黄头发、蓝眼睛和高鼻子！

我希望这"中丝绸之路"的猜想，不是无稽之谈。果真如此，古蜀文化当更加光荣！

三年前，我初写本章时，有关"中丝绸之路"，对我来说，完全是猜想。我不知道，有许多学者，已对它作了深入的研究。

1999 年，《西藏旅游》第三期所发表阎振中《天路之驿》的文章中，谈到了掩映在雪山丛林深处的"丝茶古道"。据他说，专家们考证，"这条通道在公元 7 世纪以前，已经存在。象雄国的版图和本教传播史可作佐证。开辟于公元前 2 世纪的丝绸之路，联通欧亚，是文明及经济的重要传播通道。而并行于南方的另一条重要干道——康藏高原丝茶古道，据考证，其开通年代至少早于西北丝绸之路两百年。"这里所说的公元 7 世纪以前，正是蜀国的杜宇、开明时代。

阎振中先生在该文中，引用了张策则先生所著《康藏高原丝绸古道及货币探踪》，对丝绸古道所作的详尽考证说："四川方面主要有黎沈、碉门、松潘三路，其中黎沈道开通最早，是所有入藏商道的主要干道，也是南丝绸之路入藏之道。

"黎沈道：从成都南下，经雅安到汉源县清溪乡的羊圈门入藏，全程 6175 里（古籍记程里数。下同。）共分为四段，成都至打箭炉段，共 11 站，计程 1020 里……打箭炉至巴塘 16 站，计程 1230 里，通称'康南大道'或'南路'……巴塘至察木多（昌都）段，共计 14 站，计程 1405 里；察木多至拉萨段，计程 2520 里。

"碉门道：从成都至雅安分路西行，经碉门（天全）到两路口分为两

道。一路翻二郎山下冷碛经泸定，瓦斯沟上康定。一路过银厂沟，翻岚安山到岚安沿大渡河东侧上丹巴，北上西行道孚。或从烹坝经瓦斯沟上康定。打箭炉由霍尔德格草地至察木多段共计39站，计程1885里，通称'康北大道'或'北路'，……察木多经类乌齐草地进藏段，共计29站，计程1880里。

"松潘道：由成都西北行经灌县到松潘出黄胜关至藏，从松潘到索罗木，全程1590里……"

以此看，当年(公元前122年)张骞在犍为"数道并出。出駹、出莋、出徙、出邛、出僰"，是有路可寻的。也就是说，"第三条路线"并非妄言。它就是川藏的"丝茶古道"。比北丝绸之路和南丝绸之路，(即成都——大理——保山——八莫出境之路)还更早开通。

# 妄说“神坛”

三星堆博物馆,有一组展品名曰神坛。就我所知,这件文物,是第一次公布。其展示环境,又搞得庄严而神秘。所以,这个景观,就特别耐人寻味。因光线昏暗,“神坛”的细部根本看不清楚。只有旁边的一个展台上的两件残片,可以供参观者观赏。

解说小姐说:“这件横空出世的神品,就连‘神坛’这个名称取得是否准确,我们也拿不准……或许,你们的想象及你们对这件神器的解释,能够给我们一些启示。”

于是,我就来姑妄言之。

坛者,土筑之台也。凡用于祭祀的曰祭坛,用于教学者曰杏坛,引申之,文人活动场所叫文坛,政治家驰骋之地叫政坛。坛的意思变得抽象起来。

我们在这里只谈祭坛。远古的新石器时代,祭坛已经出现。如浙江余杭瑶山良渚文化时的祭坛遗迹,是一处面积达 400 平方米的由红土台、灰土围沟和砾石面组成的三重建筑遗迹。这座祭坛建在山顶上,可能有通天之意。在辽宁东咀遗址发现的祭坛,中心部分有一座大型的方形基址,有房子的遗迹和已经石化的人骨,距今 5000 年,据说具有祭祀女神和农神地母的意义(见 1984 年第 11 期《文物》)。还有内蒙古的莎木佳、阿善、黑麻板遗址等等,都有祭坛发现。从这些遗址观察,上面都有房屋或墙址、石堆等痕迹。

“神坛”残片

夏代的祭坛是什么样子,不知其所以然。但《国语·鲁语上》却有哪些人可以列入祀典的记载。商代祭祀繁多,是人祭牲祭的鼎盛期,甲骨文中有详细记述。江苏铜山丘湾发掘的一处商代祭祀遗址,中间是以大石作为祭坛,周围置奴隶和狗,即《淮南子·齐俗训》中“殷人之礼,其社以石”之谓,是社祭用的。殷之后,对祭法已有专门的规矩。祭天、祭地、祭日月、祭祖先,其坛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明确的叙述,读者可阅读《礼记·祭法》。

其实,神坛是一种泛指,即祭神之坛,但具体是哪一种神坛,因对象不一样,就须有其更为具体的称谓。这就如我们称各种庙宇都谓之庙,

但世上却没有一座没有名称的庙宇，不管是东岳庙、灵官庙还是土地庙……这就有点像白马非马一样。如果那神奇的青铜器物是“神坛”，我们不禁要问，它是什么神祇的形象？

首先，这座“神坛”的基座，是从羊子山“借来的”，三星堆遗址还没有发现。因此，我们不能从基座的外形来研究它的“内涵”。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神坛”上的神器，是“放大”的，而下面的台基，却是“缩小”的。如果都以实物为准，羊子山的祭坛底部为 103.7 米见方，第一、第二级各宽 18 米，第三级 31.6 米见方，高出地面 10 米以上。而在其顶端，只放一个残高 53.3 厘米高，底座直径 22.1 厘米（《三星堆祭祀坑》，第 233 页，文物出版社）的青铜器在上面作为主祭对象，这就太渺小、太无气势了！我们不妨找一个“参照物”——公元 2000 年前西亚乌尔城的塔庙来比较。塔庙高约 12 米，分三层，基部为长方形，面积为 64 米×46 米，顶部有一小神庙，为月神南纳的寝宫，亦是塔庙的中心，神位放在寝宫的壁龛内。它的中心部位，从内到外都十分突出。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 545 页，月神南纳庙遗址照片来推测，小神庙的长度不会小于 6 米，而羊子山土台长 103.7 米见方，以十分之一计，神坛的祭物也应在 10 米以上，与这不到半米的青铜器，实在太不匹配。因此，我认为把这个所谓的“神坛”，放在一个巨大的土台上，是不合适的。若以北京的天坛、地坛来看，作为坛的主体部分就更加雄伟了。所以，我的第一印象：这件青铜器放错了位置。

其次，如果它是神坛，又是什么神？以现在的残片看，似乎没有主要的形象。是祭神兽？又有人；是祀人（祖先），形象又雷同；是祭山川，又有人、神；是祭天神，又有人、兽……如果祭坛上只呈放这样一件神器，恐怕这神坛的具体称谓谁也叫不出来。

因此，我斗胆地认为：这不是“神坛”！

如果不是神坛，又是什么？按我的猜测，它是某个青铜头像上的帽子！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头像，特别是比较大型的神像，其中有些应该有冠而没有冠，我暗地里总觉得难以解释。因为，以当时的铸造技术，是

应该而且能够为这些无冠的神像造出堂皇的冠冕的。

古人和今人一样，是很注意帽子的。《仪礼》首篇就是《士冠礼》。他们喜欢戴帽，而不像今人怕戴“帽子”。西周以前，真正的冕冠到底是什么样子，目前尚无形象资料可以援引。但在商代，人们多头戴高帽或圆箍形的頍，则是可以肯定的(《中国全史·中国远古暨三代习俗史》，第141页)。西周以前，头冠尚无旒冕之形。因此，它的图饰，均应在帽檐的上端。古代的王冠、图饰本来就很复杂和精致，作为神冠当然更应丰富而奇特。因此，在这又圆又高的神冠上，上古的艺术家们，就正好驰骋其想象，制造出这一绝世珍奇。

贵重的冠冕有几层，并不奇怪。真正的皇冠，我没有见过，剧团里的“堂帽”(即王帽或皇帽)见得不少。它以金色为底，下圈铸以金龙，龙上缀以多层的黄色绒球，后面还有朝天翅两根，两耳垂黄丝穗。这当然是戏曲化、简略化了的皇冠。真正的冕冠，描金绣银，镶宝嵌玉，一定要复杂得多。这些，从历代帝王图像中，也能窥其一二。

如果是神冠，那冠上的各种图饰，又是什么意思呢？据我看，它用各种形象表明，神是天地间所有一切的主宰者。这三层是地、人、天三界的缩影。也就是古人天地人的观念的反映。那无以名状的动物，是地上走兽的综合形象。人在兽之上，所以为第二层。

这里，要对立人头冠上的卍形图符，多说几句。细心观察，这个图符，不是早期的“万”字符号。因为，我们说的“万”字，是“卐”，它是顺时针方向的。而这个图符，恰恰相反，它是反时针的。

追溯“卐”之来源，似乎与佛教有关。佛教的法轮为卐，代表法轮恒转不止，所以，《宗教辞典》注为释迦牟尼三十二相之一，原为古代符咒，护符或宗教标志，被认为是太阳或火的象征。婆罗门教、佛教、耆那教等都使用过。武则天长寿二年，制定此字读为“万”。因此，这个符号据说是佛教传入以后才有的。

而卍则不同。在三星堆时代，当然没有佛教传入，而这符号本身也与它不同，但却与西藏原始的宗教本教的教徽一致。今天，在本教流行的地方，还能看见这种符号。而据马丽华《走过西藏》介绍，在那曲以西

的日土岩画中发现了由“卍”太阳演变的全过程：⊙→¤→ →卍→卍。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冠上的这个符号，与西藏的原始宗教符号如此一致，证明蜀人与藏人的族源关系，十分密切。

铜冠上最上一层的山和人面鸟身像，是指天。因为，在古人的眼里，山和天是一致的。在天上生活的，是这些天使。而这一层的跪坐人像，则表明人是上天的奴隶。

以上种种，当然是我对三星堆时代青铜铸造家所创作的这件神器的揣想。究竟如何，还须专家们多方考证。总之，在我看来，每座神坛的祭祀对象，都是具象的；而作为一种装饰则常常是抽象的、概括的。

虽然如此，它的艺术价值仍当是无与伦比的！

雾中王国三星堆，留下的谜还不少。要解释这些有趣的谜，首先有赖于新的考古发现。同时，也须科学的分析和判断。

孔夫子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我把自己孤陋之见写出来，正是为了多结交些喜欢三星堆文化的朋友们。

# 附录

## “三星堆文化”四说

“三星堆文化”的确认，使千古之谜的“古蜀王国”从神话中走了出来。“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从古遗址发掘出的各种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令人惊叹不已。我们的祖先，既然能在这个盆地里，创造出如此灿烂的文化，我们为什么只把“盆地意识”作为贬义词，而不去利用它培植和浇灌出更多的富于四川特色的绚丽的花呢?

古蜀国的历史，虽然从神话传说中走向历史现实，但也正像现实有许多尚不知晓的事物一样，面对各种典籍和出土文物，我们往往又产生了许多新的困惑。困惑，也是诱人的，它可以激发探求的欲望，而真理正是从探求中发现的。

笔者不揣固陋，愿将自己的思考写成杂说，以就教于方家。

### 一说“不通与不同”

三星堆的出土文物，所以引起巨大的关注，被视为我国近十年来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确实有它不同凡响之处。

三星堆出土文物，与中原、东南等地出土文物有哪些异同，专家学者已有不少精彩论述，毋庸赘言。我想说的是:一种物品的制作和形态

之所以相同相似，总是因为文化氛围相同或相似的缘故。反之，形态不同，则是由于文化氛围不同。所以，通则同，不通则异。三星堆出土文物的一些奇特之处，正是长期“不与秦塞通人烟”的结果。

《华阳国志·蜀志》的第一句就是：“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因此，说“蜀王，黄帝后世也”（《史说·三代世表》）。无论北方的《世本》，还是南方的《山海经》，都基本上是一致的。

其实，认真说，中原华夏与蜀族，是“亲戚”。

上古时期，作为羌族的一个分支的蜀族，生活在松潘草原下的岷江上游的河谷间。他们会饲养野蚕，所以用“蜀”来为部族命名。据任乃强先生考证，其地理位置，大约在今镇江关与叠溪之间，最南不过杂谷脑河口。

当时，蜀族与中原的关系是很密切的。蜀族的“血表”颛顼，生长于四川，后来成为中原的盟主。夏代的“开国元勋”大禹，生于蜀族的聚居地石纽。这种互相婚姻，互为君长的情况，就是很好的例证。而且，从地理上讲，从蜀山（岷江上游的两岸山区）松潘草原，有路直通陇西，交通也方便。因此，此时的蜀族，与中原诸族，在语言、习俗等方面，都是很相近的。1979 年秋，在汶川龙溪河区有墨绘彩陶双耳壶出于石棺，与甘肃齐家、马厂文化很相似，晚期相当于夏代。

所以，通则同。不通则不同，事例就太多了。人们研究文化现象，总是把它们划成许多地区，而这许多地区之间，有一种规律：地区相近，文化相似；互相隔绝，迥然不同。而相连地区又往往相互渗透。以非洲舞蹈面具为例，利比里亚的诡异凶狠，刚果的简洁安详。特别令人注意的是：越是交通不便的部族，其艺术愈有特色，而一旦与其他部族交往频繁了，其特色就消失了。

三星堆文化的“与众不同”之处，正是在不通的条件下形成的。而蜀文化特色的逐渐消隐，也正是在与秦楚交往频繁，特别是秦灭蜀以后。通则同了。

那么，古蜀国在相对意义上与外界不通而独立地发展其文化，到底

有多长的时间？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华阳国志·蜀志》说："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灃，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此时，他们已经把中原的典章制度引进蜀国。据记载，从秦惠公十三年至楚肃王五年，即公元前387－377年十年间，"北伐秦，东伐楚"，"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番"是蜀国的最盛期。此时一定吸收了许多外来文化，才带来开明九世的"政治改革"。但下限最好以秦灭蜀的公元前316年为准，以便于计算。

蜀王无年表。开明十二世有记。若每世以25年概算，则为300年。杜宇"积百余岁"、"或治瞿上"，而蚕丛、柏灌、鱼凫"各数百岁"，若四代均以200年计，则为800年，共1100年，我们认为蚕丛这一支是在殷朝盘庚前进入四川盆地的（理由详见下节）。盘庚迁殷在公元前14世纪，而秦灭蜀在公元前4世纪。因此，可以说，蜀文化有相当于1000年的独立发展期。从蜀族来说，则正是从蚕丛后的柏灌开始。他们仇恨商人，远避商人（四川今日的方言中，尚有"瘟商"为骂人语，就是这件历史大事的遗痕）。而"有周之世，限以秦、巴，虽奉王职，不得与春秋会盟，君长莫同书轨"（《华阳国志·蜀志》）"三星堆文化"，就是这种独立发展的结果。

有学者就三星堆文化中殷周的影响，如彭县竹瓦乡出土有父癸觯和父已觯等西周铜器，认为蜀国与殷、周关系仍十分密切。这是误解。徐中舒先生说："战国以前，除《尚书·牧誓》外，就没有有关蜀的记载。"而细读《牧誓》，更可发现："嗟，我友原冢君，御事……及、庸、蜀……濮人"前面是官谓，"及"以后是人，这说明蜀参加伐纣，不是以官方名义。

可以说，殷、商之际，中原与蜀国的关系是很隔膜的，即使是与蜀族有关的，也不一定指四川盆地里的蜀国。而有的，更明显地可以看出不是"梁州之蜀"。《逸周书》有新荒命伐蜀，五天之内，伐蜀的将帅就回来的记载。这显然不是四川的蜀国。又如《春秋》成公二年"公会楚公子婴齐于蜀"，这是山东的蜀。而魏惠王元年，韩赵合兵伐魏蜀泽，则又是河南的蜀了。

古蜀国确实有1000年左右的"闭关自守"期。在这段时间里，除了

松潘草原的“亲戚”,相邻的秦巴,至少他们和中原及荆楚,很少有政治关系。

## 二说“因何误入桃源”

居住在岷江上游的蜀族,由于生产的发展,主要是家蚕饲养的成功,使他们开始了定居生活。养蚕,必须要气温较暖,有适应桑树生长的浅丘与平原,这正是岷江叠溪以下的茂汶盆地所具备的。叠溪,汉代为蚕陵县治,唐代曾立丛州。可见是蚕丛氏经营的地方。蜀族进入茂汶盆地后,不仅推动了养蚕业,农业也有较大发展,成为名震中原的富庶之区。不然,在中原做过大官生性高傲的崇伯鲧,怎么会到那里去研究修路治水的学问,并让自己的儿子禹在那里生育,就教?

茂汶盆地既然如此宜于生息,蚕丛氏又为什么要千辛万苦,翻雪山,越险道,去寻找新的留居地呢?

任乃强先生在《四川上古史新探》关于《鱼凫氏为何逾上进入海窝子》共存三说:一、渔猎追捕中偶然发现;二、被草原其他羌族部落驱赶;三、内乱和外患。并以为第三说最为可能。我则认为:一、最先进入四川盆地的蜀族,还不称鱼凫氏;二、蜀族一部迁徙的原因,主要是殷人对羌人的残酷镇压。他们是避难而“误入桃源”的。

徐中舒先生在《夏商之际夏民族迁徙》一稿中,曾详细描述了夏朝灭亡后所发生的这场大迁徙的图景。

上古时期,部族之间的关系最首要的是血缘。在夏商之间的战争中,与夏族有婚姻关系的羌人(包括蜀族),肯定是站在夏一边的。夏族战败后,就从自己统治区域内向四处溃逃。因为,在当时,胜利部族对战败者的处置是十分残酷的。这些逃亡的夏人,到了新的地区,与当地民族融合,成了新的部族,如匈奴、月氏、女真、越……等。

夏民族的失败,必然波及到他们的同盟军羌和蜀人。武丁以前,无文字可考。即使200年后,盘庚东迁于殷了,对羌、蜀仍在残酷地迫害。

面对这种形势,世居岷江的蜀族,是无力抵抗的。一部分留在原地

青铜雕像之一

俯首投降，而一部分不愿当奴隶的，就只有逃离。逃向哪里？上古时期的先民，对外界的了解十分有限。与茂汶盆地一山之隔的玉垒山脉，蚕丛氏的某些猎手，可能光顾过，知道这里也有河谷、平地，可以生存。但也许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仅仅是为了逃避杀戮和奴役而闯荡。

据任乃强先生考证，蜀族的一部是从雁门关东岸的安山乡，沿着小溪，翻越高达4000多米的九顶山，进入今彭县北部的。然而，他们的第一站，还不可能是海窝子。

今彭县北端的大宝乡，正北与汶川接壤。其间的白水河，从北向南、流入湔江。河谷间有适合种植的台地如牛圈沟、连甲坪、大坪、国舅坪、团山等等。《山海经》中的《南山经》说青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其音若呵，名曰灌灌，佩之不惑。”九顶山下的河谷中，也有许多这样的祥鸟。迁居到这里的蜀人，就以此鸟为部落名，是为百灌。

白水河两岸，层峦叠嶂。那一块块的平坦台地，比起他们原来的茂汶盆地，实在是太差了。于是，他们顺着地势向南前进，终于到了湔江的今名小鱼洞一带。境内有丙寅沟，盛产鱼。直到汉代，《蜀都赋》还说：“嘉鱼出于丙穴”。丙穴即小鱼洞。与丙穴相对，在湔江岩下另有一穴，水势浩大，也产鱼，为大鱼洞。这里有水有山，鱼多鸟多，鱼凫之名，盖沿于此。

这个地区海拔 1000 至 1500 米，有河谷丘陵，湔江横流，灌溉方便，气温较暖，雨量亦充沛，适于农牧。所以，《华阳国志·蜀志》说：“鱼凫王地湔山”。

蜀族的行动路线是从北向南，从西到东，从高到低的。这与四川盆地地势、水系有关。蜀王治郫，始到海窝子。治瞿上，才到三星堆遗址一带。但古郫不在今日郫县，而在北面的彭县境内，看法比较一致。“邑号小郫，产多嘉种”(嘉庆版《彭县志·序》)其具体的位置，少有论及。

从小鱼洞南下，即今日之磁峰场。从磁峰场往东，为新海，即海窝子。两个乡的北部属浅丘地区。南面则为湔江的河滨区，有不少河坝地。今天来看，是些“望天田”。但 3000 多年前，水源一定很充足。这一带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约 15℃，年降雨为 1100 毫米，是发展农业的好地方。“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华阳国志·蜀志》)正指此处。蜀国从农牧并重，以牧为主，转变成以农为主，亦是从这里开始的。

磁峰乡西北有一小山，名皇城山。山西山北，有水泥厂和煤矿，至今仍叫“郫县水泥厂”和“郫县煤矿”(据 1984 年《彭县地名录》资料)可见这一带，确系杜宇治郫的故址。

农业发达了，就需要大片耕地，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生产和生活的需

要。于是，由杜宇率领继续南下，最后来到瞿上。

“瞿上”又在哪里？历来说法不一。近年来，庄巨川、林法仁有《“瞿上”新探》一文（载巴蜀书社《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指出“瞿上”即“樊乡”，地域在今蒙阳河下游。考以多年来从彭县蒙阳镇、竹瓦乡、新都清白乡、马家乡、广汉南兴镇（即三星堆）出土之古蜀文物，此说是很有见地的。此处只作一点补证。

樊、繁二字同音，与“范”、“汜”也同音。《山海经》有两处提到“其范林方三百里”。（《海外南经》和《海内南经》）经吕子方先生考证，“范林”就是《海内经》所说的“西南黑水间有都广之野”的成都平原，“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的天府之国。“汜”（繁）所治的，不正是这一片方圆300余里的“范林”吗？

有了这块宝地，蜀王才称帝，正式建国。也才会有三星堆所呈现的规模。

蜀族入成都平原这一支部族的建国略图，大致如此。

## 三说青铜器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很精致和各具特点。

中国青铜器的上限，原来有些模糊。自从甘肃武威的齐家文化发现红铜器，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了一批包括工具、武器、“礼器”的青铜器，可以肯定，至迟在夏代，中国已开始铸造和使用青铜器了。

据任乃强先生的意见，蜀人在蚕丛氏时已使用青铜器，迁入川西平原的蜀族，是在商代公元前十四五世纪，他们必然带走了当时已有的青铜器制造技术。而蜀人进入的白水河地区，正有丰富的铜矿，至今地处白水河边的大宝镇旁的彭县铜矿仍在开采。这种得天独厚的矿物资源，为蜀人发展青铜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据冯承源主编的《中国青铜器》介绍，二里冈文化期青铜器的合金

成分以铜为主，锡最多不超过 17.4%，铅不超过 5%，有的甚至接近纯铜，“含量甚不稳定，表明合配比的知识当在初期阶段。”而商代早期的二里冈文化期的青铜成分，则有了变化：铜的含量，最高的 91.99%，锡的含量最高为 13.64%，铅的含量最高为 24.45%。两类合金中，以铅合金为多。“二里冈青铜器壁甚薄，采用含铅量较高的青铜，铜液流动性能好，浇铸的成功率高”。

以此来比较三星堆青铜器的合金成分，根据曾中懋文章（《四川文物》，1989 年载《广汉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在这批铜器中，含锡量都较低，最高未超过 9%，而含铅量却相当高，高达 32.17%”。以此可以看出，三星堆青铜器的合金配比，与商代早期相似。而到殷墟时期，青铜器制造技术，臻于成熟，铅含量大量减少，配比也比较稳定了。这说明，三星堆青铜器继承的是商早期的技术。

再以发表的几件青铜器物图像看，二号坑出土的八鸟四牛尊，口大、颈长、折肩，上饰鸟，腹、足均饰兽面纹。与殷器相比，上部似河南郑州出土之商早期之兽面纹尊，中部与下部，又似殷墟妇好墓属商中晚期的兽面纹尊，而肩上以鸟作饰，则是此器独自的特色。以此观之，三星堆之“礼器”，也是在商早期“礼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再就是铜罍为饰口翻唇，下稍内收，有圈足。整个形态，古朴浑重。过去，罍的器形，均见于商代晚期，商早期和中期的罍，尚未发现。已发现的罍，有圆体和方体两种。仅就圆体说，有罍口短颈圆扁平底式，有罍口束颈广肩宽腹式……惟独没有三星堆出土的这种器形。且以上罍器耳饰、纹饰及上盖装饰，都很精美。与三星堆之罍，文野之分甚显。三星堆之罍，正与商早期的罍相当。

据介绍，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铸造使用的是陶范，工艺用浑铸和分铸两种，有关铸法是商代中原地区广泛使用的铸造技术。三星堆青铜器的金相分析，一般都有气孔和铸造缺陷。同时，也没有看见有关复合金属嵌铸、失蜡铸造等技术的报道。这说明，三星堆青铜器在铸造技术方面，还处于初级阶段。

三星堆青铜器中的神像、神树、神兽更具感染力。原始艺术往往为

神话和原始宗教利用，但艺术最后还是超越了这一切。

### 1. 所谓“天外来客”

《光明日报》记者曾把那尊巨大的所谓“青铜面相”，称之为“天外来客”，因为它相貌奇特。它的五官呈几何图案，近似商代早期青铜器上的兽面纹。它的眼球突出为圆柱形（最大的外延30厘米），中间还有圈状的“箍”。两只大耳朵向左右翘起，里面有简洁的纹饰。它阔鼻梁高，鼻翼呈图案状。只有嘴用三条向上的弧线组成，使之面带微笑。由于形象诡奇，成为三星堆遗址中的“大明星”。但它到底是谁的形象？在祭祀中起什么作用？似乎还没有定论。它当然不是“天外来客”，也不是普通人，因为人不可能有那副尊容。我认为他是“烛龙”，既可以说是掌管天候的神祇，也可以说是蜀族的祖先神之一。

先请看《山海经》中《大荒北经》的记载：“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谓烛龙。”《海外北经》也有相似的记载：“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在无𠯑之东。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

据蒙文通先生研究，《大荒经》部分可能是巴国的作品，它指的西北海之外，当在今松潘草原，为古蜀族聚居地。

再将这位烛龙与大铜像比较，面部是一致的，特别是“直目正乘”，很该注意。以往，我们将“直目”作“纵目”解，总要找有“慧眼”的“蚕丛氏”。（《华阳国志·蜀志》：“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甚至以为大铜像额上的方孔，就是装饰“纵目”的地方。其实，很不妥当。我们常说“他直愣愣地盯着我”，难道是眼睛竖起来了？“直目”者，言目光直射之意。铜像上的眼球突出，正是“直目正乘”的夸张。它睡了，黑夜就来临。它睁眼，天就亮了。它能把风请来，也能照亮黑暗的北方。它吹口气，冬天就来了。呼口气，夏天就到。它对人类是友善的，所以，它向着我们微笑。它的眼睛又大又圆又长，因为要观看四面八方；它的大耳朵直竖，因为要听远处的风声雷动；它也需要灵敏的鼻子，因为，它的呼

吸，关系着季节的变化……总之，这是一具司天候的神像。农耕时代的先民，太依赖它了，所以，把它铸造得如此巨大。

上古时代，管理天象的官员叫火正。《国语·郑语》说："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祝融与烛龙两音甚近，莫非烛龙是祝融的"神化"？

这祝融本是楚人的始祖，《国语·郑语》和《史记·楚世家》都有明白的记载，怎么又和蜀人拉上关系了？其实，这种关系在《山海经》中，也写得很明白。《海内经》说："赤水之子听沃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于江水。"这样看，最早懂得天象的祝融氏是居住在岷江流域。同时《大荒西经》还有"颛项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的世系记载。蜀族把他作为一位祖先来祭祀，理由就更充分了。

当然，这又发生了新的问题：古蜀人和古楚人又是什么关系？楚文化的形成，是否又受古蜀文化的影响？这些问题，虽有学者论及，但已不是"三星堆文化"的范围。

总之，这具大神头像，耐人寻味。已有人指出它是蜀族所宗的祖先神，或表现了一个神、鬼、人的集合体，有"烛龙"氏族的特征等等。但为什么要如此崇拜它，它的造型与法力对古蜀人生活生产有什么影响，以及它为什么是蜀人的祖先神……有待于我们进行认真的探讨后，才能得出符合历史的结论。

**2．所谓"人像面具"**

有不少文章说三星堆古遗址发现了不少"人像面具"，甚至把那"天外来客"也说成是"造型奇特的青铜人面具"。其实，面具是上古社会十分流行的一艺术形式。因为，戴上面具，不仅可以使自己进入面具所规定神和物的"世界"，其他人也不再把他当成他自己。现在社会，人们在化装舞会上，戴上面具活动，恐怕也是这种习俗的遗迹。但在上古人的眼里，人们戴面具，决不是"化装游戏"，而是一种十分神圣的仪礼。它是在把自己的灵魂"输入"面具所代表的那位神、人、物的灵魂。因此，面具就是特定的神、人、物灵魂的载体，是一件神物，是它自身反映的灵魂的象征。古人所以要在祭祀活动中广泛使用面具，就是为了自由地

与神灵世界交往。看来，对于神来说，肉体的形象，似乎并不是最本质的东西。

断头执璋人

在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头像，有的硕大得根本无法戴，即使与真人相似的，也不可能戴在头上。因为它的眼、嘴、鼻全是“封闭式”的，且过重。因此，我们可以肯定，那些铜人头绝不是面具，而是面具形的头像。这种形式的铜像，其他地方也发现过。如1973年，在希腊北部的阿基利，就发现过这种可以挂在圆柱上的面具形铜像（朱狄《原始文化研究》，第509页）。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头像，有椎形颈部的，都可以套在木桩上。由此设想，如果说面具可以探求到希腊戏剧起源，那么，面具式的青铜头像，则可以说是木偶戏的始祖了。

面具形青铜像的大量出土，说明古蜀人的祭祀活动，盛行面具，这是与夏族同俗的。铜像的造型，正是受了面具的启发。又因为这些铜像都是神的代表，所以，他们基本上是人的面部形象。发型、花冠也全是人化了的。

3. **礼器及其他**

比较而言，祭祀坑出土的“礼器”如尊、彝等物甚少，而且，仅有的这些“礼器”，不只都有破损，而且也无组合规律。表明古蜀人与殷人，特别是周人在祭礼上有很大的不同。殷周人使用礼器，等级制度是极其严格的。

我们知道，殷人崇尚天命。“帝佳癸其雨”（《卜辞通纂》）。周人因袭殷人，但周公提出“德”的思想后，就比殷人大大进步了。“天不可及，我道惟文王德远”（《君奭》），“天棐枕，尔时敢易法”（《大诰》）。“周人尚礼”，礼是德在政治方面的总概念，“礼不下庶人”、“礼所以别贵贱”、“礼者别贵贱序尊卑者也。”

有关资料表明，“周公营洛邑以后，尊、爵、彝器的神物，才蜕化出礼制。”因此，礼的出现和尊爵的固定化是相适应的。而祭祀用的青铜器——所谓礼器，不仅是器皿，更是统治阶级权力的象征。所以，殷代的祭器虽有铭文，都十分简单，只记祖妣。西周以后铭文就十分复杂了，内容涉及军事、政治，从刑事诉讼到王室的谋划，应有尽有，可以真实地反映当时的社会。以此来观察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皿，它就只具有敬神的意义。

## 四说“不晓文字”

《蜀王本纪》说：“蜀之先名蚕丛……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三星堆出土的文物看，“椎髻左衽”已经各种青铜人像得到证实，而祭器的无规格化，也说明在“三星堆文化”这个时代，还没有政治思想意义上的那种“礼乐”。但对“不晓文字”一说，却有异议，特别是一批精美的青铜器的发现，更觉得没有文字的民族，要创造出这种艺术品是不可思议的。

古蜀人有无文字，历史界早有了分歧。我赞成：“不晓文字说”。不过，应该有一界定。这就是在杜宇氏之前，其下限可至三星堆作为都邑的阶段。“不晓文字”，是不懂文字之义。这个“文字”，是指商代开始形成的，为华夏各族通用的古文字。

中国的古文字学专家徐中舒先生曾明确地说过，夏代没有文字，文字起源于殷代，形成于殷之后期。近年，在西安郊区的长安县斗门乡西镐河故道南岸的台地上，发现属于龙山文化晚期的原始甲骨文字，则夏代是文字的起源期。而据作家骆宾基对金文的考证，认为金文早于甲骨文，中国最早的文字产生于公元前2300年间，文字的历史就更加提前了。但是，无论如何，卜辞和铭文中，一个字有许多异体，说明直到周代，文字还是处于发展阶段。

前面说过，我们认为蜀人"误入桃源"，是在商建国不久，就是盘庚之前——文字的"起源阶段"。上古社会，任何事物发展，都十分缓慢，即使夏代有少许甲骨文字，蜀族也不一定使用。而且，他们又十分嫉恨商人。因此，当他们逃入川西平原时，更没有带来商人使用的文字。

他们来到川西时，没有带来中原的文字，那么，他们又会不会很快创造文字呢？从蜀人当时的情况看，不太可能。

我们知道，文字是语言的"书面形式"。它的产生和发展，是社会的需要。在家庭或村落里，交往手段主要是语言而不是文字。然而，范围扩大，情况就不同了，可以说，部族联盟组织越大，交往越趋复杂，文字也才变得越需要。《孟子》说："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殷代建国后，拥有"万邦"之称。这样一来，军事、政治、外交等等交往，必然频繁。没有适当的"书面语言"——文字，难以维系盟主地位和加强与各同盟者之间的关系，文字也才应运而生。所以，经典作家认为，文字是随着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

古蜀的情况则不同。进入川西平原这一支蜀族，人数本来也不多(《蜀王本纪》称："时蜀民稀少")，他们从白水河、湔山、郫，以至"范林"，所有交往，多在部族内部进行。一些依附于他们的土著，也是在他们周围。他们的地域，本来就不辽阔，加之由于猛兽横行，原始人都集中居住，在这种情况下，语言已经能够应付交往和应酬的需要，文字就还不可能出现。

这里，当然也有个问题。《华阳国志·蜀志》说杜宇时，"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湔、绵、洛为池泽，以汶

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若按此说,蜀国的版图如此之大,“遂与外人间隔”则不可能了。但据任乃强先生考证,《华阳国志》叙述的这一疆域,实际上是开明氏阶段,而不是杜宇时的。《蜀都赋》也说,到秦惠王时,蜀才有“褒、汉之地,又与秦接址矣”,“蜀人始通中国”,这时已是开明后期。这也证明《华阳国志》有误。

当然,在三星堆文化中,蜀人尚无文字最有力的证明,是在出土的器物中,没有发现文字符号。

然而,蜀国到了后期就不同了。开明九世按中原的制度改制(立宗庙、制礼乐)说明他们已接受周文化,当然就从“不晓”到“已晓”中原文字了。蜀人是说夏语的民族,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与夏互相通婚,互为君长。所以,古书上都说蜀人语言,“颇与华同”。今天四川语也属北方语系,亦是一个旁证。

语言相同,要通晓华夏诸国的通用文字,比创造一种新文字,既简便得多,也适用得多。因此,可以说,杜宇氏以前的蜀国,不仅没有文字,即使开明世以后,也没有创造出自己民族的新文字。

据载,1972 年 12 月,四川省博物馆在郫县发现的一柄春秋晚期至战国前期的铜戈上发现一组文字符号,这只说明时代已经对蜀国提出文字的需要,但它并没有形成真正的文字,就被中原文字代替了。

最后要提及的一点是:文字与艺术并不等同。没有文字,不等于创造不出精美的艺术品。要知道,古人制造各种器物,绝不是建立在单纯的审美基础上。他们制造器皿做得十分精美,是为了让主人和神满意。“熟能生巧,巧能成艺”,即使到了 20 世纪,不是还有为数不少的不识字的“艺人大师”吗? 我们绝不能用今人的审美观,来硬套原始艺术品。

蜀人创造过灿烂的文化,但由于“封闭”和“后进”,终于被代表先进的秦所灭,失掉了自己的王国。

此稿能完成,刘雨涛先生在资料方面给予许多帮助,笔者特此致谢。

(原载《成都文物》1993 年第 2 期)

# 下编

# 《山海经》断想

# 引　言

《山海经》是研究中国上古史的一部最重要的参考书。我对它虽浏览多遍，却一知半解，不甚了了。这次，因对三星堆古文化有点着迷，想从《山海经》多得些启示，才较为认真地去阅读。

《山海经》中，没有关于古蜀国的记载，这一方面说明它的成书年代，十分久远。而与此同时，我们对古蜀前期先人的活动，却可以寻觅到一些踪影。譬如"白水出蜀"一句，就能证实"蜀"的称谓是很古老的。从帝王谱系看，《山海经·海内经》说："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居若水，生韩流，韩流……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这就明确指出，后来入主中原的颛顼大帝，他的母亲，就是蜀山氏人。还有素女，这位黄帝最著名的嫔妃，也出于蜀地。明代大学者杨慎写《山海经补注》时说，"素女在青城天谷，今名玉女洞。"这既证实蜀人是一个古老的部族，也证实《山海经》至少成书于蚕丛氏之前。

然而，《山海经》对研究古蜀文化的最为重要之处，还不在于有关谱系的衔接，而是当我们对出土的古蜀文物难以名状的时候，往往可以在《山海经》中找到合理的解释。譬如那株奇特的青铜树，乍一看，茫然不知所措，而《山海经》却给我们扶桑、建木、若木等登天神树，供我们思考。而那尊巨大的纵目头像，又让我们想到《山海经》中的烛龙。当我们看到三星堆的祭器坑中存放着许多象牙，而今天的成都平原绝非大象栖息地而感到惶惑时，《山海经·中次九经》都明确告诉我们："岷山

……其兽多犀象，多夔牛，”三星堆出土了数量不少的玉石器，而成都平原似乎并非出玉的地方。那么，那些玉材又从何而来？《中次九经》也提醒我们：“岷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白珉。”事实上，岷山的雪宝顶就出产质地与和阗十分相近的玉材。“白珉”，指的是白色的像玉的石头，即白色的硅质类岩石。这种材料，岷江、沱江各河流，比比皆是。还有蛇纹石，古称墨玉或蜀玉，也产灌县、彭县一带。前年，我到宝鸡青铜博物馆，看见強伯墓出土的几只三脚青铜鸟，強伯是蜀人鱼凫之后（详见《雾中的王国》），而鸟的形制，在《山海经》中，也能找到出处。《海内北经》说，“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郭璞注云：“又有三足鸟主给使。”三星堆博物馆大厅口，有一尊人首鸟身的大塑像，是仿一株青铜神树上的一件器物放大制作的。它是《山海经·中次八经》中的山神的形象，也是北方大神禺疆，海神禺虢等的形象。看来，蜀人塑造神、人、禽、兽多与《山海经》吻合。因此，《山海经》应该是探讨三星堆文化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它在印证三星堆出土文物时，进一步显示自己的伟大价值。

但是，自古以来，学者们往往把《山海经》当成一部神话汇编来看待。可以说，如果把《山海经》中的故事取消，中国神话定然会黯淡失色。但是，如果把它作为上古历史来解读，它对人们的震动，又将超过任何神话。

从近年来的许多重大的考古发现来看，人们对自己幼年历史的理解，显得十分幼稚可笑。往往一个考古发现，就改变了传统的历史叙述。三星堆出土的文物，把古蜀国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而当人们对地球历史作了些深入研究，并印证世界上许多难以解释的现象——狮身人面像上雨水浸蚀的深沟，金字塔的建造，玛雅人对金星卫星的理解，还有什么大西洲、亚提兰提斯大陆、穆大陆、雷半利大陆、挪亚方舟之谜等等以后，就会对地球是否只产生过一次智慧生命发生质疑。詹姆士·伯烈斯特在他的新著《神秘的北纬30°》中说：“不妨作一个有趣的计算吧：假使我们把地球以及人类全部历史汇编到一年之中，这年的每一秒，都约等于地球历史的140年。那么，现存的人类的最早祖先

三星堆出土之人首鸟身像

诞生于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即第 365 天的 18 时 30 分左右。人类有文字的历史也出现在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分钟。我们轻易地发现,以英国工业革命为标志的文明距现在不过两秒……因此,我们不免要问:现存人类诞生以前的 364 天零 18 个小时内,或者说在 44.79 亿年的漫长的地质年代里,地球上的高等智能生物真是一片空白吗?"

现在,人类已经发现越来越多的难以解释现象:1959 年,中苏古生物科学队在戈壁沙漠中发现一块沙岩化石,上面有一个明显的鞋底印,这是千百万年前的波纹鞋。按传统的历史学看,当时的地球根本不可能有人类的。这种例子还很多。在两亿年前,按说只有三叶虫的化石中,却有一个近乎人类的足板印。在几千万年的木质化石中有一颗铁钉和金属片,还有非洲加蓬 20 亿年前的核反应堆。达尔文的进化论,

在这些事实面前，绝对无能为力。若是以巧合解释，理由又欠充分。但是，如果我们承认地球曾几次出现智能生物，那些奇特的发现，是他们在毁灭后所留下的残存的痕迹，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如果我们能按这个想法来思索，也许，我们可以对太阳系，对地球，对我们人类自己的理解，达到一个新的境地。

我们知道，关于人类的起源，至今还有许多疑点。但是，如果地球人类真是“太空人的后代”，好些空白，就自然弥合了。

其实，关于地球是否只有我们这一次人类生存，许多古代传说，都作了否定的答复。古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就相信，宇宙是以“大循环”的方式运动的。他们的祭司说，创世以来，宇宙已经经历了四个周期——四个太阳纪。西班牙侵入中美洲，是第五个太阳纪的开始。第一个太阳纪叫“玛特拉克特里·亚特兰”，为期 4008 年。这一纪被水毁灭，人被化为鱼类。只有一对夫妻受树的庇护或七对夫妻躲在洞中，逃过劫难，使人类重新繁衍。第二个太阳纪叫“伊厄特科尔”，为期 4010 年。这个世纪被风蛇（伊科钦特里）毁灭，人类被转化为猴子。一对男女攀沿于大石上保存了性命。第三太阳纪叫“特雷奎雅威洛”，为期 4081 年。最后为大火毁灭，人类转变成鸟类，才逃过此难。第四太阳纪叫“宗特里里克”，为期 5026 年。一场战争和大火蔓延整个世界，人类再次遭到毁灭。我们今天处于第五个太阳纪称为“动荡的年代”，其象征是太阳神托纳提乌的脸孔。它的舌头是一把用黑曜石打成的刀子，从嘴里伸出，等待子民用血和人心供养。据说，这个太阳纪，大地会移动，无数的生灵都会死亡。为了这个太阳纪能延续下去，阿兹特克人特别信奉血祭。（转引自葛瑞姆·汉卡克《上帝的指纹》）。

在希腊神话中，人类在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创造下，已经经历了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和英雄时代。现在，正处在充满罪恶的黑铁时代。人类将受到神的审判，也只有神才能拯救人类。

关于人类在地球上几次出现又几次毁灭的传说，除了印第安人外，印度人、埃及人、苏美尔人和中国人也都有相同的故事。

我国的仡佬族有一首《泡筒歌》是这样唱的：“风吹已换头朝人，二

阿兹特克人的巨石太阳历

朝又被火烧毁。眼看三朝也难保，要被洪水来淹没……”（吴秋林、靖晓莉《居都》）洪水之后的我们，已是人类的第四代。

我们把伏羲、女娲作为人祖。但他们是过去人类的再造和再生，而不是地球上第一次出现的人类。

其实，关于伏羲以前的人类，古代学者也有述说。庄子在《胠箧篇》中指出：“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按古史传说，上面所列举的帝王，都是禅通纪以后的事。这之前，还有因提纪、循蜚纪、叙命纪、连通纪、合雒纪、摄提纪、正龙纪、九头纪。相传自有人类到“获麟”（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 483 年）已有 276 万年。从黄帝开始，就到了疏仡纪，至今又是一万多年了。

难道这一切都是人们臆想出来的吗？

如果我们把神话和传说都作为一种历史的反映来观察，并把它还原为历史，这将是一件有趣和有益的事。这里最重要的，应该有两点：一是正确的解读方法；二是考古实物的佐证。可以说，19 世纪以前，人

们对盲诗人荷马所吟唱的《奥德赛》和《伊利亚特》，都认为是两部充满诗意的神话。但是，德国的百万富翁亨利·斯里曼从1870年4月，开始在希沙利克山丘进行挖掘。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不仅发现了伊利亚特古城，还发现了比八座古城早1000多年第九座古城。《杜鹃啼血》、《开明治水》，在三星堆文化未被确认以前，不也只是些动人的传说吗？两个祭器坑中的古物发掘出来后，传说中的古蜀王国，终于变成了历史现实。现在，随着科学的进步和许多重大的考古发现，人们正在破译《圣经》，想开启那扇既通往远古，更指向未来的神秘之门。对神奇怪异的《山海经》，我们难道不该从新的角度，下一番功夫吗？

怎么破译上古时代流传下来的典籍，古今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要探明它，并不容易。《孔子集语·子贡第二》引《尸子下》，讲了一则孔夫子解读神话的故事。有一次，子贡问孔子，过去，传说黄帝有四个面孔，你信吗？孔子说，黄帝启用了四位与自己意见一致的人去治理四方，他们可以不需商议就和谐一致，这就叫四面，并不是黄帝就长有四个面孔。这似乎为我们解读神话提供了一个方法。

# 《山海经》的成“书”年代

按说,《山海经》的成“书”时代,是十分清楚的。因为西汉刘秀(歆)上表时曾经明白地说:“《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质明有信。”要知道,这是给皇帝上表,是不可信口开河的。

但长期以来,很少人相信这段话。原因十分简单:夏禹时代,连文字都没有,怎么能著书立说?

2000 年 6 月 4 日晚,中央电视台在全国新闻联播中,报道了一则消息:最近在山西襄汾(临汾南。临汾古称平阳,是传说中帝尧的都邑)发现了尧舜时代的古城遗址。在遗址中,出土了许多彩陶器皿和青铜器。有一件青铜器上还发现了一个文字符号,是文化的“文”字。这样一来,就打破了殷商以前没有文字的界定。如果尧舜时代就早有文字(也许,黄帝时代真的就开始形成文字),大禹命伯盖著《山海经》当无问题。退一步说,没有文字,真就不能著书立说吗?

稍加思索,就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破绽:如果没有文字,就不能有“著作”,那么,许多“口头文学”,算不算著作?前面讲到的古希腊行吟歌手荷马,生于公元前 9 世纪。他是个盲人,当然不认识古希腊文。但却普遍地认为那两部著名的史诗是他的著作。我国彝族最著名的创世史诗《梅葛》,也是以口头流传至今的。彝家把《梅葛》视为自己的“根谱”。他们还有许多歌谣,简直就是在背诵自己的家谱。《山海经》中的

“有司幽之国。帝俊生晏龙，晏龙生司幽，司幽生思士，不妻；思女，不夫。食黍食兽。是使四鸟。”(《大荒东经》)也与之有些近似。口头流传的作品，应该也是作品。在没有文字以前，这种作品应该是很多的。就如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他们许多习俗、祭祀、礼仪，以至政治、历史，都是口头记录下来的。当后来的人用文字来记录整理时，只能署“记录整理”之名，不能以作者自居。

然而，口头流传的东西，比起文字记录，随意性要大得多。不同时代的口传者，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加进些自己时代的东西。我们后来的整理者，当然必须辨明，但决不能用它来否定原作的时代。《山海经》中出现夏启，就是这种情况。

有人以《山经》末有“禹曰”，证明这不是夏禹时代的作品，这是一种误解。《史记》一书到处都是“太史公曰”，难道能证明它不是司马迁的作品？按今天的规格看，这“禹曰”当是禹王的“批语”，《山海经》是伯益受大禹之命而著作的，当然该由大禹“批阅”。“禹曰”当是听了伯益述说后讲的一段话。从内容看，也正是如此。至于管子曾对齐桓公也说过“地之东西……”一段(《管子地数篇》)应视为他引《山海经》的话，而不是《山海经》引他的话。因为，大禹是亲身经历的。《山海经》“禹曰，天下名山，经五千三百七十山……”这个“经”字，就是“经过”、“经历”的证明。翻阅古史，我常常感觉到，古人比今人要老实得多。只是他们因为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鬼神崇拜比我们强烈，所以产生了许多神秘的想象，但拨开这些迷雾，倒比我们坦诚。

按说海经、荒经也该有“禹曰”的，不知是在流传中，还是记录在竹简上时，被遗失了。

我认为刘向刘秀认定《山海经》是夏初官家创作的“口头作品”，还有一点理由，就是现在不知位置的山名、水名和地名。我们知道，山、水、地名，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一般不会轻易更改。仅以南山经之首经为例。第一句“南山之首曰䧿山”，这䧿山到底是一座山名，还是一个山脉，学者就多有分歧。第二句“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更是众说纷纭。郭璞认为“在蜀伏山”也就是岷山；清人吕调阳认为是在雅

鲁藏布江的源头，喜马拉雅山的北面邻紧尼泊尔的狼干喀巴布山；高诱注《吕氏春秋·本味篇》说招摇山在桂阳即今之广东连县；日人小川琢治从毕沅之说，认为招摇山在广西海洋山之西北；谭其骧则定招摇山为广东连县北的方山；而徐南洲又指出招摇山是广西兴安县的苗儿山……姑无论众说谁是谁非，究其产生诸说的原因，主要由于在有文字以来的典籍中，招摇之山的明确位置，已在诸家著述中消失了的缘故。如果成“书”于周秦，为何不用春秋战国时之通名？所以那些以为是有文字后才有《山海经》之说，理由并不充分。

再以我们四川之岷江为例。《山海经·中次九经》说：“又东北三百里，曰岷山，江水出焉，东北流注于海。”不少学者认为，《山海经》的作者，有一个明显的疏忽，就是，江水的正源并不出自岷山之北，而是出自金沙江。因此，岷江不能叫江水(即长江)。产生这一疏忽的原因，是因为古人是在“汉武帝收冉駹之地置郡县，才知道江源出于湔氐道徼外”的。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山海经》谈大江，非此一处，而以《海内东经》讲得最为明白：“岷三江，首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南江出高山。高山在成都西，入海在长州南。”其中，成都和长州，虽然是周以后的地名，可能是校书人的注释误入经文，但位置是正确的。这就准确无误地告诉我们：长江之源是岷江。

《山海经》是这样，《禹贡》作为一部正式文献，又怎样说呢？

《禹贡》曰：“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意思是：从岷江开始，疏导长江。也是把岷江当成长江正源的。

我们还可以翻翻其他古书。

《荀子·子道》引孔子的话：“昔者，江出于岷山。始出也，其源可以滥觞。”我曾到岷江的源头弓杠岭考察过。在一大片柳树丛中，到处都是涓涓细流。虽不说只能浮起酒杯，但与其他小河汊相比，真的看不出有什么区别。谁料流到几百里外的都江堰时，已是巨浪滚滚的江河！

《华阳国志·蜀志》说，杜宇时，以“江、潜、绵、洛为池泽”，以地域看，这“江”当指岷江。常璩不言“岷”而只称“江”，则是把岷江当成“大江”

的。

《史记·河渠书·正义》引《括地志》云："大江亦名汶江"，也就是说，大江又名岷江（汶山即岷山）。

《汉书·地理志》于郫县云："《禹贡》江沱在西，东入大江。"大江也是岷江。

再看后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一条，也沿《禹贡》归例，说"岷山在蜀郡氐道县，大江所出。"

一直到徐霞客（弘祖）游滇归来，作《溯江纪源》，才证实："江、河南北两经流，……按其发源，河自昆仑北，江自昆仑南，其远亦同也。……发于南者，曰犁牛石，《佛经》谓之伽。南流经石门关，始东折而入丽江，为金沙江。又北曲为叙州大江，与岷江之江合。余按岷江经成都至叙，不及千里。金沙江经丽江，云南乌蒙至叙，并二千余里，舍远而宗近，岂其源独与河异乎？非也。河源屡经寻讨，故始得其远。江源从无人问津，其实……岷流入江，而未始为江源。正如渭流入河，而未始为河源也。"

自此以后，人们似乎才真正找到了长江的正源。

然而，古时真是"金沙江盘折蛮僚鸡峒间，水陆俱莫能溯，"而没人问津，才不明白吗？答案却是否定的。

古书无金沙江之名，而称其为绳水或泸水。其云南的丽江段，东晋时叫淹水。这一条发源于昆仑的大河，上古时叫什么名称呢？

先看《山海经》的记载：

"昆仑之丘，……黑水出焉。而西流于大杅。"（《西山经》）"海内昆仑之墟，……洋水、黑水出西北隅，以东，东行，又东北，南入海。"（《海内西经》）

再佐以《禹贡》：

"华阳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

"导黑水至三危，入于南海。"

以此来看，这黑水为梁州与雍州西面的界河。它发源于昆仑之墟，又"以东，东行，又东北行"，则应该是今日的金沙江。但让人难以理解

的是此水“南入海”，而金沙江则是东北行流入叙而与岷江汇而成大江的。

其实，古人以为黑水就是金沙江者，早已有之。《吕览》、《淮南子》都有六水之说，即河水、辽水、江水、淮水、黑水、赤水。明确黑水并非“江水”。今金沙江上源那林图乌木仑，于《禹贡》为雍州与梁州的界河。清人吴承志著《汉志水道图说补正》，就明确指出古黑水即金沙江。近人张国光先生有文，详论黑水即金沙江，赤水即雅砻江（见《山海经新探》），十分精到。蒙文通先生曾有“若水雅砻江”说。但“弱水”与“若水”，并非一水。“黑水、青水之间，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海内经》）此水在今汉源一带。（《水经注·若水》“若水出蜀郡牦牛徼外，东南至故关为若水也”）而“昆仑”之“弱水”是“渊环”昆仑之水。《玄中记》云：“天下之弱者，有昆仑之弱水焉，鸿毛不能起也。”此水非澜沧江莫属。

赤水即雅砻江，“赤水出（昆仑）东南隅，以行其东北，西南流注南海厌火东。”（《海内西经》）

以今天的地域看，岷江以西的大江，只有雅砻江和金沙江，符合《山海经》等古文献所指赤水和黑水的位置。疑问在于：雅砻江和金沙江都汇于长江，而赤水、黑水却南流入海，这当作何解释？

张国光先生广引近代中外地理学者的看法，解决了这一疑难。张先生说，金沙江在远古时确为纵流河川，经剑川盆地流入元江，由越南入海。其后，因地形变动，江水随折而东流，元江上源之黑水，就这样被截断。丽江西之石鼓附近，有一尖锐之袭夺湾，可以为证。

同样，赤水也是纵向流入南海的。从《山海经》看，它和黑水是平行纵向的南流河。地质变动，让黑水往东，就切断了赤水南下的通道。于是，它从今盐边和米易之间，流入了经攀枝花市的金沙江（古黑水），汇成巨大的水流，流往东北方向，在今宜宾与岷江汇合，成为今天长江的起点。结果雅砻江就变成了金沙江的支流。

我们知道，从丽江到攀枝花市，以及云南北部，是地震的多发区，地质变动活跃。1996 年丽江大地震，人们至今记忆犹新。1999 年滇北又

《御览·山海经笺疏》

发生了两次大的地震。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原来的金沙江和雅砻江是因地质变动而改道的。今云南境内的龙川江，很可能就是远古时的赤水故道，而哀牢山下的元江和越南的红河，就是过去的赤水。否则，怎么能叫红河？

至于黑水、赤水在什么时候发生这一变化，则又真的是因其在“蛮僚鸡峒间”，古史就疏于记载了。以诸葛亮的《出师表》看，“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则可肯定，金沙江在汉代（公元前200年至公元后200年）已流往长江。而《史记·正义》引《谱记》说“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巂等处”。从岷山往西昌、大理等处还比较容易。那么，这场大的江河改道，很可能发生在殷商时代。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如果能深入研究丽江地区纳西族和藏族的某些民间传说，也许能找到一些线索。

《山海经》所记，当为夏代以前的事。洪水浩瀚，淹没了田园和城市，山丘和河流也变得面目全非。当洪水消退后，《禹贡》上的地名，因具有其权威性而得到保留。《山海经》上的山名、水名、地名、国名，则因长时间的水患而变得模糊，只有名山大川还保留着自己的名字，让后代的人可以寻其踪迹。

《山海经》成“书”年代很早，还有其他方面的佐证。如赵庄愚先生发表于《山海经新探》中的《〈山海经〉与上古典籍之互证》一文。赵先生以上古最早的《尧典》有关天象之记载，“用现代天文学作其较细的考算。”对四季仲月昏星即春分星鸟，夏至星火，秋分星虚，冬至星昴的“昏中”日期作了研究。他测定战国时在该节气后 12 天至 30 天；殷及西周初期，在节气后 4 至 17 天；只有距今 4000 年前的夏初，是在节气前的 5 天至节后 8 天，即在节气之间。《尧典》中因而有“厥民析”、“厥民因”、“厥民夷”几个表示天文岁差的上古才有的名词。而这几个古词，恰恰在《大荒东经》(“东方曰折(析)”)《大荒南经》(“有神名因因乎，南方曰因乎”)《大荒西经》(“有人名曰石夷，来风曰韦”)出现，以印证《山海经》的时代。赵先生还把《山海经》和《夏小正》及《帝系》互证，说明它确实是一部上古之书，而非秦汉以后的伪作。

《山海经》中，往往窜入些夏初以后，以至春秋战国时的东西，这是可以理解的。一部口头文学，从来就有许多“版本”，叙述人还会加些自以为是的内容和评论。我们决不可以用这些有意无意的“创作”，来划定原作的年代。

# 《山海经》是一部什么书？

《山海经》历来就是一部最能引起争论的古书。且不说中国史学的开山祖师司马迁对它避而不谈。先秦学者，也常引用它的内容，却又不愿注明。而秦、汉之际的《吕氏春秋》和《淮南子》更抄袭了不少《山海经》的文字。敢说它是一部真正的古书而又整理出版的，只有刘向和刘秀父子。以后说真说伪的都有，直到近代，疑古大师顾颉刚才将它全盘否定。但现在，似乎又在为它“平反”。

可以这样比喻，《山海经》有些像《红楼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淫者见淫，德者见德，美食游乐之人也可奉为经典，寻找到自己的乐趣。但总体来说，它定是一部小说。《山海经》或曰巫觋之书、神话之书、博物之书、仪礼之书……甚至什么“百科全书”。但最根本的，它应是中国的第一部历史地理之书。

按现代科学来讲，地理学是十分复杂的一门学科。以自然地理方面来讲，从地球在宇宙、银河系、太阳系中的位置，直到经纬、日界、昼夜变化、岁差、季节、地史和地质年代、气象、生物和环境、土壤、水……以至地形、气候、物产（动、植物）、工农业、交通等，都是它研究的范围。如果再从人文地理来讲，历史古迹、神话传说、风景名胜、民间传说、风土人情，以至各地的娱乐方式，烹饪技艺等等，都是它应该关注的。通观《山海经》所叙述的，正是这些范围，我们把它当做一部历史地理专著，应该是最恰当的。

其实，刘秀上《山海经》的奏折，已把这部著作的目的说得很清楚："禹乘四载，随山刊木，走高山大川，益与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迹之所希至，及舟舆之所罕到。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以上这段文字，无论是刘氏父子有所引，还是他们自己的论述，都完全符合《山海经》的体例，也是一部历史地理著作应有的内容。

大禹治水以后，就定了九州的疆界。并根据地域的肥瘠，制定了贡赋的等级，这就是中央管辖的地域。以《山海经》的地域与《禹贡》来比较，《山海经》的范围，远比《禹贡》所指要大。但《禹贡》指出绥服之域，已是封地。要服之地，强调和平共处。而荒服之地，连进不进贡都随意了。所以，《禹贡》所指，是要收贡赋的地方。而《山海经》所包括的"东渐于海，西破于流沙，朔南暨声讫教于四海"。是国威所及的整个领域。可以想象，伯益等在创作《山海经》时，既有他们亲自考察的第一手资料，也有从封地、属国上报的地理"方志"，更有"海外"、"大荒"之地的间接资料。结果，形成了《山海经》内详外疏，近实远幻的格局。而如果肯定大禹是治水之后，立即划九州定赋税，以安定国家。那么，《山海经》"成书"，当在《禹贡》之后。

# 神　的　启　示

人们所以把《山海经》当做神话，经中有太多的神，恐怕是主要原因。

首先看山经。按经文所述，每座山都有山神，除了个别例外（也许是脱简），每次经都有对山神形象的描绘。稍加分析，又有以下几种情形：

《中次九经》的山神像（民间藏品）

一、山神是人兽合一的形象。如人面鸟身、人面马身、人面蛇身、人面象身、人身龙首、人面虎尾等等；二、山神是禽兽合一的形象。如鸟身龙首、马身龙首；三、以居住在那座山上的神为山神，如中次三经和山上的吉神泰逢（人面虎尾），青安之山的武罗（人面而豹文、小要而白齿、穿耳以鐻）等；四、以山为崇拜物。这多是最重要的高山、名山。如华山、首阳山、升山、岷山（文山）、熊山、堵山、尧山、公山等等。

羊首鸟身像（民间藏品）

以上四种，祭祀时也有差异。前三种，比较简略，一般就是毛用鸡、羊、猪等，玉用或一璋或一圭或一璧，糈以精米，白菅为席。只有西次二经的人面牛身四足一臂，操杖以行的飞兽之神，稍为隆重点。祭祀时"毛用少牢，白菅为席"。

而众山之宗的大山，祭祀时就非同一般了，比如西山首经。华山冢，其祠之礼，太牢。羭山神也，祠之用烛，斋百日以百牲，瘗用百瑜，汤其酒百樽，婴以百圭百璧。这还不够，中次五经说"首山、神也。其祠用稌，黑牺太牢之具，蘖酿、干舞、置鼓、婴用一璧。"还要用庄严隆重的执盾斧和羽龠的集体舞，伴着鼓声的节奏祀神。而中次九经的"熊山，席（帝）也，其祠：羞酒、太牢具、婴用一璧、干舞，用兵以禳。祈璆冕舞。"看，如果驱邪，就跳干舞；如果是祈福，还得穿袍戴帽，手持宝玉向山神跳舞致意。

古人的太牢（牛、羊、豕）和少牢（羊、豕）不仅数量不等，规格也很不同。《礼记·王制》篇说："天子祭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社稷皆太牢。诸侯社稷皆少牢。"

人首兽身像(民间藏品)

这虽是殷周的观念,但来由却很早。相传黄帝作合宫以祀上帝,八蜡则始于神农。古书说,舜巡狩五岳,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大概此时的祭祀,已成规矩。但通观山经,虽有祭品(毛、玉、牲、席等)但祭品的名目还不多。以玉为例,只有璋、璧、圭和加符采有吉玉。其他如瑁、瑗、琮、璜等等,不见记载。可以明白这些仪礼的内容,早于殷商,也不同于夏代后期。因为,《礼记·明堂位》对夏、商、周祭礼用的尊、爵、勺、鼓、豆等等都有明确的区别。这些规矩没有出现,也旁证了《山海经》的年代,决非什么秦汉河间之作。

再者,多数的山神都是人兽合体,也值得探讨。

世界上人兽合体的神,最著名的,恐怕要算埃及吉隆的狮身人面像了。这座在埃及第四王朝哈夫拉王金字塔前的巨大雕像,除两前爪用粗石堆砌外,整个身躯是用一块完整的巨石雕成的,高约 20 米,全长 57 米。它人头、狮身、牛尾、鹫翅,孤独地蹲在荒漠上。人们原来以为它的头部是哈夫拉王(公元前 2000 多年)肖像的理想化。但是,40 年前,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地质学家让·哈尔夫教授经过认真的研究,确认

在哈夫拉时代，埃及的气候已十分干燥，不可能在雕像上形成雨水冲刷而蚀成的“沟壑”状裂缝。人兽合体的神祇，一定是由来已久。外国传说中，“不乏其神”，中国古代神话，也比比皆是。直到今天，我们在藏传佛教的寺庙里，还能找到人兽合一的神。而在不少的民族中，他们把赖以生存的动植物，仍视为自己的兄弟姐妹。人兽合一观念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我们暂时不在这里讨论。使我们最为感兴趣的是，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和玉石器中，我们已经发现了这些神祇的雕像。其造型之奇特诡异，真让人匪夷所思。有的山神，还成了某些玉器上的纹饰。这些重大的发现，不仅证明了《山海经》作为一部口头著作的古老，也证实了三星堆青铜和玉石器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

应该说，人兽合体的形象，恐怕还不是最原始的。古人类对自然的崇拜，开始的形象可能是单一的。图腾崇拜的初期，正是这样。据说，图腾是北美印第安人奥季布瓦族方言 **totem** 的音译，它的意思是“它的亲族”。源于某些氏族视某些特定的动物植物或某种自然现象为自己的亲属而对之顶礼膜拜。

鸟首人身像(民间藏品)

然而，对复合体的崇拜，应该是前进了一步的事。图腾物已变成因子，才组成了新的神祇。而把人的形象加入兽类，更是原始宗教的又一大的进步。真正宗教的确立，人的形象占了主导地位。各种神兽神禽，变成他们的随从。《山海经》中的诸神，几乎都还没有完全的“人”的形象。确实能证明是上古时代的传说。

总的来说，神作为人兽的合体，体现的是一种最原始的宗教，这还比较容易理解。但为什么某次经的山神为“鸟身龙首”（《南山首经》），某次经的山神又是“人面蛇身”（《北次三经》）就难明究竟了。以中次九经为例，“其神皆马身而龙首”。龙首容易理解。因为，古中国的许多民族，都自认为是“龙的子孙”。所以，神也是龙首。但为什么是“马身”呢？古巴蜀地区，并非崇马的民族呀！其中之谜，还难以解开。

还应该看到，山神管辖的范围相当有限。有的管着一个山系，有的则只管着一个山头，如和山之神泰逢、敖岸山之神熏池等，这该是氏族时代初期的特征。“没有统一的君王，决不会出现统一的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77 卷《恩格斯致马克思》）。可以说，黄帝以来，虽然已有部族联盟的盟主，但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君王”。

《山经》中的山神，若以山系算，共 70 位，若以山头算，超过 400，数目真多！

《海经》和《荒经》，神祇也不少。首先有四方之神蓐收、禺疆、句芒、祝融。他们虽然是人面兽身或鸟身，却已乘龙践蛇，渐离动物世界。而海内海外，则有二八、羿、凿牙、夏后启、刑天、烛阴、相柳、夸父、欧丝女、奢比之尸、天吴、孟涂、贰负之臣、贰臣、冰夷、王子夜之尸、登比氏、宵明、烛光、雷神共 20 位。而《荒经》及《海内经》又有犁灵之尸、禺猇、应龙、不胡胡余、因因乎、羲和、常羲、女娲之肠、弇兹、嘘、夏耕之尸、吴回、疆良、女魃、相高、素女、延维、相顾之尸，烛龙及昆仑众神，加起来也超过 20 位。

除此之外，还有大神天帝、白帝少昊、太皞伏羲、女娲、帝俊、黄帝、颛顼、共工。以及似有神力而不算“神”的舜、喾等等。

海经和荒经的神，乘龙、践蛇、操蛇、衔蛇、使鸟使兽，其神力大大超

过山神。他们的形成时间，应晚于山神。因此，当为氏族社会已经建立而诞生的神祇。

# 《山海经》中的动物

山经中的动植物种类繁多。但因与今天相比，变化很大，人们就以为是“道听途说”，是一种姑妄言之的东西，也因此怀疑它的真实性和科学性。也正因为如此，三星堆出土了象牙，虽然不少古书都有岷山多犀象的说法，仍觉得不可能。于是，才有那“热带丛林文化的赠礼”的说法。山经中关于名山名水的动植物，我没有知识，也没有精力作详细的考证，但我们可以用“解剖麻雀”的方法，通过对一个山系的研究，来看看究竟。

我们不妨以古巴蜀的范围为例，来作粗略的探讨。

古巴蜀的地域，至今已很难明确界定。但金沙江以东，神农架以西、岷山、龙门山、大巴山以南，云南大理及贵州赤水以北之内，即北纬26°至32°，东经99°至110°，它大体不会错的。这主要就是中次九经的范围。

我们把中次九经中的动物，作了一个统计，兽有虎、豹、良龟、鼍、犀、象、麋、麈、怪蛇、鸷鱼、夔、麢(羚)、㚟、兕、牠狼、猿蜼、熊、罴。鸟有翰、鷩、窃脂、白鷮、鸩共23种，以上应是比较珍贵和奇特的。因为没有包括最为常见的猪、牛、羊、马、犬、鸡、鸭、凫等鸟兽。但仅就上面23种，在三星堆出土的玉器和铜、金器中，肯定有虎、豹、龟、鼍、犀、象、鹿、麈、蛇、兕、狼、鱼、翰和还对不上号的动物。所以也可以讲，山经所说的，大都言之有物。而出土的东西只会越来越多，最后将印证《山海经》

玉象(民间藏品)

玉虎(民间藏品)

是一部严谨的历史地理作品。而一旦我们真正相信了它，并按照它提供的线索进行考察。也许，中国的远古历史，将会有巨大的突破。

玉牛(民间藏品)

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那个时代的人，常把动物当成占验的对象。据吕子方先生统计，可用来占验的兽、鸟、鱼、蛇、虫的动物，就有55种(见《读〈山海经〉杂记》)，如《南次二经》“有兽焉，其状如禺而四耳，其名长右，其音如吟，见则郡县大水。”又如《中次九经》“有兽焉，其状如狐，而白尾长耳，名𤝵狼，见则国内有兵……”。

我们知道，中国的占验术，有很长的发展史。古人用骨占验，发现得最早的是仰韶文化晚期河南淅川下王冈遗址，其次是龙山文化山东龙山城子岩遗址。到了殷代，占卜的卜辞，已包括了十分重要的社会史和认识史的资料。今天，我们对殷代的了解，很多都来源于卜辞。而到了周代，还在卜占的基础上，发展出《周易》这样的高级的思想体系。

然而，古人最早的占验对象，还不是卜骨，而是根据某些自然现象

和某些稀有动植物出现来占验祸福吉凶。而这种遗俗，直到今天，还留存在人们的心中。“喜鹊叫，贵客到”，“白颈乌鸦啼，不死也要脱层皮”仍是我们生活中的“征兆”。

仔细想来，把某些动物出现，作为占验对象，既有对自然规律不理解的一方面，但也确实包含着某些合理的联系。譬如说，自然界出现某些反常现象前，往往会被某些动物感知。而此时，人类还毫不察觉。洪水、地震前的蚂蚁搬家，群蛇出洞，众蛙鼓噪……我们今天对这种现象已有科学的解释，而古人则把结果当成了原因。

虽然如此，人们正是从对动物及自然现象的占验开始，发展了以占验、骨卜、八卦为核心的预测学，成为一个迷信与科学交织纠缠的领域，让今天的人也常常无所适从。

我们也发现，在《山海经》中，作为占卜的对象，多是些奇禽异兽，今人对它们已一无所知。据吕子方先生的研究，绝迹、异名，兼而有之。但后世以动物作为占验对象的文献，仍屡有所见。“雌鸡作雄鸣者，女主乱政”(《地镜》)，“主忧下愁，阴道逆，则牛哭于田”(《运斗枢》)。以至“河水清，圣水出”，都是用的同一道理。

《山海经》多处提到龙凤，我们也应该对龙凤文化做些简略的讨论。

《山海经》中，虽然龙蛇并说，而且有凤、有凰、有鸾鸟、有青鸟，但龙、凤的形象已经形成。

以今日主流学派的观点，龙凤的起源，都不是现实世界的动物，是在若干动物族类的基础上，经过图腾崇拜的阶段，逐渐综合加工而成。龙有鳄龙类、蛇龙类、蜥蜴龙类、闪龙类，以及豕龙、夔龙、马龙、火龙等等。凤有鸡凤类、鸷凤类、燕凤类、鸾凤类，以及鹄凤、鸳鸯凤等等。

可以看出，龙凤在其自己的主要特征的基础上，各民族都根据自己需求，对它们的形状作了某些改变。如三星堆出土的龙首柱形器。角似羊角，须为山羊胡，可名之羊龙。这和羌人的图腾崇拜有关。因为，羌即牧羊人之谓。从这里，也可以旁证蜀人是羌人中的一支。

龙凤的许多类别，说明我们中国人本是一个祖先，但又因地域，生存环境，生活方式及习俗的渐渐不同而形成了龙凤的许多变异。但作

玉绵羊(民间藏品)

为鸟、兽的主体形象,古今依然。

但是,这龙凤的形象,到底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却是一个谜。

我们知道,中国的古氏族,多与“龙”有关。从最早的伏羲、女娲为人面蛇(尤)身,到炎帝(《帝王世纪》“有蟜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轩辕(《山海经》“轩辕之国,人面蛇身,尾交首上”)黄帝(《竹书纪年》黄帝为龙颜),以至祝融、共工、尧、舜、禹、夏、蜀、越、吴、闽、巴、匈奴、邛都夷、滇、苗、丹……都与龙的形象有关。那么,龙的形象,该是什么时候就形成的?如果伏羲、女娲、轩辕、神农就已经以龙为崇拜物。那么,它岂不是与人类俱来的吗?

应该说,龙基本的形象应该是单一的。人类的繁衍,让龙的形象多元化。而民族的融合与统一,又使龙的形象逐渐定型。我们今日所见的青龙,就是它的“标准像”,但与最初的模样,很可能已经相距甚远。

还应该看到,不仅中国有龙凤,外国也有龙凤的传说。在西方,龙代表邪恶,它有鳞,尾巴又长又光,能吐火。在东方,朝鲜、日本都把龙

玉蛇(民间藏品)

玉马(民间藏品)

三星堆之青铜凤鸟

当做圣物……希腊诗人赫西俄德在公元8世纪写道，凤凰的寿命是乌鸦的九倍。有人说，凤凰可以活97200年，而“凤凰涅槃”之说，也中外皆然。

如果古今中外，都有龙凤的传说，那么，人类是否真的只有一个祖先？

还有，如果是“群龙”并立而产生龙的形象的多元化。那么，最初的龙的形象又到底是什么样子？这原始形态龙凤，到底有没有？

窃以为，最古的人类，思维比较简单，很难无中生有。一定有他们称为“龙”、“凤”的禽兽存在，并为他们所崇拜，才能在传说中留存下来，并发展成后世的神兽仙禽。《左传》说，有个叫董父的人，爱龙和畜龙，以此服事舜，氏曰豢龙氏。《竹书纪年·帝尧陶唐氏》也有“七年有麟……七十年景星出翼，凤凰在庭”的记载。因此，我们真的有必要弄清最原始的龙凤，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蛰居小城，虽身处信息时代，却仍十分孤陋寡闻。偶然在一小书肆，购得何新先生的《危机与反思》，发现他对龙凤的看法，也与我有相近的观点。他在《巨谜的揭破》一编，对中国神龙之谜，凤凰崇拜的起源，有精彩的论述，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看看。至于龙是不是海湾鳄演化而来，凤凰的原型是否就是大鸵鸟，还值得继续考察。因为，据说，美国科学家在南极发现了两亿年前的人形化石，经鉴定是一种食肉恐

龙，非洲扎伊尔的原始森林中发现了脊椎骨突出体外十几厘米的“恐龙人”部落。我怀疑人真是由一种近似“恐龙”的生物进化而来的。而五彩的风凰也该是一种真实的存在。

# 《山经》中的金属

中国人什么时候开始使用金属，历来颇多争论。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过质地不同的黄铜片。山东胶县三星河龙山文化遗址，发现过铜锌合金的铜锥。这该是公元前四五千年的事。使用的也许是自然铜。但到了夏代，青铜一定很发达了，不然，大禹又怎么能铸造九鼎。也许，在夏代时，铜矿已经成了国家的最为重要的资源，得到高度重视。所以，在《山经》经束时，大禹要特别指出："天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出水之山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地之所分壤树谷也，戈矛之所发也，刀铩之所起也。"

这里，引人注意的是对"出铁之山"这句话的理解。"出铁"与"藏铁"不同。夏代如果就有 3690 处在开铁矿，不俨然到了铁器时代吗？

许多学者早已肯定，中国的铁器时代，西周以后才进入发展期，夏代就大开铁矿，是附会之说。因此，以上的禹曰，乃管子的话（见《地数篇》）。这种看法，可以肯定吗？

如果《山海经》中，除此之外，没有铁的记载，倒还有些道理。但仅就山经来看，有关金属的记录就不少。粗略地作一统计，有金、银、铜、铁、锡及其他矿物如垩、矾土、磁石及雄黄等等。其中黄金 27 处，赤金 9 处，白金 7 处，铜 18 处，赤铜 9 处，黄铜 1 处，铁 31 处，碧铁 1 处，银 8 处，赤银 1 处，锡 1 处，赤锡 3 处，白锡 1 处。单指金（包括少数金玉、金

石)最多共99处。因黄金等已单独列出,此“金”当为金属的统称,可能包括铅、锌、铝、镁等等。有了铅、锌等,才可能有不同配方的青铜器出现。《山经》中有多处出铁而少见铁器实物和铁的记载,可能因为所炼之铁因温度原因只能是生铁。生铁最易在空气中和土壤里因氧化锈烂,而留的实物不多。同时,因缺乏光泽和柔韧性,除了农具,多不使用。如《孟子·滕文公》:“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一直到了许多年后,有了铁合金,铁才得到比较多的应用。后来铁的含铁量越来越少,直至“百炼成钢”,才得到广泛的使用(刀器、钟、鼎等)。

所以,可以肯定,夏代不仅已普遍使用青铜器,对其他金属也有较多的认识。

# 作　者　解　疑

谭其骧先生在《〈五藏山经〉地域范围提要》中结论地说："肯定顾颉刚的《山经》作者为河汉间人说，否定蒙文通、袁珂的《山经》系楚人作品说。"而我却以为《山经》是一部官方文献，并非个人"作品"。

顾、蒙、袁、谭都是我十分敬重的先辈与长辈。他们对《山海经》的研究，功绩丰伟，应名彪史册，我辈后学得益匪浅，但这方面的意见，却又不敢苟同。

有说《山海经》是信仰佛教的印度人著的。根据是"藏"、"经"二字和"文"中热带和亚热带的动植物较多。其实，"经"字不足为凭。因为，中国的五经，命名也不晚。藏字是包含蕴积之意，诗云："心中藏之，何日忘之？"《山海经》所以名为《五藏山经》，是指夏朝的东南西北中的领土内，包含有多少山河的意思。经乃经典之义，是指此乃权威性的著作。说成佛家的经律藏，大有附会之嫌。因为，佛教教主释迦牟尼生于公元前565年（或624年）大约与孔子同时，卒于公元前485年（或544年）。他在这年逝世后，众多比丘在王舍城共同忆诵确定佛教经典时，才有经、律两藏。经律论三藏乃另行集会："复集经、律、论、杂，咒"五藏之主。而佛教传入中国，已是汉代的事。说《山海经》中有与印度婆罗门教图像相同的怪神，因而认定《山海经》为印度人的著作，依据就更不充分了。以羊面人身、牛面人身为例，埃及神话有，罗马神话有，中国神话也有，这是人类对远古生活的一种共同记忆，是一种共生观象。至于

以热带和亚热带动植物来与现代中国的实际相比，而认为《山海经》说的山川在印度，就更不值得再讨论了。

蒙文通老师《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一文，是解读《山海经》的重要文献。它分析精辟独到，是我经常必读之书。但蒙老师有论"《山海经》所记的地理范围很广……但这块方圆不过几百里岷江上游地区竟记载了八水十六山，相对来说，应该是很详细了。根据古人著书详近略远的惯例（特别是地理知识的记载是如此），则《五藏山经》不仅是以巴、蜀荆楚为'天下之中'，当属南方文化系统，而且详记岷江中、上游，更可能属于西南地区的古巴、蜀文化了。"

这一推论，可能有疏误。

查中次九经所记十六山，各山之间的距离，最短者为一百四十里，最长者为五百里，这在各经各次中，并不是很详细的。仅以《中山经》为例，首经从甘枣之山开始，其最短距离为十五里，其余十一山在七十里以内。只有一山为百二十里，一山为四百里，比中次九经详细多了。而中次三经的各山之间，最短距离为十里，最长距离为四十里，五山之间，一共才八十里，可谓更详细了。然则《山海经》作者为河南孟津一带的中原人？还有中次四经、六经、七经、十经、十一经、十二经，可以说山距都比九经短。

按山经说，中次九经，十六山共三千五百里（其实为三千六百五十里），而中次十经有山四十八座，总距离才三千七百三十二里（实为四千二进二十里）。

其余各经，也有山距短于中次九经的，如《西山首经》山共十九座，距离为二千九百八十七里（实为三千一百一十七里），《北山首经》二十五山，五千四百九十里（实为五千六百八十里），《东次四经》，凡八山，一千七百二十里。

其实，观看今天的地图，对富裕繁华之处，都有详图。如四川，就有成渝地区图。河北，则有京津地区图。以至沪宁杭地区，珠江三角洲……这是地理书的惯例，并沿袭至今。仔细观察，《山经》中，只要是较为详细的，都是当时经济政治的重要地区，而与作者似乎没有多大关

系。以此推定作者，并不十分可靠。关于“天地之中”，《山海经》有数处提及并指明都广之野即今日之成都平原，为“天地之中”。是夏代疆域的确切位置，还是表明作者的住地？也很值得探讨。

假如古代人知道地球是圆的，宇宙是无边无际的。那么，地球上任何一点，都可以叫“天地之中”。《山海经》讲都广是“天地之中”，显然不是这个意思。

对古代的天文学，我一窍不通，但地域与天上的星体有对应关系，我是知道的。是不是“天地之中”，首先要确定的是都广在地上的位置。

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夏代的地域，若以《禹贡》考察，显然比《山海经》小些，但以《山海经》来研究，夏代势力所及，东起今浙东舟山群岛，即东经 122°，西至新疆塔里木河，即东经 82°，北达阴山以北，约北纬 43°，南至海南岛，即北纬 19°。而成都平原在北纬 30°，东经 104°左右，正是北纬和东经的交汇处，当然也就是“天地之中”了。古人对今人使用的经纬度，应该说是不会知道的。但他们竟能准确地把“都广之野”定为“天下之中”，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山经》是“资格”的自然地理书。

# 《海经》释名

《山经》主要讲的是自然地理，而《海经》(包括海内外各编)则讲的是人文地理。

山的对应词，本应是“水”，但作者不以“水”命名而称之为“海”，并有海内海外之分，一定是有原因的。

按古史记载，在尧末舜初，中国曾发生过一场持久而巨大的洪水灾害。若以时间推算，按《史记》所叙，尧70而得舜，此时，鲧已9岁治水不成。那以，应该在尧60岁时，就“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了。后来，他摄政28年而崩。三年后，舜让，辟朱丹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舜才正式即位。舜“代尧践帝位。践帝位39年，南巡崩于苍梧。”

以此来看，大禹治水，当然是在舜时完成的。《五帝本纪》说“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荐禹于天。十七年而崩。”也就是舜即位22年，就让禹摄行天子事了。《夏本纪》说：“尧崩，舜问四狱曰：‘有能成美尧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为司空，可成美尧之功，’”看来，帝尧平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把洪水治好。而舜即位的首要任务，就是治理洪水。禹以全国的人力物力，在舜和众诸侯百姓的支持下，才真正消灭了水患，重新定了九州的位置和贡税的多寡。那么，这场洪水危害中国的时间，至少有64年！

洪水如此巨大而漫长，当时的情景又如何呢？我们当然无法看见，孟子却描述过当时的情形：“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

天下，草林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虽欲耕，得乎?”那时，“民人失据，启陬于丘陵，巢于树木。”一切生产都被破坏了。

上古时代，怎么会产生如此巨大的洪水，历史气象学自有说明。由于中国的所有大河都被堵塞。因此，除了冰河期结束带来的水患外，一定还有强烈的地震，使九河不畅。其结果，必然是使中国的内陆，变成了一个大的内海。人们生活在岛屿般的高山上，过着贫困而充满恐怖的生活，是高山拯救了人类。所以，中国人特别崇拜山岳。

几十年的内海，让人们改变了华夏大陆的称谓，竟把它叫成了“海内”，而这个“内海”之外，也就叫“海外”了。

洪水淹没了一切，当然也埋葬了一切，改变了一切。泥沙、山石将黄帝至尧以来的许多文化遗迹埋藏在深深的“海底”，并渐渐地化为乌有。什么城邑、村落、玉石铜器，都不可能再见天日。于是，我们一直就把黄帝以来的事，当成了神话。

但某些高山上，仍留下了古民的遗迹。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西藏、内蒙古、云南、广西等地发现的岩画，它们幸运地没有被水浸泡，我们有可能解读它。但是，它们与当时的五帝时代的中原，要落后得多。我们应该相信古文献的记载，不能一味认为是异想天开。

现在，有人在寻找大西洲、穆大陆等沉入海底的文明。似乎已有新的发现。海洋的水，毕竟比内海要纯净得多。但依靠科学的进步，当我们变得更聪明时，也许我们仍会发现三皇五帝以来的真正面貌。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洪水泛滥时，中华大地，虽然是一片汪洋，但毕竟像个内海，它与今天的太平洋并没有完全连结起来。因此，由于气候、时令，以及水量的多寡不同，海内和海外的界限，也会常常发生变化，不可能像山经那么固定。所以，其地域概念比较含糊，多数只是指其方位。

一切都被泥沙、山石和洪水埋葬了。所以，除了鸟兽、国名，以及先王的轶事，我们很少看到有关城邑、宫室等人文景观的记载。因此，我们的话题，有只能就其要者来加以讨论。

# 海　外　诸　事

《山海经》有海外经四篇，说的都是“海外”之事。似乎可以作这样一个划分：海内各经，是大禹治水时到过的地方。而海外四经，就可能没有亲自考察，只是听到或“见到”某些记录和传说。因此，“一曰”、“一曰”才特别多。但虽是道听途说，也不全是妄语。我们仅以《海外南经》开始一节为例。经文说“结匈国在其西南，其为人结匈。”此经是“自西南陬，至东南陬者”，所以，我们的目光，首先要投向祖国的西南部。

结匈国，就是这个国家的人，胸前都有个大的肉结，用现代语来讲，国民多患有甲状腺肿大的疾病。

50年代初，我曾到原西康省的会理、盐源一带。每逢集期，山民们来县城买卖货物，几乎遍街均是“结胸者”。小的似大紫茄，大的像小冬瓜。询问本地干部，山民世代缺碘，一村一寨，多是这种“大脖子”。稍细观察，城里的甲状腺肿大者，也不乏其人，这正应了《海外南经》的位置。

又如羽民国。《山海经》多处提到，说黑水从其旁经过，这应该是金沙江最早出海的河道。它穿过大理，汇于澜沧江，经西双版纳入湄公河经老挝、泰国、柬埔寨，从越南南端入海。滇南的这一带，盛产孔雀，羽毛绚丽多彩。人们喜以孔雀羽毛装饰自己，所以称为羽民。至于说“其人长头，身生羽”，还有说“其状鸟喙赤目而白首”，也可能是因为以彩羽炫耀自己的民族，所以舞蹈时要化装成孔雀模样。

至于羽人，是道家崇敬的仙人，又另当别说了。

讙头国，也很有来历，关于它，有两个传说。一是《大荒南经》："大荒之中，有人名曰讙头。鲧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讙头。"一是《大荒北经》："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颛顼生讙头，讙头生苗民。"若依前说，这讙头，当是大禹的侄辈。若依后说，则讙头当为大禹的曾父辈。这传说就都不可靠了。按本经说，讙头国的人"人面有翼，鸟喙方捕鱼。"而《大荒南经》则补充这讙头国的人"方捕鱼于海"，"食海中鱼，杖翼于海。"则这个讙头国的人，并非迁在三危的三苗先人（因三苗在荆楚）。它的模样，倒使我想到企鹅等海禽。如果是人，他们或许是经常带着划船的双桨，人们把《山海图》中的桨当成羽翼了。因此，他们至少应是南海边的民族。

还有厌火国，经文说"兽身黑色，火出其口中。"这大约已是海中的岛上群居物了。因为，只有厌火国，作者没有说"其为人"。而据说过去的山海图，画的就是黑色的猕猴。不过，也可能岛上居住的是热带的土人，他们被灼热的阳光曝晒，又经常沐于海水里，肤色一定是黑的。加之经常攀援，手足并用，所以，远处望去，以为是兽类了。至于是口中能吐火，还是因为岛上的火种太宝贵，又要捕猎食物，常把火种含在嘴上而误以为能吐火，这就不得而知了。

如果我们这样解读经文，也许就不那么神秘了。

# 关于轩辕国

《山海经》一共说了105个国家。这时的国家，可能就是些部落，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其特异之处，也许是他们的图腾像，但也并不排除其体征上的特异，需要我们仔细解读。但有的却应引起我们特殊的关注，首先就是轩辕国。

《海外西经》说轩国的地域，在“穹山之际”、“女子国北”。《大荒西经》进一步指出：“轩辕之国，江山之南”。如果“穹山”是“没有山”之义，而“江山”即“大江之山”，那么，这“轩辕国”，就只能指今日之成都平原——即《山海经》所说的“都广之野”。

轩辕，是一个有高度文明的古国，按《太古帝王表》，轩辕氏是在禅通纪，早于伏羲氏和女娲氏。当然就更早于疏仡纪的黄帝。因此，很可能是在伏羲、女娲再造人类之前。《大荒西经》说：“有轩辕之国，栖为吉，不寿者八百岁。”也就是说，居住在这个国家的人，是吉祥如意的，他们至少也要活800岁。如果没有先进的科学和医药保障，怎么可能？要知道，直到今天，我国的平均年龄，才刚达70岁。

轩辕古国，不知是什么时候消失的。但《山海经》却又明白地说“其为人，人面蛇身，尾交其上，”令人费解。但仔细一想，这“人面蛇身”、“人面鸟身”等等，可能都是口传者对《山海经》上的图画的解读。因此，所谓“蛇身”，也许是“身材窈窕”之谓，这也符合“瘦者长寿”的说法。而“尾交首上”，则可能是将簪钗之饰，误为蛇尾。

《山海经》还说,“轩辕之丘,在轩辕国北,其丘方,四蛇相绕。”《水经注·渭水》云:“渭水又东南合泾谷水……又西北,轩辕谷水注之,水出南山轩辕溪。南安姚瞻以为黄帝生于天水,在上都城东七十里轩辕谷。”上都在陇西郡,而陇西正位于成都平原的北面。

有的古书,常把轩辕国和黄帝混为一谈,以为黄帝即轩辕氏,但《山海经》及《绝越书》等,都以为轩辕早于黄帝许多年。细读《史记》:“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但为何以轩辕为名,未作解释,如果他是有熊国君之子,应在河南新郑一带。但许多史书都说他生于天水。皇甫谧注《史记》说:“黄帝生于寿丘,长于姬水,因以为姓。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所以,他应该是轩辕人的后代。

因为黄帝具有轩辕人的血统,所以,他特别聪明。不仅战败了炎帝。统一了中国,还建立了必要的规章制度和祭祀的礼仪。炼首阳之铜铸鼎,并对音乐、医学等都很有研究。《拾遗记》说他“考定历纪,始造书契,服冕垂衣……置四史以主图籍,使九行之士以统万国。”自己在位100年,最后还乘龙登天,俨如外星人了。

黄帝既名为轩辕氏,至少,他与这个古国是有渊源关系的。所以,他娶西陵女嫘祖为后,纳青城的素女为妃,把两个儿子都下在轩辕古国的境地内(即青阳降之江水,昌意降之若水),还纳蜀山氏女为自己的儿媳……都为了吸取古轩辕国的文化遗产。

以此观之,四川的文化底蕴,应该是非常深厚的!

# 重 要 神 祇

《山海经》中，一山一水，一方一地都有独立的神祇，这是原始宗教的特点之一。而四方之神，该是一方的大神了。

西方之神叫蓐收。《左传》、《国语》都说蓐收本是少昊的儿子。白帝少昊，本来就是西方大帝。《西次三经》说："长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长留山就是白帝的宫室。再往西一千八百里，即天山之西二百九十里的泑山，蓐收就住在这里。"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气员，神红光之所司也。"(《西次三经》)

至于他的形象，《海外西经》说："左耳有蛇，乘两龙。"而《山海经图赞》对他的描绘则是："蓐收金神，白毛虎爪，珥蛇执钺"这两者是可以结合的。据说，他还是天之刑神(见《国语·晋语二》"舟之侨其族"章)。《楚辞·大招》有云："魂乎无西，西方流沙。漭洋洋只，豕首纵目，被发鬤只。长爪踞牙，诶笑狂只。"王逸注："此盖蓐收之状也。"那么，楚国的壁画，又与《山海经》略为不同，但此神的"纵目"，也可给我们提供想象空间。

西方主金，所以，蓐收又是金神。

南方的大神叫祝融。《海内经》说："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以此看，他是炎帝的后裔。然而，《大荒西经》又说，"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则祝融又为黄帝之裔。考其缘由。《海内经》有："韩流擢首谨耳，……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蜀人姜姓，若以母系讲，颛顼为炎帝裔，若以父系讲，颛顼则可以

说为黄帝裔。

《海内经》有“祝融降处江水，生共工。”他应在南方活动。所以，《淮南子·时则训》说：“南方之极，自北户孙之外，贯颛顼之国，南至委火炎风之野，赤帝（炎帝）、祝融之所司者万二千里。”

他的形象，“兽身人面，乘两龙。”

北方之神叫禺疆，他是海神禺猇的儿子。是黄帝的后裔（《大荒东经》郭璞注经时说他“字玄冥，水神也。”《淮南子·时则训》说：“北方之极，自九泽夏晦之极，北至令正之谷，有冻寒积冰，雪雹霜霰，漂润群水之野，颛顼、玄冥之所司万二千里。”

他的形象，一说“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一说“黑身，手足乘两龙。”袁珂先生以为“黑身”为“鱼身”之讹。作为水神，也有些道理。《列子·汤问篇》说：“五山之根，无所连箸，常随潮波上下往还，不得暂峙焉。仙圣毒之，诉之于帝。帝恐流于西极，失群圣之居，乃命禺疆使巨鳌十五举首而载之。”所以，也可以改乘龙为驱鳌。

东方之神叫句芒。“木神也，方面素服”（高诱注），一说是太皞的儿子（《吕氏春秋·孟春》），一说是太皞的叔父（《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而《世本·作篇》则有“句芒作罗”的记载。宋衷注说他是伏羲的臣子，那就更古老了。《尚书大传》说：“东方之极，自碣石，东至日出榑木之野，帝太皞神句芒司之。”与《淮南子·时则训》相同。

他的形象，“鸟身人面乘两龙”，但《墨子·明鬼篇》却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昔者，郑穆公当昼日中处乎庙，有神人入门而左，鸟身素服三绝，面状正方。郑穆公见之，乃恐惧奔，神曰无惧，帝享女明德，使予锡女寿十年有九，使国家蕃昌，子孙茂，毋失郑。穆公再拜稽首：‘敢问神明？’曰：‘予为句芒。’”这也可算是一种形象。

《山海经》中的神祇很多，除了伏羲、女娲、帝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等大神外，还有七八十位。总体来说，他们的形象多为人兽合一或人禽合一。人们说，这反映出远古人的图腾崇拜。但近来也有人认为，这是五万年前，高级的智慧生命来到地球时，用各种飞禽走兽来造人而留下的朦胧记忆。人类起源，十分奥妙，姑备一说，供人们思考。我们

除了记述四方之神,还可以挑选几位神祇来作些探讨,以求得到一点启示。

刑天,《海外西经》说:“形(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为舞。”

刑天,本是炎帝神农的属臣。《路史》说神农曾“命刑天作扶犁之乐,制丰年之咏,以荐厘来,是曰《下谋》。”看来,他应是位“文士”。阪泉、涿鹿之战以后,黄帝代炎帝为“天子”。但西南方有些地区,仍不服黄帝管辖,以刑天为首的,就是其中之一。所以,黄帝来征。操干戚以舞(武),就是刑天被杀后,他的族人仍旧顽强地抵抗黄帝。陶潜的诗:“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就是指他的精神,支持着族人继续战斗。

古史对炎帝的出生地,说法并不一致。一说他生于蒙谷,即今宝鸡市北,那里有神农乡和炎帝陵。一说炎帝生于今湖北随州市北之厉山,所以又号厉(烈)山氏。若以炎帝为南方之帝,那么,荆楚为据,以长江是其领地。而黄帝生于天水。所以,渭水流域和汉水流域,应是两大族斗争和融合的场所。刑天和黄帝的战争,是炎黄之争的余绪。这就是《史记》所说“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坡山通道,未尝宁居”的内容。而战胜刑天,应是最为惊心动魄的战斗。

刑天,是失败的英雄。

《史记·五帝本纪》从黄帝开始。炎帝之事,记述甚略,寥寥几句,难明究竟。《山海经》中,关于炎帝和帝俊之事,则多有记录。我以为炎帝帝俊,实为一帝,此观点将详论于后。这里要说的是,据《尸子》说:“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当是一个很大而且势力很强的部族,我们自称“炎黄子孙”,而对炎帝的事,却又甚为渺茫,真是十分遗憾。《山海经》等古书,多少填补了些空白。从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在远古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炎帝统治的长江流域,似乎比黄河流域要繁荣富庶得多。黄帝以后,形势才发生变化。中原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而长江以南,沦为“蛮夷之地”,究其缘由,应该很有意义。

烛龙。《海外北经》说他是钟山之神,名叫烛阴。而《大荒北经》又说他是章尾山之神,名叫烛龙。考据家们说,钟山、章尾山是同一山。

而烛阴之名,是因为它"照九阴之幽明"。论其形"身长千里"。所以,烛龙之名,更为贴切。

钟山,就是今日的阴山山脉。这位烛龙神,"居钟山下"。那么,他居住最高位置,不会超过北纬 42°。其"蛇身,赤色"是他的灵光所现。其实,也是阴山山脉的象征。

有人说,古人心中产生这位神祇,是把白极光神化的结果。仔细一想,又觉困惑。阴山位于内蒙古中部,在北纬 42° - 40°之间,最低点与北京相同,最高点与沈阳一致。这里,离 66.34°的北极圈,还有很远的距离,是不可能经常看见北极光的。《山海经》对烛龙的描述:"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吹为冬,呼为夏,……息为风。"等,也不像是北极光。因为,北极光的出现,是夏至以后,太阳直射的结果。这一点,古人也会看明白的。他应该是司天候的大神。所以,郭璞赞曰:"天缺西北,龙衔火精。气不寒暑,眼作昏明,身长千里,可谓至灵。"

要知道,在北极圈内的最南缘苔原地带,最热月的气温均温仅大于 0℃,低于 10 - 12℃。而在极圈外的冰原,最热月的均温都在 0℃ 以下。这在中原人的眼里,绝对不是夏天。

阴山,在中国古人心目中,是横亘于北面的一座大山脉。山外,就是《海外西经》所说的大泽和所谓九阴的幽明之地。所以,这司天候的神祇,不仅对中原人至关重要。那九阴之地,也靠他的余光,得识天地。

夸父,也是炎帝的后裔。因为《大荒北经》说:"后土生信,信生夸父"而后土又为炎帝所生(见《海内经》)。他最重要的事迹《大荒北经》和《海外北经》大致相同。说他自不量力,欲与日逐走,当他快追到太阳的时候,却渴得要命,就去饮黄河和渭河的水,两河喝干,仍不解渴,就准备北上饮大泽的水。可惜他没有走到,就干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所以,《中次六经》有"夸父之山,北有桃林焉。"

夸父为什么要追日?要逐日?这是一场竞赛,还是有其他原因?古文献没有明确记载。如果"逐日"是驱逐之逐,那么,夸父的行为就值得赞赏了。因为,古时几日并出的记录,并不少见。太阳多了,气候燥热,一定要给人民百姓带来痛苦。夸父是巨大的天神,他才有决心去驱

逐太阳。但是，他并没有成功。

《山海经》记夸父的，不仅这一件事。《大荒东经》有："应龙杀蚩尤与夸父，"《大荒北经》有"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这里，夸父已不是神，而是一个部族了。所以，《海外北经》有夸父国。称其为神，当在炎帝之前或之时，称其为族或国，当在黄帝以后。

共工，也是炎帝之后。《海内经》说他是炎帝的五世孙，即祝融的儿子，《路史》引《归藏·启筮》说他"人面蛇身赤发"。《左传》说他"发水为纪，故为水师而水名"。他最重要的故事不载于《山海经》，而载于《淮南子·天文训》："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以此可以看出他和颛顼之间的这场战争的重要性和残酷性。

其实，共工是一个十分古老的江汉间的部族。蒙文通老师在《古史甄微》中说："归盖有共工当黑帝者，以居水火之间，非序而绌之。"（见《三皇五帝》节）《祭典》说，共工氏曾霸九州。所以，它曾经与女娲氏争过天下，郑玄注之："无录而王谓之霸，在太昊、炎帝之间。"以后，共工氏曾经作过许多王者的水官。王者势衰，他们就作乱一方，企图争帝。前面说的《淮南子》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就是其一。《楚世家》"共工氏作乱，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庚寅日诛重黎。"这是在高辛氏时作乱。《韩非子·外储说》："尧举兵而诛共工于幽川之都。"这是在尧时作乱。《淮南子·本经》："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荀子·议兵篇》"禹伐共工"，这是在舜、禹时共工作乱的记录。

但以上仅仅是问题的一面，他们治水之功亦不能抹煞。《国语·周语》说："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禹治水土，共工之从孙四岳佐之。"他们在治水方面，确有很大的功劳。所以蒙先生说："伯禹治水，实作司空。则治水为有农田之得可证，盖亦共工氏所为也。"

共工氏无论是神是人，他的功过，当一分为二。

相柳，共工的属族，当然也是炎帝之后。《海外北经》说："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禹杀相柳，其血

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在昆仑之北，柔利之东。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九首，大约是指九个支系。共工失败后，他们迁移到白於山附近，即今陕西定边县南一带。"厥为泽溪"似乎又在兴修水利。或者就是以水为害，掠夺当地民众。禹治孟门、壶口之后，奉命征讨孔壬。相柳助孔壬反抗大禹，大禹在柔利附近，即今阴山之南，可能是山西北部，全歼相柳。相柳氏尸横遍野，禹命士兵深埋高垒，以灭其迹。并且，为了镇邪，还在土堆上建了尧台、喾台、丹朱台、舜台。那里还有一台共工台，当然不会是禹建的，而可能是相柳盘踞此地时修筑的。

相柳氏灭绝得很惨烈。说明远古时，族系之间的斗争与融合是很残酷的。

《山海经》中，属于炎帝系统的神还不少，如精卫填海，蚩尤被擒，他们都带有很浓的悲剧色彩，让我们看到炎帝与黄帝斗争的另一个侧面。

西王母。《山海经》有西王母山。《大荒西经》有西王母穴。《大荒西经》有西王母神。《尔雅·释地》还有西王母地（"觚竹、北户、日下、西王母"，谓之四荒）以神而论，最后还由神变仙，由兽形变人形，由男性变女性，其要害，恐怕就在"王母"两个字上。

《山海经》说到西王母的地方有三处，《西次三经》说："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大荒西经》则已是"有人"了，但样子还不好看（"戴胜、虎齿、豹尾"）。到了《海内北经》又变成"西王母梯几而戴胜，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她（他）头戴玉胜，悠闲地靠着矮几休息，有神鸟为她（他）取食。此时，兽形不见了，还多少带了些女相，而到了《穆天子传》："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乙丑，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已近后来的王母娘娘。而有了道教的玉皇大帝，西王母就真成了娘娘。由此繁衍出许多仙话：如羿求不死之药于西王母；西王母来中原向舜献玉……以至《西游记》孙悟空大闹蟠桃宴……西王母在神话与仙话中，竟占了很重要的位置。相对来讲，女娲、素女……真正的女神，还没有他幸运。其中缘由，很值得研究。

# 海东诸国的思考

远古的人类，对自己生活的世界，以至对周边的星球，到底知道多少，一直是个谜。传统的说法，1485 年以后，哥伦布才“发现”中南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更是“迟醒的新大陆”。人们对自己居住地外的人和事，知之甚少。但近年来的许多考古新发现，都否定了这一传统的看法。据介绍，18 世纪初，土耳其海军上将彼利·雷斯所收藏的一幅古地图被发现。它正确地绘出了南北海岸线，南极的轮廓，以及直到 1952 年人们（现代人）才弄清楚的延伸在这片神秘大陆上的山脉的地图。而这幅地图所揭示的南极洲，还没有冰层——这当是几百万年前的事。这幅古地图，和今天用回声仪测绘的一样精确，真是匪夷所思。而马雅人的传说中，对金星和地球的了解，似乎早已超过现代人。而埃及大金字塔，与地球、天空星座的关系，也是一个热门话题。（如：为什么金字塔的自重 $\times 10^{15}$ 等于地球的重量；金字塔塔高 $\times 10 \times 10^{9}$ 等于地球到太阳的距离；金字塔底周长 $\times 2 =$ 赤道的时分度……）

这些，都使我们对传统的说法，产生了疑问。

回到《山海经》。我们读山经、海内经，对当时夏王朝及其以前的中国域内之事，已有一些了解。而这些了解，是上古人告诉我们的。那么，域外之事呢？我们先从东方看起。

按《大荒东经》和《海外东经》所说，它们都是从东海之外讲起，《大荒东经》说：“东海之外，大壑。”《列子·汤问篇》作了如下叙述：“渤海之

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可以看出,它所讲的是离东海(包括今之渤海)东面很远的事。这大壑,也就应是甘渊、汤谷……就是太阳出来的地方。经中,关于日月所出之山共有大言(大谷)合虚、明星、鞠陵干天、东极、离瞀、孽摇頵羝、猗天苏门、壑明俊疾,共九座。这实际是由于季节不同而产生日月所出的不同位置。有些山名,其义费解,很可能是音译。

最有趣的是东方的这些国家,如大人国,小人国。不仅中国小说《镜花缘》有,外国人写的《格里佛历险记》也有。日本,素有“小鬼子”的恶号,而古书中关于“大人国”的记载则更多。现在大家爱说的“巨毋霸”,就出在蓬莱东南(见《汉书·王莽传》)。

大人国,似乎离东土不远,而君子国,则已远离本土。这个国家,按《后汉书·东夷传》注引外国图,说去琅邪三万里。孔夫子就说过:“道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于海,有以也。”这个国家的人,衣冠带剑,好让不争,到处开遍了各色的木槿花。

日本岛附近,没有这样的国家呀!

但是,据介绍,在我国台湾省东北部的太平洋上,有一个“龙三角”地域。它介于日本东京湾,小笠原群岛、关岛和台湾西部雅蒲岛之间。这里从1955年开始,曾发生了许多神秘现象:大型船只和飞机失踪,罗盘和电讯失灵中断,巨浪、海雾、狂风突然涌现又突然消失……后来,英国的研究者琼·查瓦德曾进行过详尽调查,认定这里就是传说中的“穆”(姆)大陆。穆大陆,就是太阳升起的国度。在距今12000年前,他们曾创造过灿烂的文化。他们的航海和建筑业都相当发达,并向周边地区传播过自己的文明。传说中还有一些有关穆王朝的故事,见美国人理查德·艾尔曼等所著的《伊甸园秘境》一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穆大陆及其文明消失了。但是,君子国的风貌,却给孔夫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才会发出当自己理想不能实现时,将去君子国的慨叹!

无独有偶,太平洋上的小人国,似乎也得到了证实。在英国人约翰

·史蒂芬等人著作的《全能者的天机》一书中（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提到，夏威夷的一些老人说，他们的祖先在考爱岛的密林里曾看见过比日本人矮小得多的曼涅胡内人，他们只有60～90厘米高，但力气却很大，行动迅速，而且具有很高的文明。据说，夏威夷岛上最大的奥基尼庙宇，就是这些矮人在一夜之间为夏威夷人建成的。他们长时间和夏威夷岛上的居民和平共处……

东海外的黑齿国，离中国的本土，应该是很远了。按《后汉书·东夷传》："倭国东四十（郝懿行校为千），有裸国，裸国东南有黑齿国，船行一年可到。"以今天的地形推测，裸国当在今天的夏威夷群岛。那里的土人，长年都赤裸着身体。从这里东南行一年，到达的地方当为中南美洲。黑齿国的人，不仅齿黑，而且"为人黑首，食稻使蛇"（《海外东经》）。我们知道，在中南美洲的奥梅克文明中，发现过许多巨大的石雕黑人头像，他们特别崇拜蛇。《大荒东经》还说黑齿是帝俊的后裔。"姜姓，黍食，使四鸟"。中南美洲是玉米的主要产地，也是民间主食。使四鸟，与中国南方民族以鸟为图腾者相似。难道中南美洲的"黑人"不是源于非洲，而是源于中国？而在黑齿之前，东海上还有"白民之国"的记载。白民者，白色人种也。按《大荒东经》的说法，他们也是帝俊的后代。他们不仅"使四鸟"还使"虎豹熊罴"。如果《山海经》的说法有据，各色人种，都来自中国。那么，中国当为人类文明的发源地，这就太精彩了！

我们把黑齿国的位置定在中美洲，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海外东经》在黑齿国后，接着就说："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我们知道，世界上以"扶桑"为称谓的，一是日本，一是墨西哥。我们在《雾中的王国》已作讨论，认为以扶桑为墨西哥，更符合《梁书·诸夷传》中，彗慧深和尚所走的路线。所谓："汤谷"，按郭璞的注，即"谷中水也"。而墨西哥湾正有一条暖流，沿墨西哥向北和东北流动，这正是"汤谷"之谓。

东海之外，还有雨师妾国、玄股国、毛民国、劳民国。这四国都是黑色人种，也都在黑齿国的北方，当然就不会是东南亚一带。

如果黑齿国在中美洲的墨西哥，黑齿国的东北面，就是大西洋了。

从墨西哥的东海岸，越过大西洋就可以到非洲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及埃及等国。所以，黑齿北的这些黑人国度，一定是在今天的非洲境内。至于这四个国家，到底指谁，因为对非洲的古历史和古地理知之甚少，不敢妄言。但在远古时代，交通和通讯极不发达。而远在东方的中国人，不仅知道他们的国名，还知道他们的特点和生活习惯，并明确指出他们有许多国家的民众，是中国大帝的后代，实在是太令人费解了。其中，是否潜藏着尚未解读出的天机？

# 《山海经》对海外其他三方的描述

《山海经》对海外东方的认识，已从东半球，转了大半个圈，回到了东半球最西边的非洲。那么，作者对其他三方，又知道多少呢？

先看北方，东北海之外的附禺山，还有中原大帝颛顼的事迹，再往北，胡不与国，已是少数民族。而肃慎国，在商周时代，就拥有长白山以北及黑龙江中下游地区，已是北纬 50°左右。而所记方千里的大泽，这是候鸟们在最北的栖息地。人们认为这该是俄罗斯境内的贝加尔湖。

《大荒北经》说："有儋耳之国，任姓，禺号子，食谷北海之渚中"，儋耳，大耳下垂，这倒很像北方人喜欢戴的耳罩。"北海之渚中"应是贝加尔湖周围的沼泽地。

"大荒之中，有山名北极天柜，海水北注焉。"以远古时白令海峡有通路看，应该是外兴安岭山脉。

《大荒北经》和《海外北经》都说有无肠国、深目国，这都是只吃鱼的国家，这里应该是不能种植谷物的高纬度地带，即北纬 60°左右的地区。

再看西方。"西北海之外，赤水之东，有长胫之国。"（《大荒西经》）这该是今日巴颜喀拉山北面的星宿海、扎陵湖、鄂陵湖一带，在远古时，这里应是一座大内海。黄河、通天河（即金沙江上游）即发源其山麓的东北西边和西南边。

此后，就有七座“日月所入”之山，分别为方山、丰沮玉门山、龙山、日月山（吴枢天门）鏖鏊钜山、常阳山、大荒山，比“日月所出”之山少了一座。

远古的人，可能还没有太阳是恒星，地球会自转的知识，才产生了日出日落的概念。而这种概念，因为很直观，所以沿袭至今。

但这些山到底在哪里，众说纷纭。《大荒西经》日月山有文说：“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次”。今天的日月山，在青海的东南面。下面“有女子方浴月”。从远处看，月沉于湖，也是很自然的景观。那么，经文中的日月山，也就是今日之日月山了。

经文所说：“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这山的位置，在今昆仑山脉之巴颜喀拉山。

总之，从西方看，当时中国人的目光，似乎还没有超出今日中国的版图。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既有黄帝的记载，又有帝俊、颛顼、炎帝的记载。可以看出，上古时，西方是中国民族杂居之地。

至于南方，不仅及海，而且有一些岛国的记载。最远的当为“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大荒南经》）。其实，这就是《大荒东经》所说的“月母之国”（按郝懿行说）：“盖天地始生，主日月也。”故启筮曰：“空桑之苍苍，八极之既张，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职，出入以为晦明。”日月都从东方升起，但季节不同，位置不同，甘渊（泉）是日月升起时的最南端。人们当然也可以在南海的南面，看见太阳升起，但最远也尚未及今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因为，有关南方的经文中，还没有巨大的岛屿的记载。

# 炎帝与帝俊

《山海经》是有关上古史的重要文献。在整部著作中，提到黄帝的地方不少，蒙文通老师说有10处。其实，如果加上峹都、钟鼓之山以及帝苑之水、蓄草、宣山、洞庭等与黄帝有关的地名、人物，远不止10处。但相对来说，有关炎帝的事就太少了。以刘秀所校的18篇(篇目数各书都不一，实即南山经三，西山经四，北山经三，东山经四，中山经十二，海外经四，海内经四)看，只有一处提到炎帝，即《北次三经》的发鸠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鸟，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

这只是一个传说，并无炎帝本身的事迹。

郭璞编入的大荒四篇和海内经一篇，却有三条。

《大荒西经》：“有互人之国，炎帝之孙名灵恝。灵恝生互人，能上下于天。”各注家皆以“互人国”即《海内南经》之氐人国，属氐羌系，合炎帝之后。《海内经》有氐羌的伯夷父为颛顼之师之说，说明了蜀人和颛顼的关系。《大荒西经》说“有鱼遍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稣。”《海内南北》说，氐人国“其为人人面而鱼身，”这鱼妇，就是氐国的女人，她救过颛顼的性命。

《海内经》：“炎帝之孙伯陵。伯陵同吴权之妻阿女缘妇，缘妇孕三年，是生鼓、延殳。始为侯。鼓、延是始为钟，为乐风。”他们创造了最早

的钟，乐曲和音律。作乐风的，还有太子常琴(《大荒西经》)。他是祝融的儿子。

还有一条在《海内经》，讲炎帝的世系，前已叙述。其重要之处，在于祝融一代。此世系，“戏器生祝融，祝融降于处江水，生共工。”祝融则是炎帝之后，但《大荒西经》又说“颛项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又该是黄帝的后裔，难以解释。其实，仔细推敲，也不难理解，就如颛项，本为黄帝之孙，但他的母亲是“淖子”即蜀人。若以母系讲，也可称他为炎帝之后。正因他是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炎黄两家，都要把他写进自己的世系，不必强辩。

炎帝是一位十分重要的“大帝”，我们自称“炎黄子孙”，也把炎放在第一位。从《史记》看，《五帝本纪》虽开篇于黄帝，但文中有言，“时神农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神农氏弗能征。”这说明黄帝是晚于炎帝而成为盟主的。

炎帝是位很有作为的君王。“炎帝始教民耒耜，躬勤田亩之事，百谷滋阜，圣德所感，无不著焉。……当斯之时，渐革庖羲之扑，辨文物之用。……采峻岅之铜以为器。”(王嘉《拾遗记》)“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七十毒。”(《淮南子·修务训》)他的功绩应该是巨大的。我曾去宝鸡市参观炎帝陵，那正殿坐着的炎帝，已不是人身牛首，却也十分威武。下面通道两旁的泥塑群，全是近人制作，其鞭草尝药的情景，仍很感人。

这么一位伟大的君王，《山海经》中，怎么只寥寥数语？如果仅看刘向所上之《山海经》，炎帝则只有精卫一条，实在让人难以相信。

然而，在中原古史中，无任何文字记载的帝俊，却多次出现于大荒四篇及海内经中。也许，刘向也是见过这五篇文献的，只因它太“荒诞无稽”，不敢向皇上呈献，才由后来的郭璞编入《山海经》。那这位帝俊又是谁呢？

黄帝是一位人主，也是一位天帝。他可以把天神羿、应龙、女魃叫下来为他射日杀敌。帝俊也神力无边，可以与妻子羲和、常仪生下10个太阳和12个月亮。黄帝的子孙很多，有12姓。帝俊的子孙更复杂，不仅有黄种人，还有黑种人和白种人。如果按有些经文看，甚至黄帝还

是他的儿子呢！（《大荒东经》"有白民之国。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这帝鸿就是黄帝。）而且"帝俊生后稷"，而按中原说法，后稷为帝喾妃姜源所生，帝俊成了帝喾？《大荒东经》说："黄帝生禺号"，而《海内经》又说："帝俊生禺号"，则帝俊就是黄帝了。《大荒南经》有"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国"，而娥皇本是舜的妻子，而舜又本有"夋"名，然则，帝俊又成帝舜了？其实，这些都是由于传说的地方不同，民族不同而发生的差异，不必深究。它只说明，帝俊是位伟大的君王而已。

在《山海经》中，神通最大的天帝，当为黄帝、颛顼和帝俊，却恰恰没有炎帝。再细心研读，黄帝乃中央大帝，直接管辖西方，颛顼乃北方天帝。南方本是炎帝管辖。通读荒经和海内经，帝俊的子孙，主要在东南方，北方只有"帝俊竹林"，西方则只有后稷。而后稷活动的地方是在西南，最后葬于都广。因此，我斗胆地猜想，《山海经》所说的帝俊，实际上就是炎帝。因为，只有炎帝才能和帝俊等同。实际上，帝俊就是大帝的意思。《大戴礼·夏小正》："时有俊风：俊者，大也。"南方之人称南方的天帝，只能称"帝俊"，就如中原人称黄帝为"帝"或"天帝"一样。许多学者早已考证，《山海经》的经文，主要流传于南方即长江流域，特别是未经刘向校订的荒经和海内经。所以，把炎帝称为"帝俊"，完全合乎情理，再者，南方人多有把宾语和主语倒置的习惯，如"都广"是"广有都邑"之意，这帝俊则为"帝中之首"。至今，我们四川人仍把"热闹"，说成"闹热"呢！

历来学者，多以帝喾为帝俊，其缘由有二。一、《史记》"高辛生而神异，自言其名"，而初学记引《帝王本纪》"帝喾神异，自言其名曰夋"。从《史记》看，"自言其名"应为"喾"。因为喾才是他的名。《帝王本纪》指他名为"夋"，并无其他佐证。二、"帝俊之妻生十日"，"帝俊生后稷"合乎《帝系》之帝喾。但是，帝俊之妻羲和生十日，只见于《山海经》。与《尚书·尧典》之"乃命羲和，敬援人时。"及《世本·作篇》"羲和作占日"区别甚大。至少前者为神话，后者为历史传说。《世本·帝系篇》（清张澍粹集补注本）说："帝喾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即后稷、契、尧、挚，已有牵强之嫌。而与生日有关的，只见王嘉《拾遗记》："帝喾之妃，邹屠氏

之女也……妃常梦吞一日，则生一子。凡经八梦，则生八子，世谓之八神，亦谓之八翌。翌者，明也。"可以看出，羲和生日的神话，比之后来的传说，要古老得多。"高辛生后稷，为周主。"《史记·年表》有载，而帝俊不仅有生"后稷"之说，还有生"帝鸿"，即黄帝之说。这"生"如果不是指"父母——子女"的直接关系，而表示为其后裔，那么，炎、黄本是互通婚姻的民族，而炎帝又早黄帝几十代，说帝俊生黄帝，也生后稷，即他们都是炎帝（即帝俊）的后裔，又何尝不可！

另外，说《帝系》中有帝喾而无帝俊，这是事实。因为，以中原人的观点，炎帝与黄帝相比，是难以称"俊"的。而说《山海经》有帝俊而无帝喾，则为疏忽。《海外南经》有"狄山、帝、尧葬于阳，帝喾葬于阴。"《海内北经》有"帝尧台、帝喾台、帝丹朱台、帝舜台。各二台，台四方，在昆仑北。"《海外北经》及《大荒北经》对建台一事，作了进一步的解释："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这几座后，最早的是帝喾。连颛顼也没有，就更不会有黄帝和帝俊的了。

在荒经和《海内经》中出现帝俊，但同时也出现帝喾和帝舜：

"帝尧、帝喾、帝舜葬于岳山"。（《大荒南经》）

"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海内经》）

再者，帝俊之俊，与夋的字义也很不同。俊者，大也，美也。而夋则为舒迟之义，《说文·夊部》"夋，行夋夋也"，是行动舒缓从容不迫的样子。《礼记·玉藻》"君子之容舒迟"。这倒像《史记》对帝喾的评价："普施利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

另外，《大荒南经》有："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然而，娥皇、女英是帝舜的妻子，于是，有人认为这就是帝俊即帝舜的根据，但细读《山海经》，《海外西经》有："三身国在夏后启北，"《海内经》有"帝俊生三身，"都未提及娥皇，可知娥皇是后人的附会之说，不可为据。

那为什么《山海经》中，又有几条炎帝的记事呢？其实，这是十分明白的。《北次三经》是对精卫鸟的解释，而且是中原人的解释，当然用炎

帝一词。而荒经和海内经,可以说是没有经过“校订”的篇目,杂入些后人的话更是难免。连刘向校过的经文,还有后于大禹的事(如关于夏启和某些商周时才有的地名),大荒经和海内经就更是难免了。

还有一点,我们在《重要神祇》中已经说过,古史对炎帝的出生地,说法并不一致。一说生于蒙谷,即今宝鸡市北,一说生于今随州北之厉山。但还有另一说,指他生于常羊。一见(《太御览》卷135)“帝王世纪曰:炎帝神农母曰佳姒,有娇氏女,名口登,少典妃。游华阳,有龙首感之,生神农于裳羊山。”二见《春秋纬元命苞》“少典妃安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之于裳羊,生神子,人面龙颜,好耕,是为神农。”三见《宋书·符端志》“炎帝神农氏母曰女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山,生炎帝。”

我们知道,上古时的华阳,即华山之阳,指的是秦岭以南,四川及云南、贵州的广大地区。也就是说,安(女)登这个氏族,是活动在长江上游的民族。常羊山的位置无考。《山海经》有三条。一是《大荒西经》:“有大巫山,有金之山。西南,大荒之中隅,有偏句、常羊之山。”从经文看,它该在四川的西部;二是《大荒西经》:“大荒之中,有山名常阳之山,日月所入。”在四川西部,能看日月所入的大山,则就只能是岷山山系中的一座了;三是《海外西经》:“形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形天乃炎帝之后,其活动地区,正该在蜀地。参以《史记·五帝本纪》:“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看来,这场战争,就发生在四川西部,形天的首级,就葬在岷山附近。

神农生地早有两说,现在又增加了一“常羊”说,似有“争祖先以荣后人”之嫌,但以文献与史实论史,应该是允许的。可以说,陕南、四川及湖北都是炎帝一系初期的活动场所。各地都有遗迹,而许多遗迹又被引申夸大为出生地。于是,先王贤主真正的诞生地,往往变得模糊,这是不足为奇的。

炎帝生于四川境内,又在哪里长大呢?《帝王世纪》称:“长于姜水,因以氏焉。”我们必须弄清姜水的位置。《水经注·渭水注》云:“岐山又东,经姜氏城南,为姜水”,则此水应为源出姚渊西南(今甘肃临潭县西

南)，即白龙江、白水江和岷江上源的地区。姜，从女而羊声，与常有羊之山(即常羊山)的情况也十分吻合。实际上，牧羊人即为羌字，牧羊女即为姜字，以姜为姓，是母系社会的写照。炎帝(即帝俊)该是父系社会的开始。《庄子·盗跖》云："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炎帝随母姓姜，但他以后的子孙，按《山海经》所写的炎居、节并、戏器、祝融……则都是男性了。

神农生于四川境内，又好农耕。于是，得天独厚的都广之野，经过他的经营，成为农耕的"样板"。中国农耕的大发展，正源于此。所以，都广之野，不仅是古长江之源，也是中国的农耕之源。炎帝、神农、帝俊实为一人，他就是长江文明开发的先驱。我们称他神农、炎帝，并尊称他为帝俊——伟大的帝王！

# 关 于 都 广

帝俊就是炎帝，也就是神农氏。

蒙文通先生引《命历序》说"自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帝喾，皆各传十数世，各数百千年。"按《尸子下》说："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对以《史记》"轩辕之时，神农世衰"，炎帝为开国之君，早于黄帝若干年。正因如此，我们才叫炎黄子孙，而非黄炎子孙。

按《世本》所记：黄帝都涿鹿，舜居妫汭，夏都咸阳，后徙安邑，禹都阳城。那么，神农的都城又在哪里呢？

如果帝俊就是大帝的意义，那么，都广，则正是大都的意思。难道炎帝的都城就在今日之成都平原？

帝俊和都广，从语法上讲是一致的，而都广之野，曾是炎帝的都邑，却也并非不可能！

《海内经》说："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盖天地之中，素女所出也。"

前面说过，有的学者指出：都广，就是广都，即今日之双流。其城是"其域"之误。我也曾经支持过"城"为"域"字。以今日之目光看，都广就是大都，此城也真有三百里。只不过它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城邑群体。

我们已经论述过《山海经》把都广之野，作为夏初疆域之中（即天下之中）的准确性。那么，"其城三百里"又可信吗？

首先，我们看看去年有关黄帝黄城的报道。在陕西民间，有关“黄帝黄城”的传说，由来已久。近几年来，中外考古学家和炎黄文化研究者，就在黄陵县桥山黄陵附近，对“黄帝黄城”进行了考察、研究和论证。继1988年在桥山发现“黄帝古城”遗址——即传说中的“黄城中宫”后，去年(1999年)，炎黄文化研究者、陕西《铜川日报》记者李延军依据古《龟书图》在黄帝陵周围八个方位先后发现八座仰韶、龙山文化的古城遗址。至今，这九座遗址共同构成一座以黄帝陵为中宫，约40平方公里，呈正方形的“九宫连城”，证实了民间传说和文献记载的“黄帝黄城”本来就存在过，而且规模宏大，气势磅礴。

无独有偶，近年来，在川西平原，北起都江堰，南至新津，东至崇州、温江、郫县，已连续发现六座新石期时代晚期的古城遗址。加上广汉三星堆第一期文化层的时代特征，可以说已发现新石器时代古城遗址七座。估计从彭州沿湔江至沱江汇合处，还可能有早期古城遗址。那么，沿岷江两岸的古城，从东到西，从北到南，则肯定能达到“方三百里”的范围。从地图看，今日之都江堰(即灌县)与广汉，实处西、东两端，岷江的一条，经温江、崇庆、新津至彭山；另一条经郫县、成都至彭山。按推想，其南端在彭山。这多座古城，是以什么样的图案组成，尚不得而知。以三星堆古城遗址来观察，这群古城的外貌，似乎是龟状。因此，可能与黄帝黄城不同。

如果都广之野的所有城邑连起来，真有三百里宽，那当为巨大的都邑了！

从另一方面来讲，也只有这里，才有建都的条件。因为，这里有最优良的菽、稻、黍、稷，而且“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这在远古，岂非人间天堂?!

事情还不仅如此，这里的人文环境，更不能小视。因为，这里不只有作杖的灵寿木，还有神树建木。《淮南子·坠形训》说：“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目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海内南经》对它如此描述：“其状如牛，引之有皮，若缨黄蛇，其叶如罗，其实如栾，其木

若莛。"而《海内经》更作了如下补充:"青叶紫茎,玄华黄实……百仞无枝,上有九欘,下有九枸,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大皞爰过,黄帝所为。"

先看建木的功能。依经文所示,从都广经建木上下于天的,不仅有一般的神祇,连伏羲也走这个通道。"黄帝所为",该是"护卫"之意。因为,如果"为"字作"种植"或建造讲,先于他的伏羲和"众帝"又怎么能享用?

对建木的描述,肯定是按《山海经》的图画来讲的。

"其状如牛"是指根部,即"下有九枸"之谓。"引之有皮,若缨黄蛇",是指根部的覆盖物。"其叶如罗,其实如栾(卵)"是其最外面的一层装饰。以此来探讨,可能是有九条通道的基座。"其木若莛",是指"树干"像刺榆,即树干上有许多尖锐的突出物。"百仞无枝",是整个树干直通而上,其顶端则有"九欘",是弯曲的枝形通道。这些枝形物,也覆盖着发光的叶片和闪光的小点装饰物。

伏羲是再生人类的始祖。但历史文献,早就指出,他真正的"祖籍",是在很远很远,一个叫华胥国的地方。他不是胎生的,而是那位华胥姑娘——他的母亲,不知为什么来到地球,到了中国一个叫雷泽(一说在太湖,一说在滇池)的地方,当她在泽边行走时,踩到了一个大足印,心有所感,生了伏羲。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位姑娘没有把伏羲带走,将他留在了地球上。也许她告诉了儿子寻找自己的方法,这就是伏羲要上下建木的缘由——"回家看看"。因为,华胥这个天国,离地球很远很远。

按《列子·黄帝篇》所说:"华胥之国,……不知斯齐国几千万里,盖非舟车足力之所能及,神游而已。……不知乐生,不知恶死,故无夭殇。不知亲己,不知疏物,故无爱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顺,故无利害。……入水不溺,入火不热,斫挞无伤痛,指擿无痟痒。乘空如履实,寝虚若处床。云雾不碍其视,雷霆不乱其听,美恶不滑其心,山谷不踬其步,神行而已。"可以说,比我们所看科幻电影还要奇特。如果是想象,不知古人怎么想得出来?这样的"国度"不可能存在于太阳系,而该是外星世界的外星人。

在伏羲时，都广之野，就有一座“建木”状的发射宇宙飞船的发射架。其文化之发达，不言而喻。

我们可以再展开自己的想象：也许，正是伏羲从华胥国得知地球将遭到旷世洪水洗劫的消息。他从建木下来，向大家报告了这个可怕的预言。但是，这里的人谁也不信。只有年轻姑娘女娲，信任伏羲。女娲要自己的家人，同伏羲一起，去躲避这场灾祸，但被家人拒绝了，使女娲痛断肝肠。于是，在《山海经》中，留下了“女娲之肠”的神话。

最后，伏羲和女娲，坐在一个巨大的葫芦里（相当于上帝所赐的挪亚方舟），躲过了这场灾难。后来，他们结为夫妻，成了人类的再生始祖。汉代许多画像石刻和画像砖所刻画的伏羲和女娲交媾在一起而生下孩子，正是这一历史故事的记录。他们一人举尺，一人举矩，代表的科学和知识。是无知和傲慢毁了前一代人类。伏羲和女娲，开始是以自然生殖的方式繁衍子孙，这远远不足。所以，改用无性生殖的“克隆”技术，这就是“抟土造人”的由来。郭沫若先生于 1973 年 1 月，在《文物》上发表《桃都·女娲·加陵》一文，文内称：“后来成为伏羲与女娲，汉墓壁画多作男女双人像，都是人身蛇尾，下体的蛇尾每每是两两交缠在一起的。有时候男女分掌日月，共理阴阳。有时候男女分执规矩，共管乾坤（古人言天圆地方，规矩以画方圆，故以规矩表示天地）。”这当是“经典”说法。

洪水毁灭了前期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明，在都广之野，仅留下了这棵巨大的，失去作用的航天发射架——建木。所以，直到黄帝时，还作为“文物”护卫过。但尧时的大水，让成都平原第二次成为泽国，并在水中浸泡了半个多世纪。它彻底地泯灭了前期文明的遗迹，留下的只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些遗址和遗物。但是，无论从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来观察，炎帝和黄帝时代，这都广之野，都是十分繁荣和富裕之地。

炎帝所以又称神农，主要业绩，在于发展了农业。晋王嘉所撰之《拾遗记》说：“炎帝始教民耒耜，躬勤田亩之事，百谷滋阜，……神芝发其异色，灵苗擢其嘉颖，陆地丹蕖，骈生如盖。香露滴沥，下流成池。……朱草蔓衍于街衢，卿云蔚蔼于丛薄。筑园丘以视朝日，饰瑶阶以揖

夜光。奏九天之和乐，百兽率舞。”与《山海经》之都广相对，这不正是都广之野和都广的景象？

伏羲女娲画像砖

成都平原本是最适合谷物生长之地，炎帝创业于此，建都于此，合情合理。时间虽掩盖了这一切，但“都广”之名，却为我们留下了一丝信息。

黄帝与都广之野的关系，也很密切。文献记载，黄帝娶西陵氏，谓之嫘祖。嫘祖生于嫘溪，在今岷江上游的茂县。他们的两个儿子，一位叫青阳，降居江水，而上古时，岷江就叫江水。另一位叫昌意的，降居若水，若水就在建木西。《水经注》说：“若水出蜀牦牛徼外。……若水沿流，间关蜀土”，牦牛沟，在今汉源县大渡河南部，也是蜀土。而且，这位昌意，还娶了蜀山氏的女子为妻，生颛顼于若水之野。他的老师伯夷父，也是氐人。蜀地如果没有高度的文明，哪能培养像颛顼这样的伟大君王？

《山海经》特别提到素女。素女者，蜀女也。明代四川的大学者杨慎，在《山海经补注》中说：“素女在青城天谷，今名玉女洞。”

素女是黄帝的嫔妃。一位著名的演奏家。据《世本·作篇》记载：“伏羲氏作琴，……五十弦。黄帝使素女鼓瑟，哀不自胜，乃破为二十五弦。”《说郛》辑宋虞明《古琴疏》云：“素女播都广之琴，温风冬飘，素雪夏

寒，鸾鸟自鸣，凤鸟自舞，灵寿自花。”

如果传说有据，她还应该是中国最早的性学专家。《素女经》、《素女方》当是她与黄帝的共同作品。

不仅如此，据传说，素女是西王母的侍女，她曾与九天玄女一起，带着西王母送的那件刀戟大弩不能伤的狐裘，和一道风雨云雾不致迷失方向的灵符，下凡来助黄帝战胜蚩尤。

这样的才女，出自都广，应该有其环境因素。

正因为黄帝与蜀地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所以，青城山上，“自会庆宫西行一二里，有常道观，乃古黄帝祠址。”(《蜀中名胜记·灌县》)

后稷本是周人的始祖，为什么要葬在都广，也耐人寻味。

《史记·周本纪》说：“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心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因名弃。”看来，他虽然名义上是帝喾的儿子（这种名义上的“关系”，本来就极不可靠），但与帝喾，绝无血缘关系。姜原姜姓，是炎帝之后，从母系看，后稷应为炎帝后裔。所以，若《山海经》中帝俊即为炎帝的尊称，《大荒西经》说：“帝俊生后稷，后稷降以百谷。”则是很合情理的。

后稷教民播种的记载很多。“稷降播种，农殖嘉谷。”(《周书·吕刑》)“稷勤百谷而山死”(《国语·周语》)，“周弃作稼而死为稷。”(《淮南子·汜论训》)连他的名讳也从播植百谷而得。问题是：他是从哪里得到那些菽、稻、禾、稷的？从他死后要葬都广之野，我们似乎得到了一点线索：原来，他推广的种植技术，来源于“百谷自生，冬夏播琴”的都广之野。这也是他死后要葬于斯的缘由。

由于周人与羌人有这种渊源关系，所以后来武王要伐纣时，蜀人会积极参加。

后稷不仅是菽稷文明的先驱，也是稻作文明的始祖。难怪日本的考古学家，为寻找稻作文明之源，特地到成都平原作考察。结果，找到了多座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城邑，为都广即是“大都”，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当我们讨论都广曾是帝俊即炎帝的都城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帝王世纪》所说："主夏，故谓之炎帝。都于陈"的话。上古至春秋，陈是指河南淮阳。如果帝俊是定都都广，这都陈之说，又当作何解释呢？

其实，司马贞在释《封禅书》时，已破解了这个谜。他说："神农后子孙亦称炎帝。"神农氏有70世之说。清人马骕，近人何光岳都编过炎帝世系，虽不及70世，但都在13世纪以上，可以这样看，帝俊即炎帝最初的都城，是在今四川成都平原即都广，成为盟主入主中原后，"初都陈，后居曲阜"（《史记补三皇本纪》）正因为如此，山西、河南、山东都有炎帝遗迹。然而，这一定已不是首任炎帝的业绩了。

也许，我们的论据还不充分，但我们希望在科学的进步和考古新成就的基础上，伏羲和炎帝的历史，能有新的突破。

最近，在"都广之野"北部彭州和什邡市境内，发现化石和岩画。除东方剑齿象外，还有其他动物的牙齿、爪，特别是人体骨骼化石。此事若被科学所证实，都广将很可能是人类最早的居住地之一（《四川日报》2000年10月10日第5版）。炎帝和黄帝都经管过这块土地，所以，一定十分繁荣过。但在尧的时代，定遭受到巨大的洪水灾害，把一切文明都淹没了，只留下一些神话和传说，让人们去猜测和解读。

# 《山海经》与蜀

《山海经》有蜀人、蜀地、蜀事的记载。譬如:"韩流取淖(蜀)子女曰阿女,生帝颛顼"(《海内经》)、"白水出蜀而东南注江"(《海内东经》)、"西南黑水之间,盖天地之中,素女所出也……"(《海内经》)而《中次九经》对蜀地的叙述更详。以至有人认为《山海经》某些部分,是蜀人的作品。我们不赞同这种看法,已讲明了原因。但《山海经》中,确实没有蜀国的称谓,也没有蜀国的记载,而蜀国又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山海经》为什么没有提及,不能不让人困惑。

其实,认真一想,没有提及蜀国,正说明《山海经》是夏代的"作品"。

以《禹贡》看,"华阳、黑水惟梁州……厥田惟下上,厥赋中、三错。厥贡璆、铁、银……"也就是说,这里是夏代的九州之一,田是七等,赋税八、七、九、三等,还有不少贡品要献,当然不会有国的称号。

而夏代之前,蜀地一直是"天地之中"的繁华地区,并非"西南夷",也不可能称之为国。有人称四川是"中国的后花园",这是现代人的看法。

相对来说,巴人称国,也许比蜀人早些,《海内经》说:"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但如果"后照"即"少昊",是黄帝的儿子,那么,巴人的称号、立国也不会太早。

《山海经》有数处提到开明一词,而开明又是最后一代蜀王的世号,所以,又产生了新的疑问:既然书中有开明,而开明王朝灭于周慎靓王

五年，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即公元316年。即使二十五年一代，也在周襄王时代。那《山海经》就真的成书于战国后了。

但仔细阅读，“开明”一词，只出现在《海内西经》，而且写得很清楚，这是一只神兽。帝之下都昆仑的九座城门，就由它看守。这种神兽，“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东向立昆仑上。”

接下来，经文有“开明西”、“开明北”、“开明东”、“开明南”的叙述。开明西，“有凤凰、鸾鸟、皆载蛇”。开明北，“有视肉、珠树，……不死树、甘水、圣木……”。甘水即醴泉，当然在昆仑之北。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礼）、巫凡、巫相”与《大荒西经》灵山十巫，至少有三个同姓。《山海经》中，记“巫”的（包括巫咸国）有好多处，可能多与医药有关。开明西，“有鸟，六首……”《大荒西经》说这种鸟叫鸀鸟。

从以上经文看，开明，绝非人名、国号和世系号。

关于开明兽，《大荒西经》昆仑条也有记载：“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此处，虽未提名，也该是开明。

同时，《西次三经》有：“昆仑之丘，是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其神状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时。”是开明兽的异名。

蜀山氏是一个很古老的部落。所以，《华阳国志》说，“蜀之为国。肇于人皇，……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很明显，这里所说的国，实乃部族的称谓。直至“有蜀王蚕丛，其目纵，始称王。”人们所说的蜀国，从这时才真正开始。正因为这样，《蜀王本纪》才说，“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灌、鱼凫、（蒲泽）、开明。”

近有学者立论：“蚕丛是颛顼之子，帝舜是蚕丛的嫡玄孙，早蜀三王为姬姓。”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不能不加以讨论。

论者说：“蜀王蚕丛，为帝颛顼少子，姬姓。蚕丛有德，史不直书其名，于史称穷蝉。穷蝉即蚕丛支裔的世系，史载极明。”

但这“极明”的“史载”，却使我困惑不已。

先从远处说起。“蜀之为国，肇于人皇。”我们知道，三皇五帝之说，

《山海经》中的开明兽(民间藏品)

“起于晚周,汉师固已言之也”(蒙文通《古史甄微》)。按伏生等说三皇之义,“遂人为遂皇,遂人以火起,故托遂皇于天。伏戏为戏皇,伏戏以人事纪,故托戏皇于人。神农为农皇,神农悉地力,故托农皇于地”。此说为郑玄、宋均、谯同等赞同。《命历序》、《含文嘉》、《雒书》等也与此说同。所以,“肇于人皇”者,蜀族的历史悠久之谓也。

昌意娶蜀山氏女,也明确说明,姬姓的黄帝,与蜀山氏非同族。

颛顼到底是黄帝的孙子,还是玄孙,《史记》与《世本》同,但与《竹书纪年》、《山海经》不同。《竹书纪年》:“七十七年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山海经》则说:“昌意降居若水,生韩流。韩流……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这里,韩流乾荒,字形相近,很可能是一人。

至于黄帝驾崩,是传与孙子,还是传与儿子,也是一个疑问。《史记》所记,是传给孙子的,但《世本》和《竹书纪年》都有帝挚少昊氏代帝而有天下的记载。颛顼为帝是从少昊那里得到的。而《山海经·大荒东经》也有“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记

载。

这些帝系虽有差异，但若黄帝已进入父系社会，他们都是姬姓，当不成问题。

那么，蜀女、淖子与姬姓不同，又怎么到了蚕丛氏时，就变成姬姓了？论者说，这是因为蚕丛是颛顼的“少子”，当然成了姬姓，因为蚕丛就是“穷蝉”。

蚕丛为什么就是穷蝉，论者只说“史载极明，”我等孤陋，确实很不明白。而以我的见闻，蚕丛乃是氏族之名，并非人名。它是蜀人的一支，也是羌人中的一系，是这支蜀人为蜀之盟主时，才开始称王的。

前年(1998年)冬天，为了制作电视片《雾中的王国——三星堆文化巡礼》，我和德阳电视台的朋友，曾专程沿岷江采访。11月24日，我们来到叠溪。那天，高原上阳光灿烂，海子里的水，碧蓝光亮。当我们正愁没有向导时，场口上的一位健壮的年轻人，热心地为我们引路。

这位青年叫梁跃军(汉名)。据他说，初中毕业，到云南当了五年兵。复员后，回到家乡。因为喜欢研究自己民族的历史，多次跑到茂县的羌族博物馆看陈列品和向老师们请教。他颇为自信地说：“现在旅游团的那些导游，多半都是信口开河，对我们羌人不了解，对叠溪不了解，只图说得有趣，不管是不是真的。”

他领着我们看了玉垒洞，走过一大片花椒地，观看了“蚕陵重镇”的大石匾。然后，又穿过城公路，去观看1933年大地震以后，还残存的一座城门。站在城门外，观看下面的较场。

在参观的过程中，他告诉我们，他的祖辈多次给他讲，他自家的这支羌，叫蚕丛羌，是蚕丛氏的后代。原始社会就在此生活。他们的祖先，是炎帝的后裔，但与姬姓的黄帝有亲戚关系。嫘祖是他们的祖先，嫁给了黄帝。黄帝的儿子，也娶了他们的女子。他们这个支系的蜀人(也是羌人)，建立了第一个蜀国。但后来亡国了，有些支系的人逃跑了。他们没有走，蚕丛王也没有走，死在这里，埋葬在这里。因此，过去这里叫蚕陵。这里是高山里的平坝，坝里可以种植，四周的高山可以狩猎，山下又有岷江，是块风水宝地。所以，一直是羌人重要的聚居地。

他告诉我们，四川人喜欢吃的花椒，又叫川椒，就发源于此，而且以这里的最好。我们也确实看见许多花椒林。当我们向他购买时，他笑着说，一到旅游季节，花椒早都卖完了。

他又讲到了1933年那次大地震，他们的族人死得很多。他们家族，是本地的望族。那天，他的曾祖父想烧鸦片，场里不方便，就躲到山上的林子里烧，结果幸存下来。使他们这个支系，还有少数子孙。而现在场上的羌人，多是后来从外地搬来的，真正的蚕丛羌，已经不多了。所以，很多羌人，并不知道这些。

后来，我问他见过石棺墓没有。他说："见过，石棺有大有小。"他指着远处的大山，"从那座高山过去，大约再翻四五座更高的山，你们就能看见真正的石棺石椁，如果你们要去拍电视，我愿意陪你们！"

望着那又高又大，带着白雪的山峦，摄影组的同仁，都不敢表态。他有些失望。我赶忙说，这次任务紧，将来有机会一定会去，他才释然地笑了笑。

分别时，他不接受我们任何酬谢。最后，收了一瓶矿泉水，还热心地说，下次愿意与我们长谈……

这种民间的"史话"，学者是否相信，暂不理论。但蚕丛怎么会与灶神穷蝉这种偷油婆(《广推·释虫》"蛴、蛣、蝉也，"即灶上的红壳如蝉的虫，即蟑螂)拉上关系，确实令人费解。

清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十三《灶神》条，引《许慎异义》说："灶神，古《周礼》说，颛顼有子曰犁，为祝融，祀已为灶神，"而犁、系(即穷蝉，《世本》作穷系)、蛣因皆近，是穷蝉即犁。(见袁珂编著之《中国神话传说词典》)犁(黎)是老童的儿子，颛顼的孙子，见《史记》与《山海经》。穷蝉是他的伯父，他们不该是同一个人。

再说，史书有记的，颛顼的儿子，《史记》有三，则为穷蝉、老童、鲧。《世本》则有"三十年，帝产伯鲧，居穆天之阳"，"颛顼娶于滕氏之子谓女绿，是生老童。""颛顼生俩"的记载。《山海经》中，颛顼的儿子记得最多，有老童、伯服、淑士、三面、叔歜、驩头、中辐。不仅无蚕丛的记载，甚至连穷蝉也没有，这"蚕丛是颛顼的少子"不知从何说起？

退一步说，如果蚕丛是颛顼的少子，其为王的时间，当早于帝喾高辛氏，时代应在公元前4000多年前。距今不少于6000年。而蚕丛从称王到开明12世为秦所灭，共为五代，时间跨度近5000年。与之同时，中原则有帝喾、尧、舜、夏、商、西周、春秋、战国共八代，而且，如果蚕丛国破是在商初，则仅蚕丛一代王朝，就有2000多年的历史，这可信吗？蒙文通老师，经详细考证，认为蜀王蚕丛至开明，《常志》一再说"三千岁"，"并非无稽"（《巴蜀史的问题》），则蚕丛为颛顼少子之说，就成问题了。

再以《史记》为据，穷蝉是他的第一个儿子而不是"少子"。《本纪》还说："自从穷蝉以至帝舜，皆微为庶人。"哪有封于蜀的记载？司马迁是到过四川的，如果前说是真，这位史界鼻祖，怎么会有如此的"低级失误"？再翻阅《世本》，"颛顼生十年而佐少昊氏，二十而登帝位。元年帝即位居濮。"这濮乃濮阳之濮。如果20岁的颛顼就到了河南，而他的小儿子又"留在蜀中即国位"，他的这个小儿子，该有多大的年纪？恐怕比他佐少昊氏还小吧，怎么能做蜀的开国大君？而如果蚕丛真的是他的"少子"，他到中原，当再无生育。那么，老童、伯服、鲧……又从哪里来的？

其实，颛顼庶于西羌者，当为鲧这一系，鲧为颛顼子，受封于蜀地，后供职于中央为官。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汉书》称《帝系》曰：'颛顼五世而生鲧。今文无五世，之脱烂存焉'。"鲧之前四世无记，可能因为没有多大的作为，但爵位应该是有的（"世为侯伯"），夏与蜀同源，可以说是从昌意开始的，黄帝族才与蜀人长期通婚，共事。关于这方面，李学勤先生曾著有《〈帝系〉传说与蜀文化》（《四川文化》1992年，《三星堆文化特辑》）可供参考。

五帝世系，本多疑问。炎黄子孙，大略划分其姓氏，颇近真实。越是细致，矛盾越多。若以姜、姬区别，蜀人以姜为姓，似乎更合理些。我们在汶川一带，听羌人的传说，也是这样。

# 天于昆仑山

近日,有机会读到一本《中国后花园》的书,主要是从旅游的角度,讲四川的风土人情。

“西南大后方”,这是现代人的概念。四川,应该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

世界上众多的古文明,都是在河流的哺育下形成的。印度河,孕育了古印度文明——哈拉帕文化。它在公元前 2000 多年,就已经有了文字,图画精美的印章,石头砝码,介壳尺,青铜杆尺,金银珠宝,象牙装饰,青铜工具和武器等。而幼发拉底河畔,在公元前 1792 年的汉穆拉比王朝时期所修的巴比伦空中花园,是人类历史中的奇迹。埃及文明,离不开尼罗河。中华文明,则离不开黄河与长江。而中国的地质学家们,根据所采集的“古沉积物”,进行科学测试,得出了黄河的年龄为 50－60 万年,长江的年龄是 6000 万年的结论。而与之佐证的是,中国人的身影,最先显现的,正是在长江上游的元谋、巫山、桐梓、资阳、铜梁、富林、丽江……

但是,文明的发展,与山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人们对山的崇拜,往往就是对天的崇拜。所以,封禅朝山是中国人上至帝王,下及黎民的最重要、最神圣的大事。而在众多的圣山中,昆仑是最富于神奇色彩的。难怪《中国后花园》的作者,把成都北的青城山说成是中国的海内昆仑,这将大大提高其旅游价值。

可昆仑山到底在哪里,历来就众说纷纭。一般人的猜测,可以略去不论。仅就大学者们的意见,就有以新疆和田南面的昆仑山为古昆仑者,以甘肃敦煌北之北山为昆仑者,有以西藏冈底斯山为昆仑者,有以今巴颜喀拉山为昆仑山者,有以岷山为昆仑山者,……更有以泰山为昆仑者。既然如此,这座圣山到底在哪里,就不得不辨。

《尔雅》说:"三成为昆仑丘"。因此,在古代,昆仑并非专一的用词,只要有明显的三个层次的山,都可以叫昆仑丘。所以,在《山海经》中,东南之方丈山,西北方之昆仑都是。这里要讨论的是《西山经》所指,作为"帝之下都"的昆仑。

《山海经》作为一部地理书,山水的位置和地名,应该是准确的,偶有重复,亦很容易区别。如若水与弱水,音同而字异。《中次八经》和《中次九经》都有女几山,但从经文看,《中次八经》的女几山,在今河南宜阳,而《中次九经》的女几山,则在今什邡之雒通山(毕沅谓山在双流,误)。

《山海经》中同一物有两种称谓或两种说法者,按惯例则写为"一曰"。这种叙述方式,随处可见,无须例举。西方之海内昆仑,无同名者。所以,不大可能是指《山海经》中的其他山丘。何幼奇先生在《海经新探》一文中(见《山海经新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中,说昆仑山是指山东之泰山,并说赤水就是今之黄海,弱水就是大汶河,青水就是肥河……但在《东山经》中,赫然有泰山之名:"其上多玉,其下多金……"就是没有说"惟帝之下都",也没有"一曰"。因此,不可能是泰山。

蒙文通老师在《再论昆仑为天下之中》一文中,对上古之时三危,流沙的位置,作了详细考证。证实了《史记·夏本纪·索隐》引郑玄引《地说》"三危在鸟鼠西南,与汶山相连",否定了三危在敦煌之说。指出:"于昆仑、黑水、三危、流沙、弱水之类,前汉以为在陇西,金城两郡。入后皆以为张掖、敦煌、酒泉。自应劭、高诱已然,郭璞、杜预而下及於隋唐更无足矣"。这是很高明的见解。

接着,蒙老师有一段推论:"《山海经·海内西经》言:'河水出(昆仑)东北隅以行其北。'则昆仑应在黄河之西南。'《大荒北经》言:'若木生昆

仑西'(据《水经注·若水》)《海内经》言:'黑水、青水之间,有木名若木,若水出焉。'是昆仑在若水上源之东,若水即后之雅砻江。若水之东即雅砻江之东,在雅砻江之东,黄河之南的昆仑,自非岷山莫属,是昆仑为岷山之高峰……"这一推论,似有疏误。

然而,更有甚者,将已不是岷山山系,而是属龙门山系的茶坪山与邛崃山系交界之青城山定为昆仑丘,则可谓"失之千里"了。

窃以为岷山不是昆仑:主要理由,仍如前所述,岷山无昆仑之别名。《山海经》中,昆仑是昆仑,岷山是岷山,一在个西山经,一个在中山经。而且,经中几处提到"大江出汶山",而没有"大江出昆仑"的文字。其二,弱水与若水,非同一河水,"环"于昆仑之"弱水",应为今之澜沧江。生长若木的若水,在今汉源一带(见《水经注·若水》),即《山海经》所说的"建木西"。而建木生长在今成都平原,正是在汉源之东。其三,岷山属秦岭山脉,它包括岷山、伏牛山、大别山及南面的米仓山、大巴山和武当山,与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四川西北的昆仑山,不属于一个山系。其四,我几次走过红原以南,从弓杠岭到汶川之岷山,也遥望过最高的雪宝顶。看不出从雪宝顶到河谷之间,有明显的三个层次,也不合"三成"之说。更无《山海经》及其他古书如《穆天子传》、《淮南子》等所描写的有关景物。

看来,昆仑丘还是应该从昆仑山脉中寻找。

昆仑山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大山脉。全长约2500公里,平均海拔高为5000-6000米,北坡多断层,直降到海拔1000米的塔里木盆地。南坡因青藏高原不断上升,现已达5000米,所以山岭顶部较为平坦。但有不少高峰和冰川。在这座庞大的山系中,何处符合《山海经》所说的位置呢?我赞成邓少琴先生的见解。《山海经》所指的昆仑丘,应是青藏高原之巴颜喀拉山。其说已载于《山海经新探》一书。此书不再赘述。总的来讲,邓先生也是根据河水、赤水、洋水、黑水、弱水来定其位置的。邓先生根据自己及其他诸贤的研究认为河水为黄河,黑水为金沙江,洋水及青水为汉水,赤水为雅砻江,而弱水就为今之澜沧江。他是把这些水系的流向,与经文作认真的比较后而得出的,而且指出"今

之巴颜喀拉山，应为昆仑山系南支之一臂。”特别有趣的是：他说：“今之巴颜喀拉山南麓，如石渠、德格等地属丘状高原地貌类型。可明显分为三重”：第一重海拔3700－4300米，为河谷底部之河漫滩及其阶地上的沼泽，其间满布苔草形成(的)草墩，故谓之‘敦丘’；第二重海拔4200－4800米，有河谷两岸蜿蜒分布之高原低丘，丘体浑圆，有似反扣陶钵，故谓之‘陶丘’；第三重海拔4800米以上，系雪线以上之极高山，常年积雪冰川，……岩石多着地衣，植被矮化，多呈紫色，有‘紫山’之称。雪线附近冰雪，冬冻夏融，故谓之融丘。这和《尔雅·释丘》所说：“丘一成为敦丘，再成为陶丘，再成锐上为融丘，三成为昆仑之丘。”十分一致。他还引用了由徐南洲先生提供与他的张洪兴先生在喀尔木一带修建桥梁时经常见到昆仑之丘分为三层的情况。而巴颜喀拉山也确实与岷山相连。

昆仑丘，除了它的地理位置，更为重要的是，要发现这座“帝之下都”的遗址和遗迹。《山海经》对它的描绘是：“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岩，赤水之际，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岩。”至于其他景物，除开明兽外，还有凤凰、鸾鸟、赤蛇、视肉、文玉树、玗琪树、不死树、离朱、木禾、柏树、甘水(醴泉)、圣木曼兑、服常树、伺琅玕树、树鸟、蛟、蝮蛇、蜼、豹、鸟秩树、诵鸟、鶽及各种巫师等等。而《淮南子·坠形训》描写得更为细致：“中有增城九重，其高万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上有木禾，其修五寻。珠树、玉树、璇树、不死树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东，绛树在其南，碧树、瑶树在其北。旁有四百四十门。门间四里，里间九纯。纯丈五尺。旁有九井，玉横维其西北之隅。北门开以内(纳)不周之风。倾宫、旋室、县圃、凉风、樊桐在昆仑阊阖之中，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漫之黄水。黄水三周复其原，是谓丹水，饮之不死。”“昆仑之邱，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如此壮丽的都城，岂止超过荷马史诗里的特洛伊城，就是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也难望其项背。遗憾的是特洛伊城及空中花园，经过多年的努力，

总算被考古专家们找到了，并且，据报道，连上帝的挪亚方舟，耶稣的裹尸布，还有什么太阳徽章，水晶头骨……都被发现了。而下都昆仑，似乎还隐藏在昆仑上的冰山中。我们中国的考古家和探险家，有没有去寻找天帝下都的？如果找到了，上古的历史，又当如何撰写？

但是，这么多年，昆仑下都，真的如消失了的海市蜃楼一样，完全无影无踪了吗？事实又像并非如此。据《千古之谜——中国文化史500疑案（续）》（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遗迹篇》介绍：

1938年，中国考古学家蒲泰，在巴颜喀拉山考察时，在一个穴洞中发现了一些排列整齐的坟墓。他们找到了些完整的人的骨骼。在小小的骨头架上，顶着颗很大的头颅。同时，穴壁上还发现戴有圆盔的雕像。星星、太阳和月亮都刻在岩石上，并用菱豆般大小的点子串连起来。而他们的最大收获是收集到716块花岗岩圆石片。岩片厚2厘米，很像唱片。岩片正中有圆孔，并以圆孔为圆心，有一条双条刻痕，成螺旋状向外旋出，直到岩片边缘。

这些大头人到底是什么人类，又为什么住在这个极为荒凉的地区，人们一时得不出结论。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石片到底意味着什么？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在为破译这一事件努力。直到60年代，中国科学院的储鸿儒教授才译出这些条纹的部分意思。储先生证实，这些圆石片含有高量的钴及其他金属，并有高度振幅，曾被强电流处理过。他们破译这些石片条纹带来的信息是：12000年以前，一群外星人来到地球。他们的飞行器没有足够的能量飞离地球，也没有工具和材料制造新的飞行器。所以，就罹难在这个荒凉不毛的山区……从以上看，圆石片等，应是外星人留下的遗迹。

但是，这段破译却又让人生疑。因为，10000多年前，巴颜喀拉山并没有现在这么高，更不是荒凉的不毛之地。当时的青藏高原，并非像现在这样凸起。更为重要的是：圆石片既然有那么多，而且留下了信息，这说明飞行器不是突然失灵而下落，而是“没有足够的能量离开这个世界”。那么，他们在地球上，有能力也应该寻找的着陆点，就不会是“不毛地区”，而是能为他们提供能量——工具和材料的地方，也一定是

当时最先进、最发达的地方。只是这地方比起他们还是大大的落后，不能满足他的要求，这才使他们滞留下来。他们也不可能把716多块花岗岩的圆石片，带在"飞行舱"里，这只能是在地球上制造的。圆石片能含钴及多种金属，并被强电流处理，也一定只能在巴颜喀拉山完成。如果他们对地球知知甚少，帮助他们完成存留信息的，当是当时最为先进的人类，也就是昆仑山上的"众神"。那些圆石片，日月星辰的壁画，透露出了远古时，此地的繁荣与文明。

也可能是另一种情况。这些圆石片，这些壁画，并非外星人留下的东西，而是"帝之下都"自身的遗物，那它也给我们寻找昆仑帝都留下一点线索。

总之，昆仑山脉，特别是它的南支巴颜喀拉山，一定隐藏着巨大的历史秘密。也许有一天，人们能找到那昆仑宫墙中440个大门中的一座。我们一定要进去看个究竟！

# 后　　记

1986年秋天，广汉三星堆两个祭器坑的发现，震惊了中国和世界。我这个广汉人，也对她着了迷。工作之余，不免东猜西想，企图对某些问题，发表一点看法。结果，写了《雾中的王国》。自知浅陋，不奢望正式出版，复印了几份，送有关方面。以为若能被市上的文史资料选登些

三星堆博物馆

章节，就算莫大荣幸了。然而，出乎意料，竟被三星堆博物馆馆长肖先进先生看中，愿意出资印刷，“内部发行”。于是印了4000余册，在博物馆出售。

大约是通俗的缘故，这本小册子“走”得很快。有朋友介绍给出版社，也有出版社与我联系过。但几乎都要“书号费”，而且得自己垫钱出书。我本是卖文为生的人，怎么能做这种“生意”？事情就搁置下来。

但既然写出来，又让读者看了，也知道自己的文章有疏漏失误之处，就不得不修改。于是，在前途未卜的情况下，我动笔改稿。改稿的过程中，用心读了读《山海经》，又写了《山海经断想》。

稿子弄完，却没有勇气再找出版社。放在包里，成了“包袱”。一次偶然的机会，遇见了昆仑出版社的佘开国先生。他连夜浏览了手稿，表示愿意出书。我长吁一声，如释重负。

我常开玩笑说，如果失败是成功的母亲，那么，谬误则往往是真理的父亲。所以，把姑妄言之的东西写出来，让方家们批评，只要不坚持谬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帮助专家们寻找真理。果真如此，我们这些门外谈史的人，就尽了自己绵薄之力了。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妻子春辉的支持。老友刘雨涛先生更是热心帮助。特此致谢。

本书图片，是由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张继忠先生拍摄和提供的，特此说明。

2000年10月

[General Information]
□□=□□□□□□□□□□□□□□□
□□=□□□
□□=233
SS□=10320603
□□□□=2001□02□□1□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